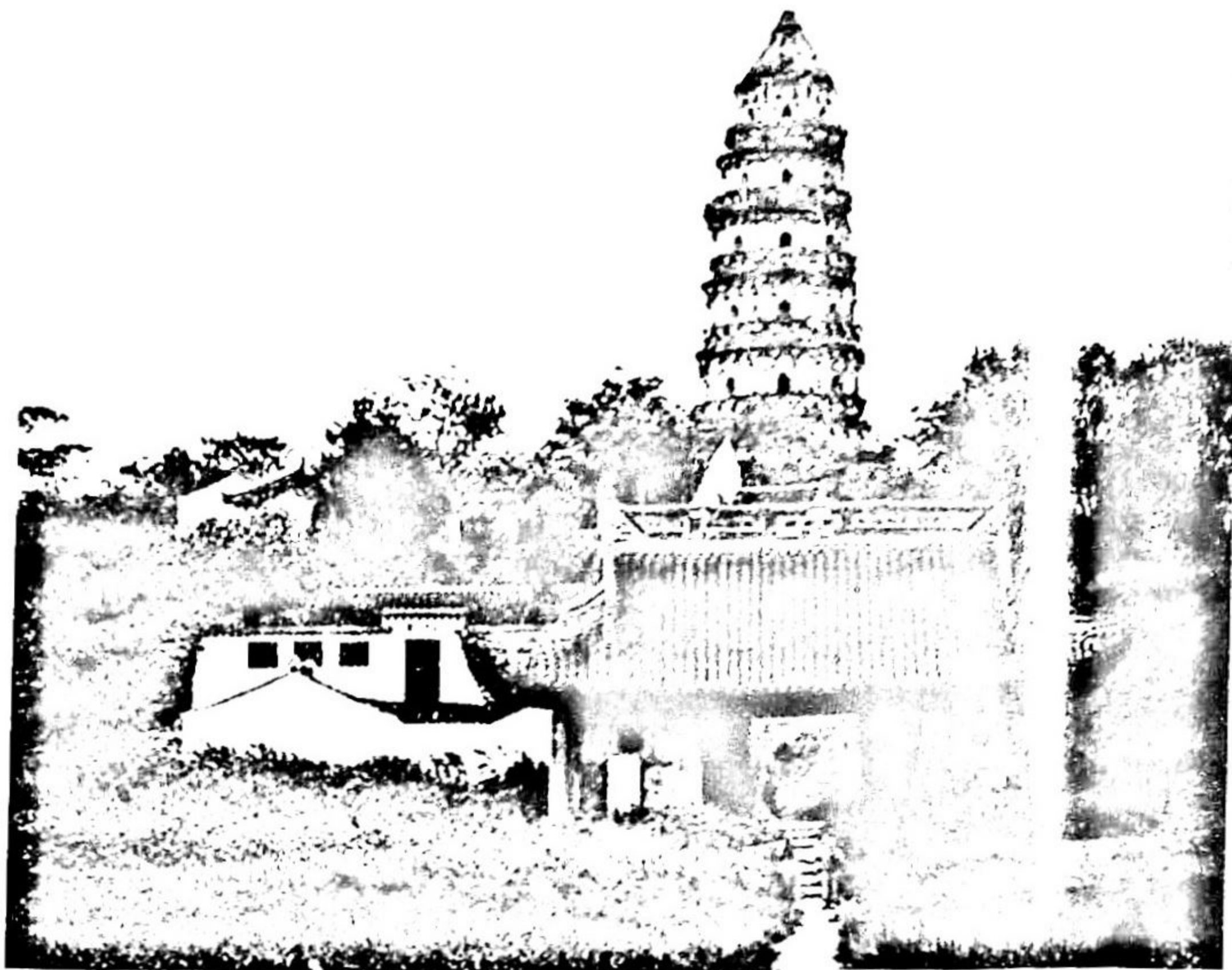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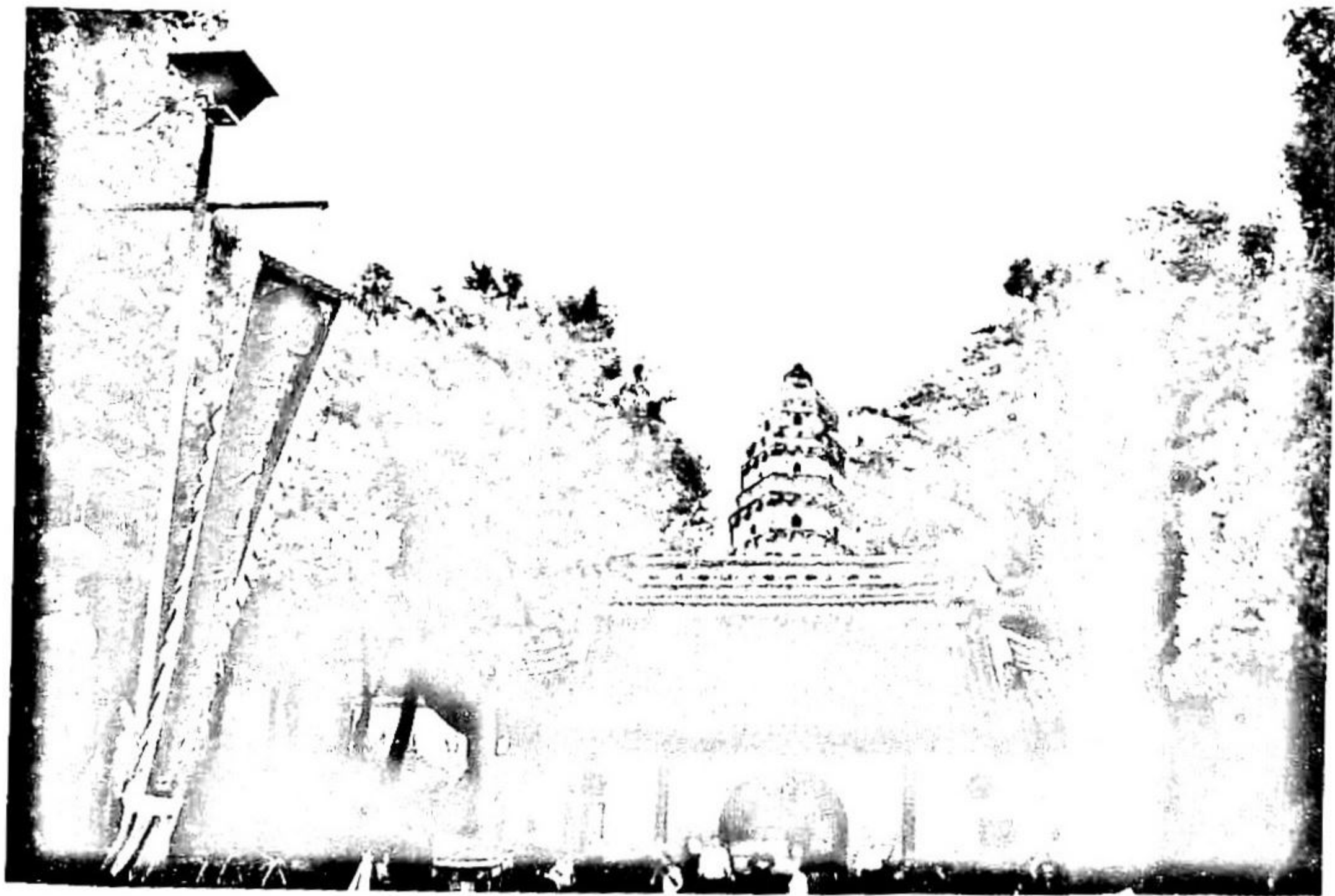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民国时虎丘塔及二山门



◎现虎丘塔及二山门

感谢虎丘塔

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吴中第一名胜虎丘，然而人们对于虎丘的了解，恐怕也只限于苏东坡的“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的那句类似广告语的话，以及导游小姐们那些半是听说、半是戏说的介绍了。这对于一般游人而言，似乎已经够了，但对于还想再深入了解虎丘的人来说，就显得十分肤浅了。虎丘毕竟是苏州最重要的一处名胜古迹，如果人们对它的认识都过于肤浅，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苏州人的浅薄了，作为长期生活在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讲到虎丘，人们首先想到就是虎丘塔，那一幅独立于夕阳之下的古朴苍凉的画面，活脱脱就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的背影。只可惜因为世上的人们谁也没能活过它那把年纪，所以人们对于它的身世，除了借助前人一些零星记载之外，便只能依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传说和故事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虎丘塔似乎并没有很真切的了解。直到1957年，人们在虎丘塔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随着人们对这些文物的不断研究，虎丘塔的神秘面纱这才逐渐被揭开来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距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比较有系统地虎丘塔发现文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应该说还是欠缺的。原因自然是多





方面的，这其中恐怕也有受制于当年亲历者写作能力的因素，而有能力写作的却往往又因为是外行而难以落笔，以至于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话题也就冷落下来了。

钱玉成的这本书，也许正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他出生在苏州，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在国家测绘局工作期间先后到甘肃、宁夏、新疆、陕西等地从事地图测绘，后到西安参加文物保护工作。1980年至1982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期间参加了唐代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和考古测量。1982年调回苏州即到市修塔办，参加了虎丘塔的维修工程。1991年后到苏州博物馆工作，自此发表了许多有关苏州古塔、园林、古桥梁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本书便是他多年来研究的结晶。

钱玉成调回苏州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参与了虎丘塔的修缮，他退休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则是编纂了《虎丘志》。如今，他又将多年研究虎丘塔的文章系统归纳，予以出版，应该说 he 对于虎丘真的是情有独钟了。联想到虎丘塔建于五代钱氏吴越国时期，而虎丘塔内发现的珍贵文物，比如精细的佛像、佛经，精美的瓷器、铜器、铁器，还有精美的织锦、绘画等等，就都是那个时代里中华文明的瑰宝。而作为钱姓后人和苏州钱镠研究会成员的他，对于这段历史，自然是感同身受，倍加关注的了。由此可见，他的这本《映现吴越——虎丘塔文物》一书所钟情的，恐怕就不仅仅只是一座宝塔而已，其中流露出来的，分明是他对于那个“天下汹汹，群雄割据，民不聊生，惟有东南安定，民丰物稠”的五代吴越国时代的情感了。

经历过许多战火，面目已被摧残得改变了原先模样的虎丘塔，历劫不灭，至今依旧挺立山巅，它不仅成了苏州最著名的景观和地标，并且还将一千多年前那个锦绣繁华岁月里的见证和信息保存到了今天，作为后人，我们真的要感谢虎丘塔，自然，我们也会感谢保护和研究虎丘塔的人们。

徐刚毅

2010年4月15日



弘扬优秀文化

2006年10月，作为古城苏州的新名片——苏州博物馆新馆落成并向社会开放，贝聿铭大师的“封笔之作”大气而富有人文色彩。同时，馆藏的精妙绝伦的文物也向社会公众展示。就在此时，一个博物馆行业的新生团队——苏州博物馆志愿者群体也应运而生。

作为苏博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讲解，即向游客、观众作文物展品的讲解，作博物馆建筑的导览。这实际上是诠释博物馆文化，也就是主要通过馆藏文物来揭示隐藏在文物后面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科技文化、习俗文化、艺术文化等等，就是说，志愿者是做着文化的普及和深入即弘扬优秀文化的工作，在架起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当今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文化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主要尺度之一，从这一视角看，苏博志愿者工作意义深远重大。

但是苏博志愿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层次，对博物馆文化并不很熟悉，这就需要学习，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而对展柜中的文物了解、熟悉、研究，并形之为文字的成果，这是一种最有效而实际的学习途径。现在钱玉成先生已





已经在作这种探索和尝试，这本《映现吴越——虎丘塔文物》正是探索和尝试的积极成果。

当然，这本书还不成熟，但可以启示我们志愿者，只要肯做，路就可以走出来的，同时也希望得到苏州博物馆及从事文博、考古工作的同仁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将这项极有意义的文化工作继续下去。

苏州昆曲遗产抢救保护促进会会长 苏州博物馆志愿者 耿明

2010年4月



苏州虎丘塔是五代吴越国树立的千年丰碑

云岩寺塔矗立在苏州古城西北的虎丘山上，因山命名，俗称虎丘塔。虎丘塔是一座七级八面、双筒结构的仿木楼阁式砖构佛塔，因其历史悠久、造型独特、形制恢弘、结构精巧、装饰华丽等特点而成为古城苏州的标志性建筑；又因其在历史、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61年3月4日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虎丘塔现状及特色

佛教源自印度，大致在两汉间传入中国。佛教宣传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向善去恶等教义，颇有利于权势者统治民众，也颇能满足苦难中民众的精神追求。因此汉代以后，佛教在中国较快发展并深入民间，到唐时发展至全盛时期，出现众多的流派和丰富的传教形式。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寺院和塔的建筑也得以建立和发展。早期的佛塔与中国固有的木构建筑相结合，产生了早期的方形楼阁式木构佛塔。因木构易朽易燃，不能持久保存，自南北朝开始，以砖代木构建佛塔成为一种主流。苏州虎丘塔就是唐代后期开始兴建，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一座砖构佛塔。





今存虎丘塔形制恢弘，虽历经千年以上，塔的刹顶、平座、腰檐、栏杆多已残损或毁失，但其残高仍有47.70米，底层对边东西达13.64米，南北达13.81米，其体积达4657.6立方米，重量约6000吨。设想千年以前的唐五代民众，由佛寺僧人筹备规划设计而建造这样一座体量巨大、高耸入云的建筑该是多么的艰难。

虎丘塔是砖塔，其主要构成元素，或说主要建筑材料是条砖和黄泥。据计算，今存虎丘塔大约是由 1.3×10^6 块砖筑成，也就是现在虎丘塔上还有大约130万块的条砖，这些数量的砖块是由当时民众出资、窑户烧制出来的。历经千年，虎丘塔还挺立山巅，经受风雨而不倒，并与虎丘山景区融为一体，为千余年以来到此地的人们所欣赏，这说明其是何等的出类拔萃、举世不凡。

虎丘塔能做到这样，是与其成熟的施工技术和睿智的结构设计分不开的。虎丘塔砌体内施用了唐时先进的叠涩和拱券的砌筑方法，而结构上更采用双筒体的优越结构。现在世界上最高层的建筑物都是采用双筒或多筒套合的结构，而苏州的虎丘塔竟在一千多年前创造了双筒套合砌筑的结构，是令人十分敬佩的。在中国大型砖构佛塔中，虎丘塔首创了八边形的平面图形和双筒内外套合的结构，其内外层间的楼板，由内外壁间逐层挑出的砖块（即叠涩）渐渐收拢承托，并将内外筒体层层连接成一个整体，加强结构的整体性和刚度，使其至今挺立不倒。从这点说，虎丘塔实是中国古代土木工程的杰作，充分体现唐五代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是唐五代时的一项伟大科技成果。

虎丘塔因建筑在基岩南高北低的地基上，自建造开始后即发生塔体的沉降和倾斜，且建造、倾斜与维修交替互动进行，形成了至今仍是一个体形弯曲而倾斜的奇特造型。虎丘塔经精确测量，塔体向北偏东方向倾斜2.34米，倾斜角度为 $2^{\circ}49'$ ，其不同层次的倾斜角也不尽相同，其第二层倾角达最大值 $3^{\circ}59'$ 。这倾斜的发生主要是地基原因造成塔体的不均匀沉降所致。因北部较多的倾斜和沉降，致使塔体出现众多的裂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塔体倾斜



严重，裂缝纵横，使古塔岌岌可危。据同济大学的教授观测后说，虎丘塔的倒塌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可见当时塔的危情严重。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加固维修工程，虎丘塔已经转危为安，其变化只在天气变化所影响的小范围内进行，现在保持在相当安定的状态中。

虎丘塔的表面造型保持了晚唐至宋初的建筑样式和装饰，粗硕规整的斗拱，小巧而精致的壁龛和藻井，色泽艳丽的装饰纹样，形态鲜活的牡丹塑画，形象生动的湖石造型，都保持着盛唐大气转向两宋精细的艺术氛围，令人感受到千年以前古人生存的真实环境氛围。

而虎丘塔内还发现丰富多样的文物，这更让人知晓建塔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和习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艺术方面的成果。

二、虎丘山建塔的沿革

其实虎丘只是一个海拔高度仅34米的小丘，其周围也不广大，从严格的地理标准论，高度不足500米者不能称为山，即使在丘陵之中，它也显得相对微小，但宋代专供帝王阅读的《太平御览》中，虎丘赫然列入地部诸名山之中，可见它的不凡。虎丘塔更是历史悠久，现在发现的最早文献，有南朝梁陈间的诗人江总和张正见的诗句“宝塔镇垞头”、“贝塔耀山庄”，可证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前，虎丘山上已有佛塔。据我国佛教发展历史和佛塔建造历史看，此时的塔当是一座方形的、体量也不太大的木构佛塔，但此时的塔至今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为贺其母的生日，在当时全国的30个州都按统一图样，限时数个月内同时建造出高达16米的三层木塔。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又建造了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佛塔。虎丘山上的这座塔，曾先后被写入唐代刘禹锡、白居易、李绅等人的诗篇中。大致到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这座塔也毁于废佛的法难之中。





接着的唐宣宗又倡导崇佛，但限于唐代后期国力维艰，遂将各地建塔事务交由当地佛教寺院承担。唐末藩镇割据，及至五代的政权交替，社会凋敝，苍生遭难，使唐末至宋初这一时期内极少有建造大型佛塔的情况，但相对偏安的蜀国（在四川分前蜀和后蜀二期）和吴越国却取得了比较安定的一段时期，历经战乱的民众极其盼望得到相对安定的生活，即佛教宣传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由寺僧筹办、民众投资的今存虎丘塔就在艰难境况下逐步启动和运作起来，大致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供养及功德积累，终于在宋代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一段时间内完成了这样一座佛教的巨构，如此算来今存虎丘塔的历史至少也超过千年。这些情况，可以从今存虎丘塔的工程状况和塔内发现的文物及题记中得到证实。现今还矗立在虎丘山巅的虎丘塔，是由中国前期木塔向后期砖塔、方形塔向八边形塔、单筒塔向双筒塔、简单塔向装饰精美塔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其至今存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虎丘塔内发现的文物及其意义

古塔出现危情本不是一件好事，但挽救危塔的加固维修工程却是一个深入了解、研究古塔的极好机会。而且修塔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秘藏在塔内的珍宝，即佛教文物，虎丘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维修工程就是这样的典型实例。

1957年的加固塔体维修工程和1981至1986年的加固地基基础维修工程都发现了隐藏在塔内的文物。特别是1957年的这次维修施工，先后在塔内各层中发现了佛像、舍利、经箱、石函、佛经、绣件、经帙、铜镜、钱币、金涂塔、秘色瓷、泥刀、木楔等众多文物以及附书其上的题记文字。这些文物及题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吴地民众崇信佛教的习俗，吴越地区由乱至治的政治状况及由供养物品反映的经济情况、科学技术水准等。如有一面直径为33.6厘米的



铜镜背面，由铜镜主人书写了一段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寺塔上，保佑自身善果清吉，诸眷属等团圆，身富清健，且再充供养，隆建二年三月□日题。”题记共51字，明白告知当时民众崇信佛教，将自己珍爱物品供养给寺塔的情景及当时苏州地区政治隶属状况。另一面铜镜是供养人曹迎升以锥刻方式在镜面上刻绘出一幅显示善男信女及童子虔诚礼佛的图画，形象地喻示了包括供养人在内的民众崇信佛教的场景。更有一件稀世珍宝秘色瓷带盏托的茶碗，在全国专家品鉴中被评为最出众的国宝。而这些铜镜、瓷器等也显示出当时高超的科技水平。同样，与其他所有文物一起都从各自的制作和人文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的状况。

四、今存虎丘塔与五代吴越国密不可分

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是由唐代临安人钱镠在唐朝末年战乱中逐步创建起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其管辖的地域范围吴越国一军十三州，即相当于今浙江全省，江苏南部苏州地区，上海市境及福建省福州地区，面积约近20万平方千米。吴越国自钱镠创立后共历三代五主，历时80余年，是五代时期历时最长的政权，而钱镠是一个极顶聪明睿智的人，文治武功都卓越不凡。他为境内的百姓及自己家族的长远利益考虑，提出并执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大策略，发动境内人民治江浚湖、兴修水利；拓展杭州、苏州两大城市；大力倡导垦荒圩田、重农种桑；开拓交通、发展外贸；尊教重学、崇佛建塔、重视文化教育，使得境内80余年战事较少，人民过上安定的小康生活，综合素质极大提升，政权的综合实力也极大提高。北宋初年出现民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是吴越国钱氏政权治理功绩的形象反映。至今以五代吴越国境域为主的长三角地区依然是国内经济、文化最活跃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这与吴越国所奠定的元气和基础是分不开的。而吴越国最后一位国主钱





弘倣遵照祖先钱镠的家训，顺从历史潮流，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将吴越国版图并入赵宋政权之中，实现了北宋的统一局面，不但为当时江浙人民造福免灾，而且对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仍有现实的意义。

苏州在唐代后期战乱不止，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即被钱镠攻占，虽得而复失，但自光化元年（898）再得后，直至纳土归宋，一直是吴越国重镇。而苏州虎丘塔的建造，有关部门提出的“确是开始建筑于显德六年己未（959），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96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虎丘塔的体量、用材、形制、地基、结构、装饰、秘藏以及民众供养的能力，都不是一两年内所能完成的，这从同在苏州，而体量、工艺、地基、装饰、时代、环境都优越于虎丘塔，且建造时间至少晚数十年的瑞光塔比较，就足以证实这一点。瑞光塔建造要花费30年左右的时间，以此度量虎丘塔的建造若没有50年左右的时间是绝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当我在参加虎丘塔加固维修工程中遇到这一疑问时，曾写信请教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老师，罗哲文老师及时给我回信说：“关于你所发现的虎丘塔的始建年代问题，我很感兴趣，的确两三年的时间是很难完成如此巨大而精细的工程，全国也有不少修建五六十年的古塔，如料敌塔修了55年，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也修了几十年，希望你能写出文章来发表，那将是很意义的事。”遵照罗哲文老师的教导，我从此更加努力地致力于虎丘塔的研究，至今考证出今存砖构虎丘塔始建于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900），全部完成于宋太祖执政（960~976）的十几年里，历时70年左右，而此时苏州仍在吴越国钱氏政权的管辖期内。吴越国对苏州地区的有效管理时间也只有80年的时间，若精确计算，虎丘塔建造工程加上其前延后续的有关事项（如正式建造塔体前的筑基事等）又要超过7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在15年前曾说过“虎丘塔的建造贯穿于吴越国的始终，这当然不是一次巧合吧”（见《从出土钱币看虎丘塔的建造年代》，载《苏州文博》1992年第2期）的话。当时我



只是从工程和文物等方面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感知，今后还将努力将这一课题做得更好。但今存虎丘塔（即云岩寺塔）的成功建造确是与钱氏政权吴越国密不可分，故苏州虎丘塔是五代吴越国树立的千年丰碑，确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钱玉成

主要参考文献：

- 1.《中国古塔》，罗哲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 2.《中国塔》，张驭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 3.《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
- 4.《虎丘塔砖及其文化意义》，钱玉成、马晓茵著，《苏州文博》2009年1期
- 5.《吴越书》，临安市钱镠研究会、临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2001年12月



目 录

感谢虎丘塔·····	徐刚毅
弘扬优秀文化·····	耿 明
苏州虎丘塔是五代吴越国树立的千年丰碑 ·····	钱玉成
至圣遗迹——金涂塔和佛舍利·····	1
天台佛典——虎丘塔发现的佛经·····	11
佛祖具象——虎丘塔发现的铜佛像·····	17
菩萨至像——十一面观音铜立像·····	23
劫后余身——一组残石造像·····	30
佛证供养——李太缘题记石造像龕·····	38
碧玉贡瓿——秘色瓷莲花碗·····	42
映照吴越——一组铜镜·····	49
钱能通佛——虎丘塔发现的钱币·····	61
磐石护佛——两件石函·····	69
珠椋皆贵——虎丘塔发现的经箱·····	76
绣团锦簇——虎丘塔发现的丝绸与绣件·····	82
器陋功伟——虎丘塔发现的营造器具·····	92
乌金丰绩——虎丘塔发现的三件铁制文物·····	96

神工木巧——虎丘塔发现的檀龕宝相	102
锦包竹帘——一件早期文书保护的包装物品	108
精彩纷呈——虎丘塔的彩绘和壁画	112
众志成城——虎丘塔砖及其文化意义	115

附录

1957年虎丘塔发现文物的早期报道	127
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	130
虎丘塔发现文物的确切时间	133
五代吴越国及其创建者钱镠简介	137
虎丘塔及五代吴越国大事记	140
后记	149

【至圣遗迹——金涂塔和佛舍利】

金涂塔是五代吴越国的特色文物，其中以金瓶珍藏佛舍利更属珍贵，是佛教三宝中第一位的珍宝，当称为至圣遗迹。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虎丘塔的保护，自1953年起筹办修塔，后于1957年春施工，进行对塔体的加固维修工程，同年9月竣工。施工过程中发现众多的文化遗存，金涂塔及其盛置的佛舍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组文物。

一、金涂塔和佛舍利发现实况

20世纪50年代的虎丘塔第一次维修工程是以加固裂缝丛生的塔体为中心的，当时进行过虎丘塔实地勘察的古建筑学家刘敦桢被聘为苏州市政府顾问，专门指导虎丘塔的维修工程。不出刘敦桢先生所料，施工后不久的3月30日在二层楼面下发现了以佛经为主的第一批珍贵文物，5月5日又在三层楼面下发现了以金涂塔、佛舍利为主的第



铁铸金涂塔



二、虎丘塔发现的文物

二、虎丘塔发现的文物。发现当时情况如下：

5月5日，施工“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其中方窟中央放置石函一座，“在石函里面竖一铁函（函底板20.1厘米见方，下面函口19.1厘米见方，顶部10厘米见方，通高34.2厘米）”，铁函分上面的罩和底板两部分，罩和底板相连处，每面用两根铜丝扣住。函内放置的即为本文主角的金涂塔和佛舍利。“把铁罩开启，即见有残绢襍五块，覆盖着金涂塔一座。”金涂塔“塔座高4厘米，11厘米见方，塔身高7.8厘米，阔11.2厘米。塔顶相轮等已朽酥成小块，不可收拾。四周翘角除三只倾折外，一只尚完整，翘角高6.8厘米。自塔身、塔座至翘角，均铸满佛像，极工细。塔身中空，在塔座中心凹一洞，内放一金铸小瓶（高2.9厘米，腹部周径7厘米），瓶中有盖，口中塞着纸圈。根据襍上文字记载，此瓶即藏舍利。这只金瓶中盛的一粒细如小米的‘舍利子’，已仍还藏虎丘塔中”。

二、虎丘塔发现的文物

金涂塔这一名称，是因这一类型的塔均由金属如铜、铁或银等铸作且在外表鍍金而制成，其外表金光灿灿，故称金涂塔。清王昶《金石萃编》中著录有《金涂塔记》专题介绍。据称早在南宋时，这种形制独特、结构精巧、装饰生动别致的“宝塔”即已被人发现、鉴赏，诗人周文璞曾赋长诗《金涂塔歌》加以描述和赞美，“金涂塔”的名称由此而来，并在民间被广泛使用，而“阿育王塔”的正名反倒鲜为人知了。虎丘塔内发现的此塔，据底质当称为铁铸金涂塔。

金涂塔的正名阿育王塔则是历史和考古专业的业内名称，这是因为佛教文献记载印度的阿育王曾有建八万四千宝塔的事迹。阿育（Aśoka）是人名，相当于中国战国末期时人，旧称阿恕伽或阿输伽，意译为无忧王，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之孙、宾头沙罗王之子，其在位期间几乎统一印度全境，是古印度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因其征战杀伐过多，后听一沙门说法，遂生悔悟，皈依佛门，嗣后在印度境内广造寺



塔，刻成“法敕”，举行第三次佛典集结，派遣道僧至国外传法。当时阿育王敕诸国建造八万四千大寺，又建八万四千宝塔，又亲诣王舍城，取阿闍世王所埋之四升舍利及另六处所埋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篋，一篋盛一舍利，以此建造八万四千塔。《法显记》、《西域记》皆述及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事迹。传说其中有19座塔建造于中国，古塔史家张驭寰先生还对此作了专门调研，详情见其所著《中国塔》。故文史考古及佛教界业内人士称此类塔为阿育王塔。

旧时一般亦称此类塔为宝篋印经塔，这是因为除去底座和顶部外，此塔的中间主要部分形如一个方形的箱子，即古称的篋，篋中又盛置属佛教三宝的舍利或佛经，故称宝篋。据古代日僧道喜的《宝篋印经记》载，其在中国五代至北宋初时访问地处江南地区的某佛寺，曾看到此种类型的塔，塔高九寸余，四面铸佛、菩萨像。塔呈四角，上有龕形如马耳。塔内也有佛、菩萨像，小如枣核。在开启观看此金涂塔时，忽从塔内掉出一个小囊，内有一小经卷，经卷上题写：“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本宝篋印经卷八万四千卷之内安宝塔之中供养。回向已毕。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也。”显德三年丙辰岁为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所用年号的第三年，即公元956年，而此时江南一带仍由吴越国钱弘俶管辖，但由此经卷题记而称金涂塔为宝篋印经塔。

金涂塔为五代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929~988)所独创的崇佛器物。钱弘俶毕生崇信佛教，奉佛至诚至虔，至死不渝，事迹显著。自谓：“生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统治两浙期间，于境内造经幢、刻佛经、建寺院、修宝塔，礼遇高僧，复兴天台宗。钱弘俶在位的三十年间，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据浙江省博物馆专业人士研究，苏州瑞光寺塔和虎丘云岩寺塔内发现的两座金涂塔均为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但金涂塔确为五代吴越国独创之文物。

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条载造金涂塔事：“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篋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

钱弘俶造金涂塔的十年，据发现金涂塔实物及题记判断为乙卯年



(955)至乙丑年(965),虽分属五代后周的显德至北宋的建隆、乾德年间,但实际建造仍在吴越国境内,似与中原王朝政权关系不大,且官造者多用于支款而不用年号款。

金涂塔的样式据考为晋太康(280~289)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即慧达在今浙江宁波鄞州区鄞山所造阿育王塔,钱弘俶即仿此塔以铜铁造之。

此类塔亦可根据塔内放置舍利种类而称名,如杭州雷峰塔地宫内发现的金涂塔是盛放佛螺髻发舍利而称佛螺髻发舍利塔。这样,因虎丘金涂塔上覆盖的绢襪上墨书直接写明“□□惠朗舍此襪子一枚裹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宝塔”,故亦可称作“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塔”。

关于虎丘塔内发现的这座金涂塔,笔者在1998年12月出版的《苏州古塔》一书中曾作介绍:

金涂塔铁质,外面鎏金,分为底座、塔身和塔顶三部分。底座方形,铸作须弥座状,高4厘米,边长11厘米;塔身和塔顶连成一体,亦方形,塔高7.8厘米,边长11.2厘米;塔顶中间至刹底已酥朽而脱离,四周各作翘角形,三只已倾折,一只尚完整,高6.8厘米,估计中部之刹顶,原高当有10厘米左右,在铁函内发现的高约10厘米的小木塔或即放置于金涂塔之顶部中央的。在塔座、塔身至顶部翘角处均铸作佛像,造型极为工细。塔身中空,在塔座中心凹一洞,内放一金质小瓶,瓶高2.9厘米,腹围7厘米,瓶口有盖,盖口塞纸圈,下有一粒细如小米的舍利子,即绢襪上所指的“迦叶如来真身舍利”。

据古塔专家罗哲文先生考证,金涂塔即宝篋印经塔的塔形原系楼阁式塔、亭阁式塔塔刹的形式,如云冈石窟中北魏时的石刻塔,隋代济南历城四门塔的塔顶都是这种形式,唐宋时期取了这一部分的形式作为寺庙或陵墓地宫内贮藏舍利之用。宋以后也仿其形式在一些寺庙中修造露天的石塔,如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多宝塔、北京西山灵光寺和尚塔、泉州开元寺宝篋印经式石塔、广东潮州开元寺宝篋印经式石塔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塔式。而新疆吐鲁番的台藏塔则是较早期的实例。明清时出现的金刚宝座塔,如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刚宝座塔(当地称五塔)和湖北襄樊市广德寺金刚宝座多宝塔,也都是这一类型塔的翻



版，不过在体量上，又比石塔增大了许多，在形式上也有所变化。

到目前为止，类似虎丘金涂塔的还发现了不少，约有百余件。如苏州瑞光寺塔、杭州萧山区、浙江东阳南寺、金华万佛寺等处都发现此式铜质金涂塔，而2001年于杭州雷峰塔地宫内出土的银质金涂塔最为精巧。如前介绍，此式金涂塔均藏置佛三宝的佛经或舍利。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铜质金涂塔和杭州雷峰塔银质金涂塔均藏置佛舍利，虎丘金涂塔诚如绢襪所书是藏置迦叶如来真身舍利的。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虎丘金涂塔的装饰极为精彩，底座须弥座各面均有四尊坐佛像，似被石柱形隔墙分隔在四间方丈室内，寓示佛教的修炼成佛的状态，象征佛教初传入汉地的礼佛习俗。其上下外突部分均作横向分隔的木栅栏图案。

中间宝篋部位的四面各作浮雕式的鎏金造像，为佛本生（即佛祖释迦牟尼前生）故事画面，分别是：

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写太子游行中见一饿虎欲食其子，乃投身虎前，以身饲虎。

尸毗王割肉贸鸽。写尸毗王好施舍，天帝化作鹰追鸽以试，鸽飞王旁求救，王割身肉与鸽等重，鸽得免死。

快目王舍眼。快目王善施，一盲婆罗门乞眼，王剜目施人。

月光王施首。一婆罗门乞王头，王乃以发系树上，以头落施舍。

以上四幅佛本生故事画像（或塑像）为流行最广的经典画像，金涂塔宝篋四壁面多绘之。

金涂塔顶部四角之翘角亦称马耳或山花蕉叶，共上下分隔呈16个画面，分别描绘佛祖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涅槃的生活经历，又分为四组，它们分别是：

第一组：胁下诞生 仙人占相 姨母养育 耶稣兆梦

第二组：初启出家 观菩提树 牧女献糜 四王献钵

第三组：九龙灌浴 六年苦行 沉思幽想 树下成道

第四组：园林嬉戏 妙传法轮 双林涅槃 应尽还源

虎丘金涂塔虽经锈蚀残损，辨认有一定困难，而对比瑞光塔金涂塔和雷峰塔金涂塔大体相似。当然，后两者制作时间稍迟，其制作已成透雕



形式。特别是铜质和银质至今未有锈损，是对比和补充的证物，对理解和解读虎丘金涂塔均有好的辅证作用。

虎丘金涂塔画面上除出现佛像及信徒的人物形象外，尚有菩提树、莲花、山花蕉叶等花草树木和虎、犬等动物形象，还有缠枝、联珠、格栅等图纹，这些都是佛教汉化后具有民族意味的吉祥物，反映了当时执政者及民众的审美情趣。

金涂塔虽有如此丰富的佛教人文内涵，又有鎏上外表的金层使其金光闪烁，保护着其内的铁质内胎，维持至如今，但它只是一个器，或说是一种包装，它要保护或凸现的是存置其中的佛的化身舍利。

三、虎丘塔内发现的佛舍利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印度。创立者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意为“义成就者”（旧译“义成”），姓乔达摩（瞿昙），因他为释迦族，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后也称为佛祖、佛陀、世尊、释尊等。释迦牟尼于29岁时出家修道，在深山静坐6年“悟道成佛”，后到中天竺各地传教，组成僧团。因其宣扬的“四谛”、“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说教适应统治者麻痹被压迫者反抗意志的需要，因而得到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以后其弟子将其言论及行为加以整理并进而神化，奉为经典，继续传播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宗教。

佛教有所谓三宝，是指佛、法、僧三者。对佛教徒来说，皈依三宝是最初也是最终的一件事情。要成为佛教徒就必须皈依三宝，所以皈依三宝是佛教徒不可欠缺的必要条件，不论任何时代、地域，也不论大乘、小乘，皈依三宝都是最受重视的。

释迦牟尼在世时的三宝称现前三宝，释尊本身是佛宝。佛所说的教理就是法宝，释尊弟子如比丘、比丘尼等出家僧团就是僧宝。当佛灭以后，佛留下的舍利则被当作佛宝来崇拜，各地纷纷建立佛舍利塔，于是佛塔崇拜就广为流传了。



舍利，佛教释为佛之身骨也，是依戒、定、慧之薰修所成者。元锱绩《霏雪录》曰：“舍利，按佛书室利罗或设利罗，此云骨身，又云灵骨。有三种色，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肉舍利。”按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先生解释说：“舍利（Śarīra）就是遗体，但这个名称一般只用于佛和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塔”又称“塔波”，是梵语Stupa省略的音译，意义是“高显”或坟，塔一般是藏舍利的，也有不藏舍利而作为标志纪念之用的。据文献说，中国也有藏佛祖舍利的塔。西晋后十六国时传入的阿育王塔19座，传说是藏佛祖舍利的。但20世纪后期发掘的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就出土了佛祖的指骨舍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文豪韩愈，当年就写过《论佛骨表》，劝谏唐代皇帝不要迎送佛骨至长安大内，以致被贬官潮州，险些丢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是其遭贬时的真实写照。而这佛骨就是法门寺里的佛祖指骨舍利。唐代先后有7位皇帝曾将此佛舍利迎入长安大内，迎送时倾城出动，万人空巷，臣民拥戴热烈，盛况空前。舍利的神圣崇高由此可见。现在倒塌的法门寺塔又重建于原地，佛祖指骨舍利也放置于原处。那么虎丘金涂塔内发现的舍利是怎样的呢？

虎丘塔三层发现金涂塔内珍藏的舍利的破解倒并不困难，这是因为覆盖于金涂塔上的五块绢襖虽“大都朽烂”，但比较完整的一块色已泛作淡黄，上有毛笔字两行：“□□惠朗舍此幘子一枚裹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宝塔。”如此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舍利的原主和金涂塔的名称及供养人名字，为我们后人的探求省去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真要感谢这位法号惠朗的法师了。

题记已说明了舍利是“迦叶如来”的，且只是一粒细如小米的“舍利子”。那么迦叶如来是怎样的一位佛祖呢？关于迦叶如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迦叶是摩诃迦叶波的略称，“摩诃”是大的意思，迦叶波是他的姓。佛经说他“年高德重”，称为大迦叶，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佛教传说，当时佛教经籍还没有手绘本，全凭口诵记忆。释迦涅槃后，第一次会诵佛教总集《三藏》时，迦叶是召集人。现在佛教寺庙中在佛祖如来佛二侧中的一侧年长侍者即为迦叶，人尊称为迦叶菩萨者即是。他是地位仅次于佛祖的一位佛教主要传播者。





还有一说，迦叶如来是指三世佛之一的过去世的迦叶佛，在有些石窟的洞窟中，并列雕凿着三尊佛像。有些佛寺的大殿内也并列安排了三尊佛像，这种题材有很多是三世佛题材，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般居中的是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也称如来佛；两旁的是过去世的迦叶佛（寺院中特指燃灯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这种三世佛也称“竖三世佛”，而过去世的迦叶佛即迦叶如来。

因此，无论这两种解释中，虎丘塔内发现的舍利属于哪一种，都是等级极高的佛教中的崇高神圣形象。而金瓶和迦叶如来真身舍利的存在，使铁铸金涂塔成为佛门中人和所有佛教信徒心中的神圣所在，同时也成了虎丘塔的“精魂”。

因为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虎丘塔内发现迦叶如来真身舍利的考古发现一经传播，立即引起当时苏州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佛教界人士的特别重视。佛教界人士提出要将此真身舍利及盛置的金瓶放回虎丘塔内的原放置处的请求。以后经市政府批准，于1957年7月26日，由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此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及盛置的金瓶，一并谨慎安全移交给当时市佛教协会所在的西园寺。当时西园寺内举行了盛大的接送仪式和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入塔瞻礼纪念会。会后次日，即1957年7月27日，苏州佛教界在虎丘塔下举行隆重的装藏典礼，礼送迦叶如来真身舍利重新入塔装藏。200余名佛僧和佛教徒护送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并盛置的金瓶从西园至虎丘。这次护送同时入塔的还有8箱藏经，100多个铜、瓷佛像及檀香木雕刻的宝塔。当时场景热烈而庄严，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参加此仪式的西山包山寺方丈贯彻法师，至今还能清晰如初地述说当年有缘参与时的盛况。

四、发现金涂塔及佛舍利的意义

金涂塔这一类型的塔，从文献或发现实物来看，都是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时所制作的或仿此式塔而制作的。陕西法门寺地宫虽有佛祖指骨舍利，也以金制塔加以保护，但并不是金涂塔，其形制并不一样的。钱弘



俶(929~988),字文德,是钱元瓘第九子,继其兄弘侗为吴越国君,是五代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公元948~978年在位,即历五代后期的后汉、后周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将吴越国十四州版图并入北宋赵氏政权内,使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钱弘俶在位时继续其祖钱镠的“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国策,募民垦荒,整治水利,发展农桑。经数十年努力经营,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境内出现一派富庶繁荣景象。钱弘俶又承继其父祖倡奉佛教的做法,特别是中原地区周世宗柴荣大肆禁佛,北方僧侣大批南逸时。钱弘俶又广造佛寺,收容接纳各地各派寺僧,使地处江南的吴越国境内成为当时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最佳地域,世称东南佛国。钱弘俶也崇信佛教,于是仿效印度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宝塔事例,并以早期佛塔塔刹形制而建造这一类型的金涂塔。清《金石萃编》书中专有“金涂塔记”一节,其上写明“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钱弘俶时的“乙卯岁”为后周世宗时的显德二年,即公元955年。文献写明钱弘俶制作金涂塔是这一年(955)的事。至今发现的金涂塔也有百余座,有铜、铁和木制者,银制者仅杭州雷峰塔出土一件,虎丘塔金涂塔虽有同在三层的铜镜陆七娘题记可以推定入塔时间为宋建隆二年(961),但因铁制,可以判定制作时间上限可至显德二年或稍后一些时日。虎丘塔金涂塔的发现和同在塔内的众多供养文物有题记可以证之吴越国境内确是出现过一段崇佛信佛的热潮。上至吴越国主,下至普通民众都参与其间,出现礼佛布施的普遍习俗。正是这种习俗和热潮,才促使虎丘塔及其内包括金涂塔在内的众多精美文物的产生及进塔。

盛世建塔,无论小型精美的金涂塔,还是大型精致的虎丘塔,都是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才能建成的。若没有一个安定、文明、富裕的社会环境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五代是乱世,53年间,中原政权更迭5个朝代,有14位皇帝。除吴越国外的其余九国,也都一样征战杀伐不断,黎民百姓多遭其罪,社会凋敝。像吴越国这样保境安民,连续90年左右的文明富裕乐土是绝无仅有的。最后钱弘俶又顺应历史潮流纳土归宋,虎丘塔及金涂塔的建造及留存至今,充分证明吴越国钱氏政权政治治理的成





功和智慧。

虎丘塔金涂塔虽系铁质，但以鎏金技术加以保护和装饰，使之留存至今，并在其极小面积的表面铸作众多佛祖、佛教信徒人物形象和花树、虎犬等动植物形象及图案，足见其凸现的科技水平和文化艺术的审美水准。我们不得不惊叹吴越国时期苏州先民在佛教普爱、向善、和平精神的感召下，掌握了如此娴熟、高超的制作技能，达到了如此高超、精致的工艺水平，具有如此深沉、细微的审美追求。金涂塔的发现，实是五代吴越国时期苏州地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的集中再现。而迦叶如来真身舍利的发现于虎丘金涂塔内也足见苏州当时佛教之繁盛及城市地位上的显赫。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佛学大辞典》，丁福宝编纂，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1版
- 3.《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 4.《佛教手册》，释宽忍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 5.《佛教常识问答》，赵朴初著，中国佛教协会1983年版
- 6.《中国塔》，张驭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 7.《千年胜迹雷峰塔》，张建庭、王冰主编，杭州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 8.《佛教艺术百问》，丁明夷、邢军著，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9.《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 10.《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修订本），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11.《天复地载——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特展》，浙江省博物馆著，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12.《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金申，《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11日





【天台佛典——虎丘塔发现的佛经】

成语“买椟还珠”语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的是“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提高珍珠的价值，制作了装潢华丽的包装，即以成语中的“椟”来放置真正的卖品“珠”。有郑国人不识货，“买其椟而还其珠”。成语中的“椟”指木匣，“珠”指珍珠，买下木匣，退还了珍珠，比喻舍本逐末，取舍失当。50年前，苏州虎丘塔内发现了一个装潢华丽的木匣，其中也放置了更为重要的东西——佛经，对于佛教及业内人士说，当然是这样的解读，但对文物工作人员说，这佛经和包装的木匣等都是珍贵文化遗产，一样也不能落下的。我们且看发现当时的情况：

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30日下午，修建虎丘塔的工人王菊生在塔上二层塔门下检查一条即将灌浆的裂缝，发现缝底有一石匣，将匣起出，内装一木匣，木匣内藏有手抄经卷十本。石匣四周每面刻有佛像五尊，木匣有金属包边，还有一具小锁，制作精美。藏经用丝绢包裹，木香作轴，经卷纸上写楷书，字迹工整。木匣中有“言细绍舍净财造函盛金字法华经，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等字样。知道这部法华经是在宋朝初年藏在塔内的，建隆是赵匡胤的年号，距今已近一千年。

以上报道刊发于1957年3月31日《新苏州报》头版的右下方，距发现文物时间不足一天，是非常及时的。由于匆忙，报道的情况并不完全准确，如说经卷十本即是一个估计的约数。但基本情况属实，即在虎丘塔二层





楼面下发现手抄佛经《法华经》及其包装的石匣和木匣等。

就在报道虎丘塔发现佛经的当天，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先生恰在苏州视察工作，他说：

3月31日早起正要去虎丘，看到苏州报纸报道，正在施工修建的虎丘塔中发现北宋经卷，于是到了虎丘。

在虎丘，王冶秋副局长了解到：

30日，工人在塔的第二层边沿向里灌浆的时候，屡灌不满，认为其中可能有空隙。一个工人就下去在里面转了一遭，发现中间有东西，又出来拿了电筒下去，在中间看到石函，他即将石函向外拖，乃将石函拖散。里面有木匣一，上有锁。工人将木匣拿出时，底部脱落，发现其中有锦绢包裹的经卷及象牙牌、珠子等；又有铜钱一包，在石函内；石函外部是长明灯碗二、香炉一，还插着香。

王冶秋于4月1日到了苏州市文管会办公处，在委员陪同下观看了木匣及经卷。

木盒长约二尺，宽约一尺，作宝合形状，似为楠木，淡黄色，未加油饰，沿边均包镶有银片，镂刻花纹，并有铜饰件，色彩灿烂如新，前面有一小锁，极为精致。拿来时即为底部向上，底部有一木板，下面有经卷共八卷，每卷有的用几层绢布包裹，有的用锦绸中夹有极细竹帘，想为包裹经卷用的，可惜已经被工人拿出时扰乱。

王冶秋在介绍经卷及其包装后说：

按建隆二年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约为公元961年，距今已近千年，对虎丘塔确定历史年代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从佛教经典上，织绣工艺上，当时风俗以及雕刻工艺方面也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这一发现，也引起各地修缮古塔时，必须切实注意塔的内部多有极重要的文物，稍一疏忽，就会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以上见王冶秋《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刊于1957年4月12日《文汇报》。

以后苏州市文管会对塔内发现的文物经过整理后，刊发了《苏州虎丘云岩寺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以下称《简报》），出版了《苏州虎丘塔出土



文物》(以下称《出土文物》)专著,系统介绍了包括佛经、木匣在内的全部发现文物,其中对经卷的介绍是:

箱内有已经硬化作黑色(瓷青纸)的经卷七卷,每卷长26厘米,卷两头伸出银质鎏金包头木轴,合长32厘米。卷端描有金花图案,极劲健工细,以金写出“妙法莲华经卷第几”字样,卷端并扣扁形丝带。在储放中每卷外面用绢质经袱包裹一块至四块不等。(《出土文物》)

塔内发现的经卷这里明确为七卷,王冶秋说八卷是当时将一卷供养人题名也误认为经卷了。经卷现虽不能展开阅读,但是《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当没有疑问,这也可以从这些包装的题记上得到佐证,如:

“石函盖背面涂成漆地,用银珠写‘□信心□□□字法华经’等字。”

经卷“第一卷卷面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经袱“中间毛笔写‘女弟子於八娘舍裹金字法华经永供养’”等字。

第二卷经袱第一块“上面分三行毛笔写‘武丘弟子曹二娘舍裹妙法莲华经卷塔上’”。

第四卷卷面写“妙法莲华经卷第四”等字。

第六卷经袱“中间毛笔写‘女弟子冯氏十一娘舍裹金字法华经入武丘山寺塔内充供养’”等字。

以上见《出土文物》一书。

由发现的经卷是《妙法莲华经》可知当时虎丘山寺院的佛教宗派属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为陈隋时代高僧智顓(538~597)所创立,智顓的思想渊源于北齐僧慧文和南岳僧慧思,他晚年住在浙江天台山著书立说,著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三部经典,世称天台三大部,智顓在天台山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集合了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成一家之言,世称这一宗为天台宗。

天台宗当时得到朝野的信奉和支持,对隋唐及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





有影响，世称智顛为天台智者大师，故也称天台宗为天台智者教的（见《五灯会元》），天台宗教义以《妙法莲华经》为依据，故又称法华宗。

天台宗和华严宗同是中国佛教之精华，其教义和学说由教、观两门组成，教包括教判和教理，天台宗的教判即“五时八教”，即将佛祖释迦牟尼一生说法分为五期，将说法内容和方式分为八种；天台宗的思维方法称“一心三观”，即“假、空、中”三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也称“圆融三谛”。天台宗的依据《妙法莲华经》由后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译出，共七卷二十八品，此经宣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宣扬济世，指归净土，特别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对民众特别是经历过苦难的民众其诱惑力极大，故在中国境内流传甚广。在诸高僧讲经、诵经中，此经为最多；在敦煌发现的写经中，也是此经比例最大，因此在虎丘塔内发现《妙法莲华经》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当时苏州地区流行天台宗的一个证明。但在佛教流传中，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由皇帝发起自上而下禁佛运动，包括苏州在内的广大地域中，佛教寺塔被拆毁，佛经被焚，故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佛教被“唐武宗一旦毁云而已，宣宗，稍复之”。经过唐武宗会昌禁佛和唐五代战乱，包括天台宗在内的佛教经典湮没殆尽，遂一蹶不振，以后天台宗传人僧羲寂，通过吴越国王钱弘俶遣使到高丽、日本访求天台宗典籍，高丽国派僧谛观送来教典，才使该宗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虎丘塔内发现的《妙法莲华经》正是吴越国王钱弘俶执政时由高丽僧送来的经典抄写而成。钱弘俶在位是五代后汉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的30年间（948~978），此金字法华经入塔时间为建隆二年（961），其抄写时间当还早些，但均在钱弘俶执政的吴越国期间。对于经历唐末战乱的吴地民众来说，能够导引至佛国净土的《妙法莲华经》该是多么珍贵的福音，当然会竭尽全力来抄写及供养。

对于佛经，信徒们是万分虔诚和尽力的，于是出现了用金（或泥金）来书写的情况，这应是书写中最高规格了，在以后瑞光塔发现的百余卷经卷中，也只有一套碧纸《法华经》用金书写，其多数仍以墨笔书写或印制，可见虎丘塔内这些经卷的珍贵程度了。但据2006年10月介绍“箱内原藏



经书已朽毁”（《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这很残酷，实在很可惜，真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流传至世界各地，中国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佛教信徒分布于广大区域。

佛教源自印度，由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创立，他看到当时社会黑暗及人生中生老病死诸苦相，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思，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

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无上正觉主要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牟尼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出发点是贪欲，因为无论出家人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上就是本人得以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另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佛寺，这财物就叫做净财，可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等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按：施钱物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按：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人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丰厚，不得使人不信。贪人却看到报酬之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财物来交换，来赎免曾经做过的恶事，这是阶级社会中掩饰阶级斗争残酷一面真相的。但在战乱频生的社会环境中，也确有减缓斗争、稳定社会的一面。在唐末至宋初的五代整体战争频繁的大局中，吴越国钱氏政权采取“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同时崇尚佛教，倡导建寺造塔，广传佛经，使佛教普及和深入民间，创造了相对安定和谐的小环境，使吴越国境内民众得以过上相对安定富庶的小康生活，虎丘塔的建造并最终完成雄辩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因为虎丘塔是一项非常巨大而精细的系统工程，即使放在具有现代





生产力的今天,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在一千年前的唐五代时期,在生产力低下情况下,一砖一木都来之不易。这种新颖的高层建筑,比之其前身,即曾经构建于同一地点的虎丘塔,无论地基、结构、砌作、选材都应是一种创新的探索,假如当时没有佛教寺僧的组织筹划,没有佛教教义的诱惑、宣传将是不可能成立的事情。这就如若没有隋炀帝的集中权力,就不可能组织当时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不可能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后我国南北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就不能这样畅通和及时,开凿大运河是一件具有历史功绩的大事,特别是江南地区受益颇多,我们不能因为隋炀帝是出于私欲的目的动机而加以完全否定的。同样,不管佛教方面出于何种动机,但客观上是由于民众的崇信而施舍钱财,使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在佛教寺僧的组织下集中起来,建造出这样一座巨大而精细的佛塔,这是一项古代土木工程的杰作,是凸现当时吴越国所在局部环境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化发展的千年丰碑,这一历史功绩是与佛教,特别是以《妙法莲华经》为基本经典的天台宗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

主要参考文献:

- 1.《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许平报道,《新苏州报》1957年3月31日
- 2.《虎丘塔发现经卷等文物目击记》,王冶秋报道,《文汇报》1957年4月12日
- 3.《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
- 4.《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5.《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 6.《五代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虎丘塔文物

【佛祖具象——虎丘塔发现的铜佛像】

佛教三宝为佛、法、僧，其首要者佛即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或称佛祖，佛祖涅槃后佛教中以佛舍利和佛像代表佛祖，佛像成为信徒崇拜的法宝，供奉于佛寺中或信徒居处，是佛教中最神圣的形象。

虎丘塔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以塔体加固为中心的维修工程中，发现了一批佛教文物，此中有两件为立像十一面观音，另两件铜佛像的其中一件作盘膝而坐状，高19.2厘米。这些文物表达了当时佛教崇信的状况。

一、铜佛像的发现

虎丘塔的这次维修工程是在1957年春节后的3月开始施工的，继3月30日在二层窖穴中发现第一批文物后，5月5日，“在塔的第三层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除中央部位放置由石函、铁函包装的金涂塔和佛舍利之外，还在周围发现了众多的文物。其中有“铜佛坐像，连座高19.2厘米，阔13.3厘米，制作也很精美”。

1957年第11期《文物参考资料》（即今日《文物》期刊的前身）刊发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和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均对此作了报道，并刊发了黑白照片各一幅。但文字过于简单，照片的清晰度也并不好。





2006年10月，正值由华裔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向社会公众开放之时，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书中刊载铜佛坐像照片两幅，铜一佛二菩萨像一幅，均彩色，尺寸颇大，分别为17.0厘米×17.5厘米和21.0厘米×28.0厘米，图像清晰可辨。该书中照片的说明文字分别为：

[宋]铜佛像坐像，高19.2厘米，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螺髻，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圆形蒲团座上，背面出一环钮，未见背光。

[宋]铜一佛二菩萨像，宽13.3厘米，高19.2厘米，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底座呈复盅状，上接三个枝形藕生仰莲座，佛结跏趺坐于中间莲座上，两侧莲座上为立相菩萨。造型轻巧优美、疏朗明快。

以上说明中，外文部分均略去。

当时发现情况大致如此。

二、关于佛祖及其造像

佛，是梵语音译佛陀的简称，意为“觉悟者”，是对彻底觉悟佛教真理的人的尊称。觉，有自觉、他觉、觉行圆满等意。小乘佛教所指的“佛”，往往是专指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大乘佛教除了专指教主释迦牟尼外，还泛指一切觉悟得道者。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者，是公元前5世纪时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在思考苦、无常、无我、缘起、解脱等后，创立合乎理智的示导人类转迷开悟、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教说。后人尊称其为佛祖、佛陀、如来、世尊、释迦等。

早期的佛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因为佛本人是不赞成偶像崇拜的，认为那是一种执著。而“执著”就是障蔽人们的目光，看不见前行的道路，以至迷失方向，佛教叫做：迷失本性。因此，在释迦牟尼在世以及他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约500年）内，佛教并无制作佛像之举，此时在佛教艺术作品中，往往以莲花代表释迦的诞生，以菩提树代表佛的成道，以法



轮代表佛的说法，以佛塔代表释迦的涅槃（去世）。

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中卷二十八《优填王作佛形象经》，大致说佛为母亲说法，往忉利天，三月不还，优填王甚为思念，于是以旃檀木造释迦像一尊，高五尺，以解思念之苦。及至佛还，见其像立而迎之，乃为优填王讲说造像之功德……

优填王的造像，可被视为最早的佛造像，其意义是出于佛弟子对佛的思念，包含着对佛的虔诚、礼敬与渴念，这其中更重要的意思是“见贤思齐”。以后晚起的大乘佛教更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佛祖释迦不仅是导师，而且是个具有各种神通的超人。佛祖释迦的肉身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法身却依然与世长存，而且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在宗教修行实践中，他们不仅崇拜舍利、佛发、佛指甲、佛齿等与佛祖有关的东西，还直接崇拜佛祖的形象。这一时期出现的大乘经典《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佛像经》、《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都极力宣说建造佛像具有巨大的功德，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等。在此思想影响下，大乘佛教徒开始大量制作各种各样的佛像。

佛像，广义地说，不仅仅是指佛祖的尊像，还包括各式的佛教造像及图像。狭义的则专指佛祖的造像。其制作材料也很多，有金、铜、铁等金属材料铸造的像，也有以岩石雕凿的像，以泥土塑造的像，用木材雕刻的像。其中以金属和岩石的造像最宜保存。虎丘塔发现的佛像文物就有石、铜、铁、木等多种。

佛教初来中国时，佛像就曾同时迎来。晋袁宏《后汉纪》说：“初（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这是关于佛像最初传入中国的记载，《后汉书》所记，大致与此相同。又《佛祖统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并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国迁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68），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迁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从这些记载上，





可以知道当时的佛经、佛像是同时来中国的，中国的佛教雕刻大概就是以此为最初的造像范本。

佛教雕刻以佛像为主，佛像的式样，在中国历代都有变化。佛像在印度，因属热带气候，衣着极薄，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佛祖造像，都是所谓“偏袒右臂式”。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头，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条。在云冈第八窟和第二十窟的左右胁侍是所谓“通肩式”，宽袖而薄的长衣紧贴身上，随着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以上两种衣服式样，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很流行，大致是印度传入时的式样，其后也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中的“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在云冈第十九窟中就有此式，这是中印两国受不同气候及习俗的影响，而表现在造像艺术上就有着不同的形式。

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由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匠师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艺术，创作出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包括佛像在内的佛教艺术品。如两晋南北朝的佛像多“秀骨清相”，唐代佛像丰满端丽而显得雍容华贵等。

三、虎丘塔发现的铜佛像及其意义

虎丘塔内发现的这尊铜佛坐像，头部螺髻凹凸明显，鼻梁高出，双耳下垂至肩部，脸部整体显得清瘦，服饰为“偏袒右臂式”，颈部有披巾缠绕，右胸及右臂裸露，宽衣自左臂披下裹持以下大部体躯，作结跏趺坐，或称全跏坐或正跏坐。在衣褶中隐约可见此姿势是以左右两脚脚背置于左右两股上，足心朝天。相传佛祖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证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姿势。双手的上下秩序以左上者称为降魔坐。此坐像坐于圆形蒲团座上，且佛像表面锈蚀多处，尤以下部前面膝部上下为甚。据此特征判断，此一铜佛坐像，当为早期铸作，为唐代初期或更早一些的作



品。因体量甚小，当为民间私家敬佛所用。

另一尊铜一佛二菩萨组像极见工巧，最下部为一竖直向上五藕段，由藕节处向上丛生出莲花及花苞于下方，向上生出莲叶四片及莲座三座，中间较大之莲座上有作跏趺坐之佛一尊，服饰为“偏袒右臂式”。左手垂于左股上，右手向前右方全伸作接引状；头部有火焰状头光，向上与左右两头光连结到一起呈一尖山状，左右两较小莲座上各立一菩萨，身姿各作向中间佛靠拢之略长S形。头戴高冠僧帽，身穿齐胸之袍服，直下至足部，胸前挂瓔珞斜沿至膝部，有披巾自头部下挂于身体两侧。右菩萨左手持拂尘向上，右手持净瓶向下。左菩萨双手亦一上一下作迎接状，但未持器物。头部均有火焰形头光，向上与佛头光连作尖山状。整体造型玲珑剔透，轻巧疏朗，在庄严中显出轻盈灵动。此组像当为阿弥陀佛像及侍立菩萨，其塑造之姿态为接引崇佛弟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由于体量较小，当亦是民间私家所藏之敬佛所用。其制作时间也为稍迟于铜坐佛像，当在中唐早时，是西方三圣佛像的一种变异，是净土宗教派的证物。

五代时期，苏州地区经唐代会昌法难后，佛教寺塔尽毁，佛寺内大型佛像也被焚毁。唐代后期至五代初期又经兵燹，虽钱氏政权在唐末已管辖吴地，但战后经济恢复尚需时日，佛教寺塔的恢复更需相当时间的财力、物力来支持。故当经过数十年的艰难经营，在大型而精巧的虎丘塔行将竣工前不久，吴地民众在吴越国王倡导下，形成了一个崇佛信佛的热潮，纷纷将私用而珍藏的佛教文物或非佛教文物（如铜镜）均供养给寺塔之中。这就是我们所发现这些文物的来由。虎丘塔的艰难建成及其中供养的包括铜佛造像在内的文物遗产的入藏，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五代至北宋初年，苏州地区实际也是吴越国境内政治、经济、宗教、科技及文化艺术上的状况。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4.《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 5.《佛教手册》，宽忍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 6.《佛教艺术百问》，丁明夷、邢军著，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7.《中国佛教图像解说》，业露华撰文，张德宝、徐有武绘图，上海书店1992年9月第1版
- 8.《佛教与中国文化》，张曼涛主编，上海书店1987年10月第1版



虎丘头山门康熙帝题匾



發現美越

虎丘塔文物

【菩萨至像——十一面观音铜立像】

苏州云岩寺塔坐落在古城西北虎丘山上，因山命名俗称虎丘塔，虎丘塔是一座七级八面套筒结构的楼阁式砖构佛塔，今残高47.70米，虎丘塔初建于唐代晚期至北宋初年完成，至今已一千余年。20世纪50年代时，塔体倾斜、裂缝纵横，奄奄一息。党和政府及时拨款和组织力量对古塔进行抢修，在施工中发现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两件十一面观音立像是本文拟介绍的对象。

一、十一面观音立像的概况

1957年5月5日，虎丘塔在加固塔体为中心的抢修工程中，继3月30日在第二层发现佛经等文物后，在塔的第三层又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当对“在塔的第三层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除最中间的由石函、铁函包装的金涂塔和佛舍利外，在其他文物中，还有铜佛像四件，其中“两件为立像十一面观音，高23.5厘米，一件头已断，足踏莲座，一手持柳，一手执瓶，衣饰璎珞，均颇工细”。

在1957年第十一期《文物参考资料》中刊发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一文和1958年7月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都刊登了这两件十一面观音铜像的照片，不过都是黑白的，且幅面较





小，如《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中的照片仅5.7厘米×7.7厘米，图像模糊，较难分辨。

2006年10月，当由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对公众开放之时，《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也应运而出版，其中第49页整版刊登了此二件十一面观音铜立像的彩色照片，幅面达21.5厘米×28.5厘米，在第48页上的文字介绍是：

[宋]铜十一面观音立像(2尊)，高23.5厘米，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两尊十一面观音像大体相同。观音像在束腰莲花台上，一脚向侧前略伸，身穿天衣，一条飘带轻轻搭在手上，左手持一宝瓶。全身佩有璎珞、耳珰、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装饰，一条珠链从项颈处垂至足背。身式略呈“S”形，姿态优美。身后有插背光的小孔，但在出土时已不见其背光。

以上说明中，外文部分省略。这是文献方面关于十一面观音铜像的概括。

二、关于十一面观音

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受到最普遍、最广泛的信仰，而2005年除夕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也是千手观音。在佛教各种图像或造型中，观音菩萨的像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极大。虎丘塔发现的十一面观音铜立像只是其众多造像中的一种。

观音，音译阿缚卢枳湿伐罗，是以慈悲救苦为本愿的菩萨，又作光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观世自在菩萨、观音声菩萨、窥音菩萨，略称观音菩萨，别称救世菩萨、莲花手菩萨、圆通大士。在佛教中，观音菩萨是西方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合之世称西方三圣。

据佛教经典讲，世间众生在碰到各种困厄灾难时，只要信奉观世音菩萨，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这时菩萨就会“观其音声”而前来解救，使受难众生及时得以脱困，所以这位菩萨的名号就称为“观世音”。唐时避



观世音

虎丘塔文物

太宗名而称“观音”。又因其于理事无碍之境，达观自在，故也称观自在菩萨。据专攻佛学的钱文忠教授解读《大唐西域记》，在古代印度，此菩萨原译为观自在菩萨。

佛教中关于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很多，最流行的是《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集中叙述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功德和能力，因此这部经译出不久，这一品就被人广泛传抄，单独流行，并且被称为《观世音经》。

经中说，观世音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如果众生遭受水火之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大火就能够不烧，遇水淹即得浅处；如众生因刀兵相加，或有牢狱之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观世音菩萨能给处于危难中的众生以无畏的力量，使他们不畏恐惧。他能满足众生生儿育女的愿望，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且是“福德智慧之男”和“端正有相之女”。

经中还说观世音菩萨能显现各种化身，说法救度众生，还能以各种不同身份，随机变化，宣说佛法，点化众生，确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在《观无量寿经》等宣扬西方净土思想的佛经中，还说到观音菩萨会随同阿弥陀佛一起接引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因此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仅在两晋之际，观音菩萨的信仰就已开始流行于社会，至南北朝时，因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使宣称能在现世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日益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宣扬观音菩萨灵验感应故事的书籍，如南朝刘义庆编著的《宣验记》，傅亮编著的《光世音应验记》，王琰编著的《冥祥记》等等。因有关观音的神话传说符合当时民众要求摆脱苦难，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而且以慈悲济度为本愿的传说使大家感到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观音信仰在民间迅速高涨。

在佛教各种菩萨像中，观音菩萨像的种类最多，这就与观音有各种化身的说法有关。但在初时，作为“西方三圣”之一，与大势至菩萨一起随侍于阿弥陀佛身边时，观音菩萨头戴宝冠，冠上有化阿弥陀佛像，其他形象及衣物装饰则与别的菩萨像没多大区别，后来密教经典又往往把一些秘





咒(陀罗尼)与观世音菩萨相联系,还规定了在持诵这些秘咒时相应的仪轨以及需要礼拜供奉的特定的观音菩萨的形象,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六观音、七观音之说。这些观音中,主要的有马头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等,而这些观音是圣观音(或称正观音),即密教所说的“六观音”的总体或正体的化身。

十一面观音,别名大光悲普照观音,密号慈愍金刚,密教六观音之一,从其名字就可知道他有十一个面相,其基本形象应是在本来的观音像再加上十个面相合为十一面,其上十面,有人认为是佛教所说的“十方”的具体化,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婆罗门教,另外还有一种是在本面之上再多十一面,合为十二面的,但亦称为十一面观音。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形象,有多种不同形式。依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所述,为前三面作菩萨面,左三面作嗔面,右三面似菩萨面,狗牙上出,后一面作大笑,顶上一面作佛面,面部都向前,各戴华冠,冠中各有化阿弥陀佛。左手持澡瓶,瓶口出莲花,右手串璎珞,作施无畏印。另不空三藏所译《十一面经》所述者则为四臂,右边第一手持念珠,第二手作施无畏,左边第一手持莲花,第二手持澡瓶。还有一种十一面是本面左右各有一面,其上五面,再上三面,共计十一面。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尊石雕十一面观音像,出土于西安市西郊,其仅有头部,残高25厘米,其头部正面上有二层,下层左右各四个面部依次排列,上层前后各一个面部,每个面部上面各有一尊阿弥陀佛坐像。而虎丘塔内发现的两尊十一面观音铜立像又与上述各式不同,是在头部正面之上分三层排列共十面,下层为五个面,中层为四个面,上层仅一个面,均向前朝向,自中向两侧排列,共计十一个面。

三、十一面观音立像发现的意义

虎丘塔在1957年的维修加固工程中,先后三次发现珍藏于第二层、第三层窖穴中和四、五层堆积层中的一批文物,其中属于佛教造像的有石制的石函1件,铁制的佛龕1件和金涂塔1件,木制的佛龕1件,铜制的包括十一



面观音立像在内也只4件，另有断头残损的石造像4件，总计只有12件，且体量颇小，两尊十一面观音立像高度只23.5厘米，另外的铜佛坐像和一佛两菩萨组像，其高度都不超过20厘米，四尊铜像的重量都只在1000克上下，一座著名的寺院，一座巨大而精美的佛塔，只发现了这样几件且体积颇小的佛教造像，两者比较，实在是颇不相称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在今存虎丘塔的建造前不久，大致相当于唐代后期的一段时期内，苏州地区的佛教发展方兴未艾，在刺史白居易等推动下还有所发展。据《吴地记》知唐时有南禅寺等数所佛教寺院，白居易离任至洛阳后，还将自编的诗文集抄录一份，置在南禅寺内。可是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841~846）事件却给包括苏州在内的各地佛教予以极大冲击。北宋朱长文在其《吴郡图经续纪》中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唐武宗时一旦毁矣”，大约是避皇帝的讳不能多说，但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却将“会昌法难”情景记录得非常详尽：“三四年來，天下州县（笔者按：指唐朝管辖地域）准教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是说“会昌法难”时毁尽佛教寺院及所属铜铁佛像及佛经等物。会昌以后，唐宣宗时虽说要恢复佛教寺庙及所属诸物，但唐朝已至晚期，实在无力置办。随着唐末的战乱，苏州地区一直动荡不定，直至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后，苏州由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所管辖。在钱氏“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大政决策下，才开始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佛教恢复、民众富庶而文明繁荣，这也才开始有虎丘塔的建造及塔内文物的入藏。但这些都由信佛的民众所供养，限于民力的恢复时间不长，故出现这样铜质佛像数量不多且体量较小的状况。但这毕竟是当时民众崇佛热潮中的场景，这些文物及有关题记忠实记录了这场崇佛热潮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及宗教信仰的实物证据。

在四尊铜制佛像中，有两尊是十一面观音立像，而观音立像的出现说明当时虎丘山寺的佛教宗派是属于天台宗（或称法华宗）一派的，因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修佛经，其中就有专门的《观世音经》，是特别推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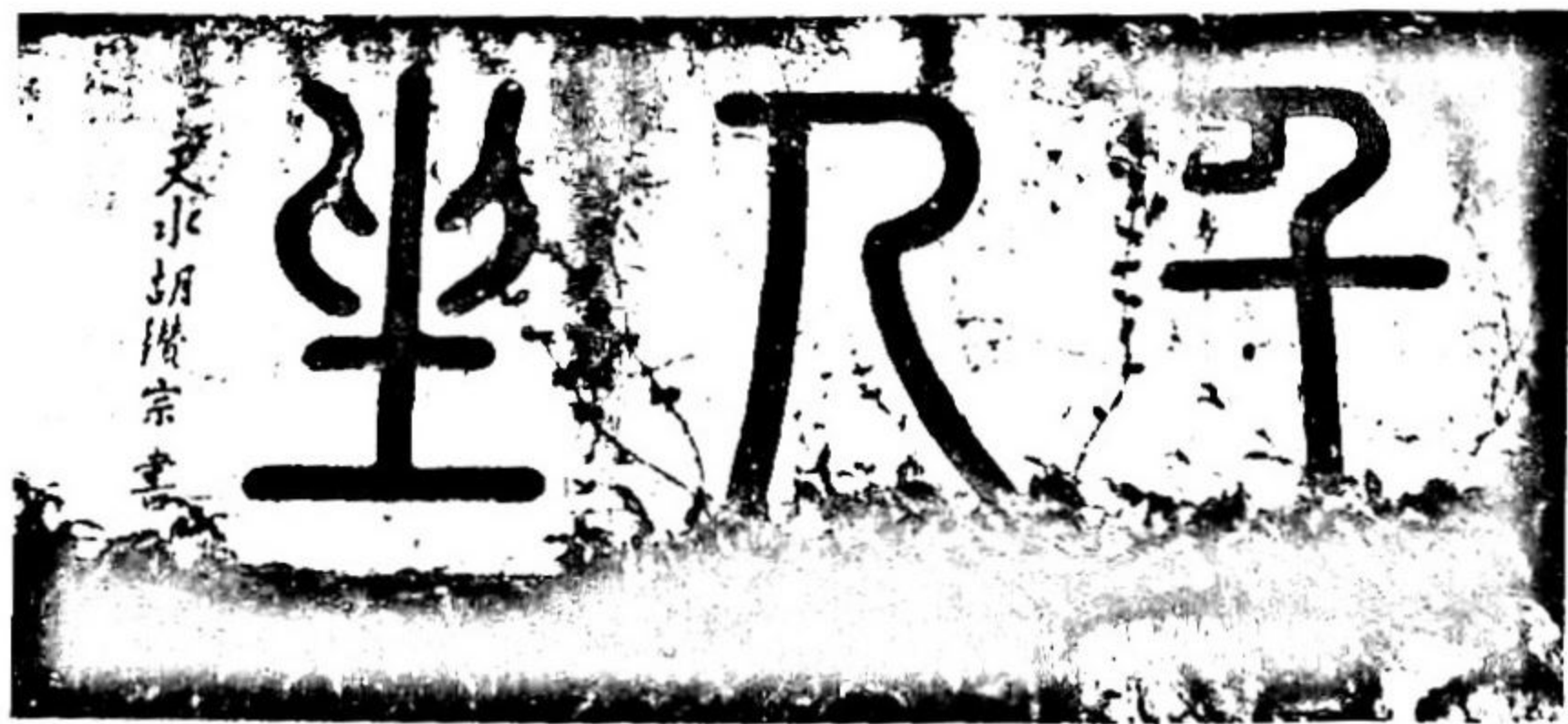




音菩萨的，而十一面观音菩萨的出现又说明在一定程度还受到密教的影响。五代时北方后周世宗柴荣又在大肆禁佛，北方佛教诸宗派纷纷南下，投奔正热衷倡导佛教的吴越国境内，故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境内是佛寺林立，宗派众多，且相互融动，使佛教宗派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这是五代的佛教在急剧变化中为适应环境而调整的状态和趋势。至宋代，佛教又更多吸收儒、道中的理念，出现了三教合流的更适合环境的崭新状态。

唐代以前观音菩萨的面相呈男性，面部留有小髭，敦煌石窟中有此类造像，但至唐代逐渐向女性化过渡。中国民间流传有大悲观音菩萨为妙庄王幼女妙善之论，现存河南宝丰县。宋元符三年（1100），由蒋之奇撰文、蔡京书丹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碑文内容记述大悲观音菩萨修道经过，并记碑文原本系唐终南山道宣律师所传。故自唐以来，观音菩萨逐步呈现女性化，至宋代观音菩萨的女性化完全定型，而中晚唐及五代时期，正是观音菩萨处于向女性化演变的进程中，虎丘塔内的这两尊十一面观音菩萨正处于变化的进程中间，故面相的女性化并不十分明显，是属于比较中性的面相。

虎丘塔内的这两尊观音立像，整体秀丽可亲，身姿苗条灵动，庄严中不乏妩媚，与民间众生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正是观音菩萨深入民间、走向民众的一种形象。总之，这组十一面观音铜像折射了唐末五代至北宋期间吴越国境内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习俗、科技及艺术的状况。



明胡纘宗题虎丘摩崖石刻“千人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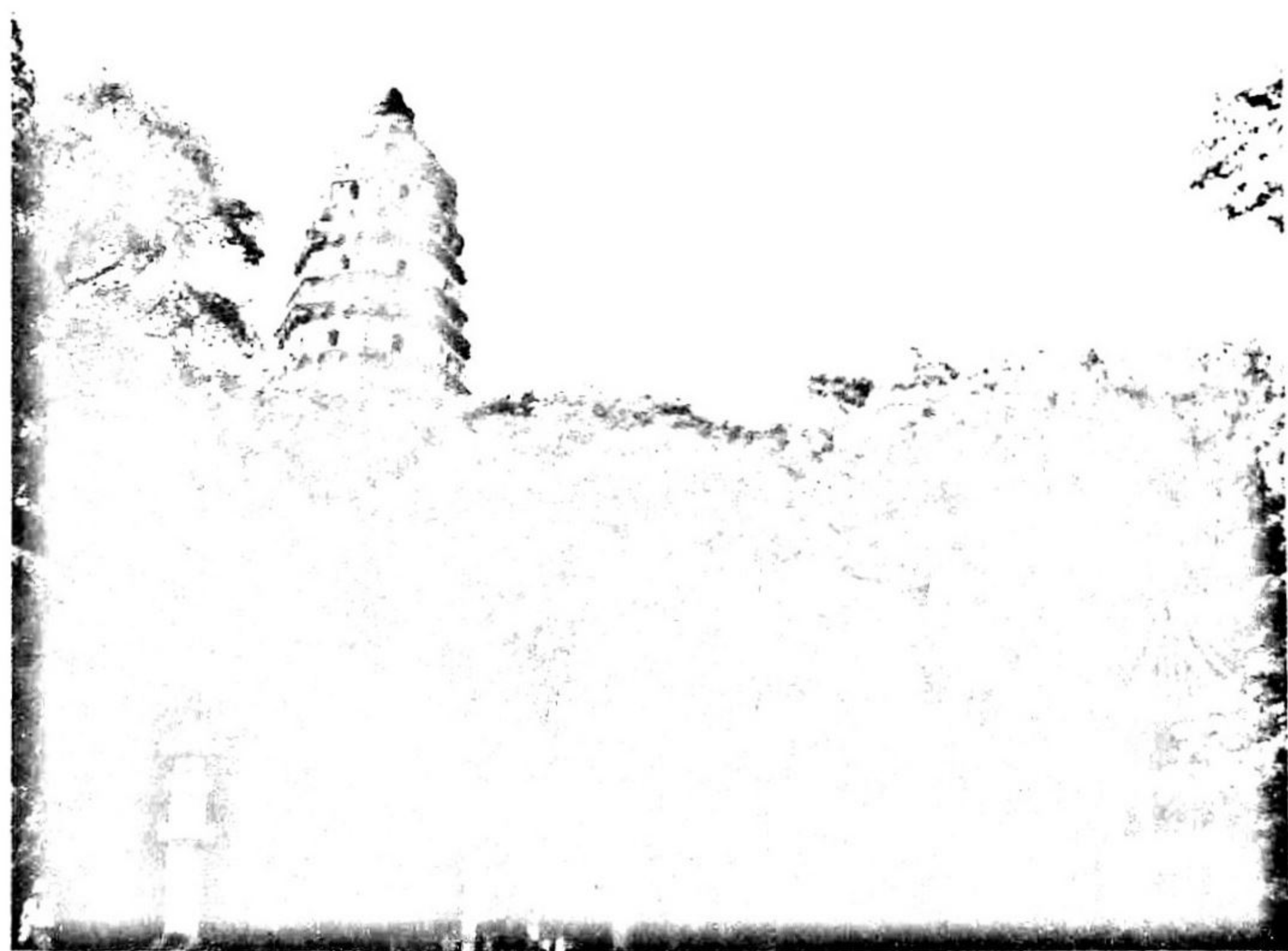




虎丘塔文物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佛教手册》，宽忍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 4.《中国佛教图像解说》，业露华撰文，张德宝、徐有武绘图，上海书店1992年9月第1版
- 5.《佛学大辞典》，丁福宝编纂，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1版
- 6.《佛教艺术百问》，丁明夷、邢军著，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圆仁著，顾承甫译，何泉达点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 8.《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9.《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虎丘塔及吴越经幢





【劫后余生——一组残石造像】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文物展示中，题为“吴塔国宝”的两塔文物陈列非常受人青睐，观众总是踊跃不绝。而其中“宝藏虎丘”展室中的一组残石造像展品更受人关注，观众至此总会感到惊异、疑惑、惋惜而止步久驻。有的观众甚至发出这样的提问：“是不是因为在‘文革’中，它们受到了冲击而掉了脑袋的？”

一、虎丘塔上发现的一组残石造像

这组残石造像共四件，即三尊无头石造立像和一座残损小半的残石造像佛龕。它们是1957年6月16日于塔的第五层上发现的，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千年危塔进行的第一次维修加固工程，目的在加固塔体，阻止倾斜发展，修复裂缝。在施工中先后三次在塔的二、三、四和五层中发现了众多的佛教文物。随后在1957年、1958年和2006年先后对这些发现文物进行了报道和出版，分别是《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刊发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和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及2006年10月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以下称《简报》、《出土文物》和《两塔文物》）。

这些媒体先后由简至稍详细介绍了包括这组残石造像在内的这批文物，其中《两塔文物》是这样介绍这组残石造像的：



第56页和57页分别刊登了两幅尺寸颇大、清晰度较好的照片，它们的名称和说明如下：

[宋]残石造像(3件)，通高31.5厘米，1956年(笔者按：应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五层发现。佛弟子或供养人造像。两件造型相同，发现时即无头，颈部有断茬。着交领广袖长袍，拱握双手，以两臂捧经卷于胸前。恭立于方形台座之上。一件双手合于胸前，持如意。

[宋]石造像龕，高24厘米，1956年(笔者按：应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四层(笔者按：应为第五层，见《简报》和《出土文物》)发现。石龕右侧残损，龕内浮雕佛像一尊，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龕左侧边框上阴刻有“李太缘为自身造佛一躯”的题记。以上说明中，外文部分已略去。

以上三尊石造像虽已无头，但据其形体、服饰和持物分析及说明文字介绍，其中两尊着交领长袖偏衫且持经卷者当为“佛弟子或供养人”，即尚未剃度的世俗佛弟子或供养人；而另一尊着圆领袈裟服者当为已经剃度的僧人。

残石造像佛龕中，已由题记文字可知其中浮雕者为佛像。其着交领袈裟、直裰服饰即佛祖释迦牟尼的造像，而绝不是有的人理解造像为“李太缘自身”(见虎丘云岩寺塔陈列室相关照片的说明词)。李太缘当为崇信佛教的施主，即供养人。按照佛教的教义和惯例，崇信佛教的人向佛教寺院施舍财物称布施或供养，布施的人称施主或供养人，佛教理论还说布施以后，供养人可以得到佛法无边的佛祖的保佑，只要许愿，佛祖可以保佑供养人本人或其亲友的福祉。本题记就是供养人李太缘花钱捐舍了这座石造像佛龕时向佛祖许愿的内心独白，即佛祖保佑李太缘自身的福祉，其完整的表达应为“李太缘为自身许愿供养而造佛一躯”，其中一些文字做了省略(佛龕侧面边框面积有限)，只能表达为现今的状况。佛龕供养的许愿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亲友购置，甚至两者兼之。这在虎丘塔的文物题记中都是有的。





二、虎丘塔下发现的一块残石塔碑

无独有偶，继虎丘塔上发现残石佛教文物后，在1981年至1986年进行的第二次维修加固工程中，施工时又在塔下发现了一件关于佛教的残石文物，即题为“朱明寺大德塔”的残石塔碑。

因这次维修工程目的在加固塔基和地基，要从源头上解决虎丘塔的倾斜及安危问题，故施工多在塔下。1984年10月10日上午10时余，当施工开挖塔内西北回廊基土下约50厘米处时发现此残石塔碑。虽在市修塔办公室管理人员指导下继续向纵深和周围开挖，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文物出现。

这块残石塔碑情况见1992年第4期《苏州文博》介绍：

残碑形制是：宽45厘米，厚13厘米，碑面有文字处凹下3厘米，残石最高处为26厘米，碑顶平面，两边转折下落，呈削肩状；砂质石制作，背面粗糙，正面低下处留有碑名和碑文22行。碑名“朱明寺大德塔”，分三行，每行直排二字，自右向左排列。

碑文22行，亦直排，自右向左排列。（以下略）

以上碑文连碑名共能辨清的字为77个，因缺失文字太多，前后意义并不连贯，难以说明碑文的内涵。

据碑文首句“唐苏州朱（明寺）”可知，残碑系唐碑，且文中出现“大历四年”（769），“长庆”（821~824）和“宝历”（825~826）三个唐代的年号，它们分别是唐代宗李豫、唐穆宗李恒和唐敬宗李湛使用的年号。

碑文中的朱明寺，据唐陆广微《吴地记》可知，确有此寺，在今城内景德路、中街路一带，“晋隆安二年，郡人朱明……乃舍宅为寺，号朱明寺”，隆安二年为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执政的次年，即公元398年，虎丘山上有佛寺始于东晋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珣之舍宅为寺前后，时当在咸安二年（文献皆误为咸和二年即327年，与王珣生卒年不合），即公元372年。但当时佛寺无名，这朱明寺极可能是虎丘山上佛寺的首个名称，而朱明寺大德塔也极可能是虎丘山上至今留下的第一个塔名。碑文中的唐代年号也必与佛塔有关，之所以要将此残石塔碑与残石造像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和



探索,是因为二者都是佛教寺塔之物,二者分别在同一佛塔之上下发现,更因为它们同遭人为的外力打击所致造成残损。这残损必令我们考虑佛教在中国发展及其阻厄,特别是佛教的法难乃是造成残损的直接原因。

三、残损石质佛教文物的时代鉴别

虎丘塔上和塔下先后发现的残损石质佛教文物既有其相同的遭遇外力打击的环境,也有其时代的原因,这是几近一致的。虽其产生文物的时代可能有先后,但其遭残损的时代应大致相近。今试分析这批残损石质佛教文物的时代。

在时代鉴别上说,残石塔碑应是最为明白的,其碑文内容虽不能完全读出,但文中出现的三个唐代年号,特别是其中时间上最晚的年号“宝历”,却是最接近塔碑产生与致残的时间,宝历是唐敬宗李湛使用的年号,其使用的时间只两年,即公元825至826年,此塔碑产生应在宝历年间(825~826)或其后,若此碑致残与打击佛教最大的“会昌法难”有关,则其致残与碑产生相隔时间最多也只有20年,即是会昌五年(845)的事了。此在下面文中再详述。

若以残石塔碑为准,则这组残石造像的致残时间也当在会昌年间(841~846),但这组残石造像本身的特征也可分析出其产生即制作的大致时间,如残石造像佛龕的题记“李太缘为自身造佛一躯”十字,其字体为手书楷体阴刻而成,当由供养人李太缘书写或请人书写再刻制而成,其字大小并不一致,“李”、“缘”、“躯”等字较大,而“自”、“为”等字稍小,书写虽随意,但亦见唐人手书之习惯,其中“身”字上半部紧挨下半部的一撇很舒展,“躯”字左边的“身”字偏旁也是如此。这与敦煌发现的《证明经卷》写本的手书体较为接近,而《证明经卷》的书写时间为初唐高宗时的永徽年间(650~655),由此可知残石佛龕的制作时间可以早至初唐时,其与今存虎丘塔将近竣工时,即建隆二年(961)入塔的文物题记,如陆七娘铜镜题记、经箱言细招题记等的书写习惯是很不一致的。比起后者的书写随意与潦草,残石佛龕的制作年代是明显早于后者较长一





段时间的。

残石佛龕上只有浮雕佛像一躯，内容简单明了，佛像造型头部刻线简洁流畅，上部为前突一结的稍高发髻，穿着交领袈裟直裰服饰，眼部微开作沉思状，面容慈祥而丰满，这与虎丘塔二层发现石函上身披头光背光的一佛二菩萨二侍者的浮雕组像及三层发现的铜螺髻佛像相比较，据中国佛教造型及服饰的演变规律分析，其简洁的早期制作特征是很显然的。

三尊无头石造像中，两尊着交领便服，胸间束有腰带，且下垂缔两个蝴蝶结，明显不是僧装，但亦非儒服和道服，而是一种崇佛弟子的服饰，两手握合以托经卷，时代应不晚于中唐；而两手抱合上托如意，着圆领长袖袈裟和直裰者，明显为着佛装之僧人，唐时佛装与僧装尚无明显区别。据研究佛装的专业人士陈悦新先生说：“汉籍中记录僧装与佛装有别始于宋代，僧装出现交领和袖。”此是明显早于宋代的僧人服装。

还有一个鉴别时代的标志是材质。石质佛教人物造像一般为稍早时间制作的，因石质易得而价廉，且加工制作简便，稍后的佛教造像多用金属及木质，其加工复杂，表意精细，如二层、三层有“建隆二年”年号题记的佛教造像，均为金属和木质制作。除作石函者外，已无用石材加工为佛造像者即是此情况的证明。

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判定，虎丘塔五层发现的这组残石造像其制作年代当不晚于唐代中期向晚期转变的唐敬宗宝历年间。

四、中国佛教的发展与“会昌法难”对苏州佛教的影响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逐步汉化，发展成中国佛教。佛教基本教义宣扬四谛、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其对民众有欺骗、麻痹斗志的作用，故长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支持，因而能得以发展和壮大。但佛教教义与实践又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及其代表的儒、道二家不合，故从一传入中国就受到儒、道思想及人物的排斥和打击。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规模宏大，宗派众多，信佛人数和占用田地、财富都达空前程度，但随之而来的打击也极为激烈。中国的政治，历来是一种



帝王政治，国家和权力往往集中于帝王手中，佛教与帝王的关系，既有相互利用、支持的一面，也有排斥、打击的一面。当佛教所控利益与朝廷利益矛盾激化时，就发生由封建帝王发难打击、排斥佛教的举措和动作，这就是中国佛教的“法难”。其中北魏太武帝禁佛、北周武帝禁佛、后周世宗禁佛和唐武宗禁佛这四次最为显著，历史上称为“三武一宗”禁佛事件。

在上述四次“法难”事件中，除唐武宗外，其余三次发难的帝王都不是中国统一政权的帝王，他们的实际管辖范围都只限北方的中原地区，对于地处江南的苏州都是鞭长莫及，不能实施其发难的举措。前两位发难时，江南由南朝统治，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南朝政权是佛教积极的宣传者和参与者。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概括了包括苏州地区在内的江南佛教发展的状况。从苏州地区保存的历史文献看，苏州地区的早期佛教寺庙多在此时创建。如虎丘所在的佛教寺庙，就是由东晋时人王珣、王珣兄弟舍宅为寺而成。而后周世宗实施“显德法难”时，苏州属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管辖，钱氏政权的执政者吴越王钱弘俶，更是南方佛教的领袖。北方禁佛激烈，江南大造佛教寺塔，其中一次曾造称为“宝篋印经”式的金涂塔达八万四千座，对台戏唱得太有趣了。而今存的虎丘塔也恰是在钱弘俶管辖的时间里（948~978）最终完成的。唐武宗是四次佛教法难中唯一的全国统一的执政者。不言而喻，其管理权力当然直达苏州。

“会昌法难”发生于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841~846），唐武宗好道术，深受道士赵归真影响，并亲受法箓，且由坚决反佛的宰臣李德裕辅政，故自会昌二年（842）起禁佛，雷厉风行地推向全国。《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

敕上都、东都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使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也据实记录了此次法难。他说：





三四年來，天下州縣准敕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毀拆佛堂、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天下剝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斤兩收檢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唐時蘇州不屬節度、觀察治所，按照武宗旨意不能保留一所佛寺，故蘇州的佛教寺塔、經像器物也當在此時遭到毀滅性打擊。除當時稱開元寺即今報恩寺藏有唐玄宗聖像而幸免，虎丘塔上發現的這組殘石造像、塔下發現的殘石塔碑，甚至連同寺廟主體建築的佛塔均為此時受“會昌法難”而慘遭打擊致殘甚至毀廢消失，應是沒有什麼疑義的。宋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說蘇州佛寺“唐武宗時一旦毀云”，證實了此況。

唐武宗以後，唐宣宗雖有恢復佛教的願望，但“會昌法難”對佛教的打擊確實慘烈、徹底，恢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直到五代時，吳越國才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恢復的舉措，蘇州地區的佛教寺塔也才得以恢復和重建。而今存虎丘塔的修建並最終完成，則是一個實際的例證。

五、關於這組殘石造像發現的推測

據現有文獻及實物資料分析，虎丘山上建有佛塔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是東晉至南朝末（327~589），大致到梁、陳時才建有樓閣式木塔，這有南朝江總和張正見的詩句“貝塔流光動”“洞塔躍山莊”等為證。第二期為隋至唐會昌年間（589~846），此時虎丘的佛塔由隋文帝於仁壽元年（601）建造，是全國三十個州由朝廷頒布的统一圖紙同時建造的三層方形樓閣式塔。此塔圖樣近年已由中國佛塔史學者張馭寰先生繪出（《中國塔》）。



虎丘劍池前門洞“別有洞天”



根据木塔的寿命约百余年及残存的唐代塔砖,可知唐大历四年(769)还建有一座砖木混构的佛塔。第三期为唐会昌以后至宋太平兴国以前(846~976),这一时期为今存砖构虎丘塔建造的准备、筑基和建造期。因原有塔已毁,新的塔尚未建成,故唐代出现过的关于虎丘有塔的诗文至会昌时戛然而止,再出现有关虎丘塔的诗文,已是宋庆历后的事了,这一段空白时期正是新老塔的交替时期。这一时期前后经历约130年,正是此一时期的早期筑基将残石塔碑夯入塔基土之中。而在今存虎丘塔行将竣工前收拾场地时,即大致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又将散置在场地中的这组残石造像与别的相关器物放置于塔之五层楼层中,这种营造及处理方式至今还在沿袭。新中国成立后,吴县文管会主任张志新先生也还是这样,将场地上散置的佛教相关文物,在竣工前收拾整理,仍旧放还于修缮后的寺塔中去。

这组残石造像经历了“会昌法难”和虎丘塔重建的过程。“会昌法难”实是代表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与外来的佛家思想的一次激烈碰撞和抗争,也是唐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矛盾的集中反映,而虎丘塔在“会昌法难”以后的重建,则是在吴越国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决策指导下,苏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民俗的一次成功的大整合。在虎丘塔内发现的这组残石造像正是唐代中后期向北宋初年过渡演变的见证之物。

文物有幸。相隔千年之后,这组残石造像还和包括我们在内的广大观众对话,诉说着当年苏州地区的历史及佛教兴衰的经历。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2.《简明中国佛教史》,[日]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力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 3.《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重版
- 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圆仁著,顾承甫译,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 5.《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第3版





【佛证供养——李太缘题记石造像龕】

李太缘题记造像龕是一件发现于苏州的佛教文物，要解读这件佛教文物必须了解苏州地区在此前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状况。宋代文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寺院》中说：

自佛教被于中土，旁及东南，吴赤乌中，已立寺于吴矣。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寔盛于唐。唐武宗一旦毁云，已而，宣宗稍复之。唐季盗起，吴门之内，寺宇多遭焚剽。钱氏帅吴，崇嚮尤至。于是，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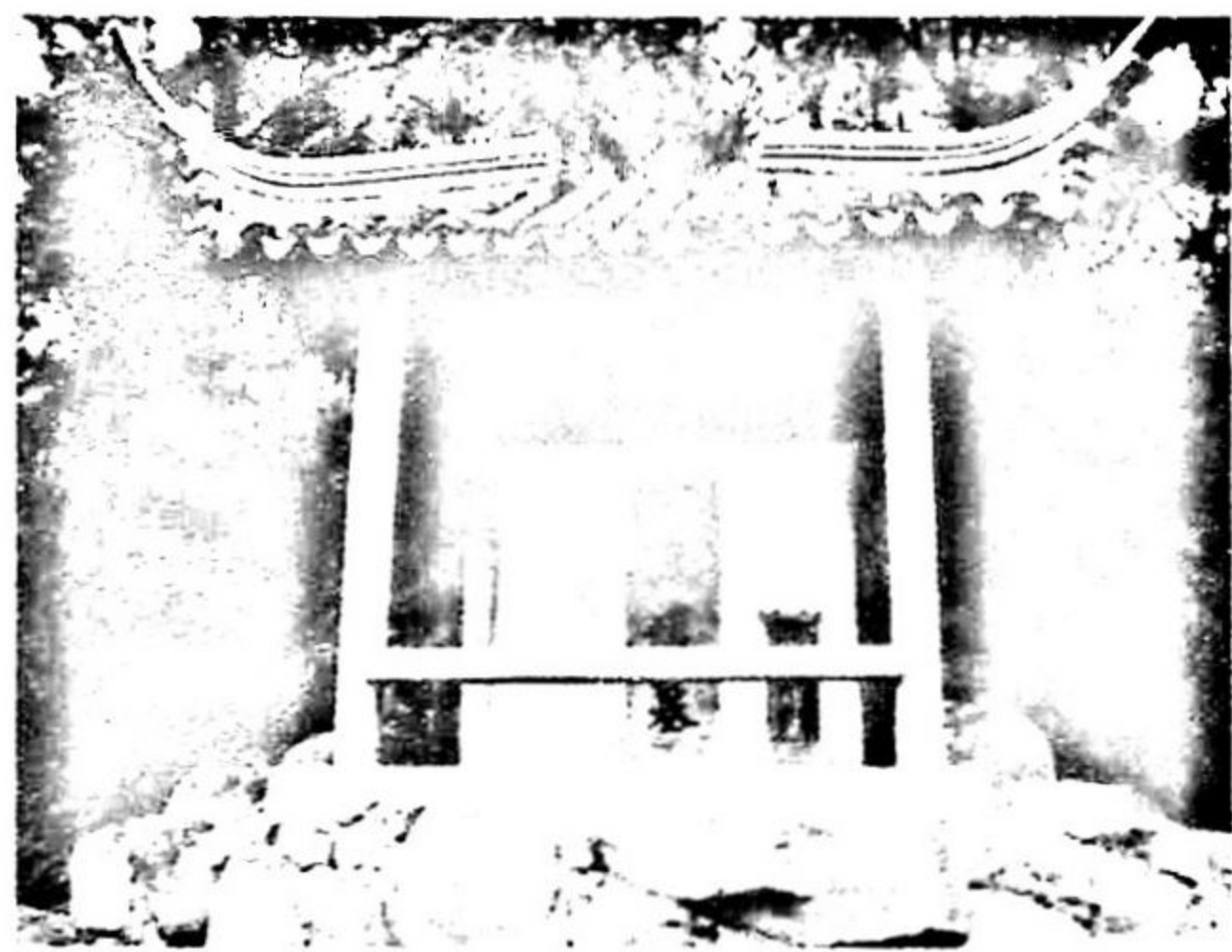
朱长文的话大致描述了苏州地区宋代以前佛教发展的状况，包括李太缘题记造像龕在内的众多佛教文物及虎丘云岩寺塔均应是此一段时期内佛教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此段时期苏州地区佛教发展的实物例证。

依据虎丘塔的出版物内容如《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等，告知二层发现了《妙法莲华经》（亦简称《法华经》）七卷。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产生了较多宗派，《法华经》正是创立于浙江天台山的天台宗的主要法典。天台宗虽由中唐僧湛然最早提出，但实由隋时天台山佛学大师建立，北齐慧文禅师为其开山祖师，第三代祖师智顓（538~597）在天台山刻苦修炼十余年，先后演讲《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三部法典，深入研究和发扬了《法华经》的教义，佛教上称此宗为天台宗，亦称法华宗。



历经唐末战乱苦难的苏州民众，特别是唐昭宗龙纪元年（889）时豫将孙儒入侵苏州，纵兵抢掠、杀戮焚烧，使苏州成为人间地狱。经历劫难后的苏州民众对佛教教义深信不疑，信佛崇佛，蔚成风气，以天台宗为主的佛教就覆盖了苏州城乡。在经过五代吴越国数十年的休养建设后，苏州地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佛教兴盛，社会文明提升。而虎丘云岩寺塔及其所藏的佛教文物应运而生，这都是该段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佛教文化发展以及科技和艺术进步的成果。

从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的文物题记可知，无论两塔的建造，还是塔藏文物的奉献，都是主要由苏州当地民众施舍财物而成，这里凸现了佛教与信徒的一种供养关系。在佛教诸宗派中，以《法华经》为基础法典的天台宗是最重视供养的，《法华经·玄赞二》曰：“进财行以为供，有所摄资为养”，对供养作了定义，并又具体说明：“今为资养三宝，奉香华、灯明、饮食、资财等物谓之供养。”（《佛学大辞典》）



虎丘古真娘墓

虎丘塔内发现文物上题记所写的姓名，如经箱上的孙仁朗、孙仁迂、言细招，经袱上的於八娘、曹二娘、朱氏九娘、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牙牌上的顾超，大镜上的陆七娘等都是供养人即施主。当然，李太缘题记造像龕上题名的李太缘

也是供养人。在敦煌莫高窟中，更有供养人出资将自己画在窟壁上的，但一般情况下只有题名在供养物上。而虎丘塔上的文物，如石函、经箱、经卷、经袱、铜镜、铜佛，包括李太缘题记造像龕在内，无论题名与否，都是佛教的供养物。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为不断适应中国民众的需求，作出种种的应变。如对于供养，可以为自己供养，也可为别人供养，或两者兼有。虎丘





塔二层发现的经箱中有长方形牙牌一块，上刻“弟子顾超舍，愿三世亲生父母疾证菩提佛道”题记，这里的供养人是作为后辈的顾超，供养对象是其“三世亲生父母”；《法华经》卷六经袱题记“女弟子冯氏十一娘舍裹金字法华经入武丘山寺塔内充供养”则显然是为自己作供养的；李太缘题记造像龕中的题记“李太缘为自身造佛一躯”正是这类为自己作供养的另一实例，而绝不是有人理解的这佛像就是李太缘自己（虎丘塔东侧陈列室中将此石造像照片题为“李太缘像”）。塔上第三层发现的大铜镜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镜一面，入武丘山寺塔上，保佑自身善果，诸眷属等团圆，身富清健，再充供养。隆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则是供养祈福对象扩大到包括自己及亲属在内的一个家庭群体。

在关于虎丘塔文物的出版物中，我们注意到李太缘题记石造像龕是残损的，其右侧显然是受人为打击而致残损，以致缺失部分内容的，现在虽经修复仍旧不能恢复其原貌。对于佛教供养人或接受供养物的寺院僧人来说，他们都不可能主动地打击、破坏这些供养物，佛教的教义和信仰使他们只能珍爱这些代表佛教信仰的文物，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那就是后世称为“三武一宗”的法难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的四次法难事件。这四次事件中，前两次时南北朝对峙，北朝的废佛对苏州关系不大；最后一次禁佛事件中，周世宗柴荣虽雷厉风行，但苏州地处吴越国政权下，吴越国主钱弘俶其时带头崇佛，虽在表面上遵命宣后周诏“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如旧；其无敕额者，并宜停废”，但实际上反倒大造寺院，并下令铸造八万四千个铜制宝篋印塔（内藏《宝篋印陀罗尼经》），传布境内外。这次废佛事件并没有对苏州佛教造成多大影响，虎丘塔上发现的其他文物均完整无损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因此，造成李太缘题记造像龕和1957年施工中同时发现的三尊造像断头残损的只能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法难事件了。上述朱长文的陈述中也说到“唐武宗一旦毁云”的话，应该说这四尊造像的残损确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所致，这是一次由最高权力者，即皇帝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行为。史载当时苏州的许多寺院毁于其时。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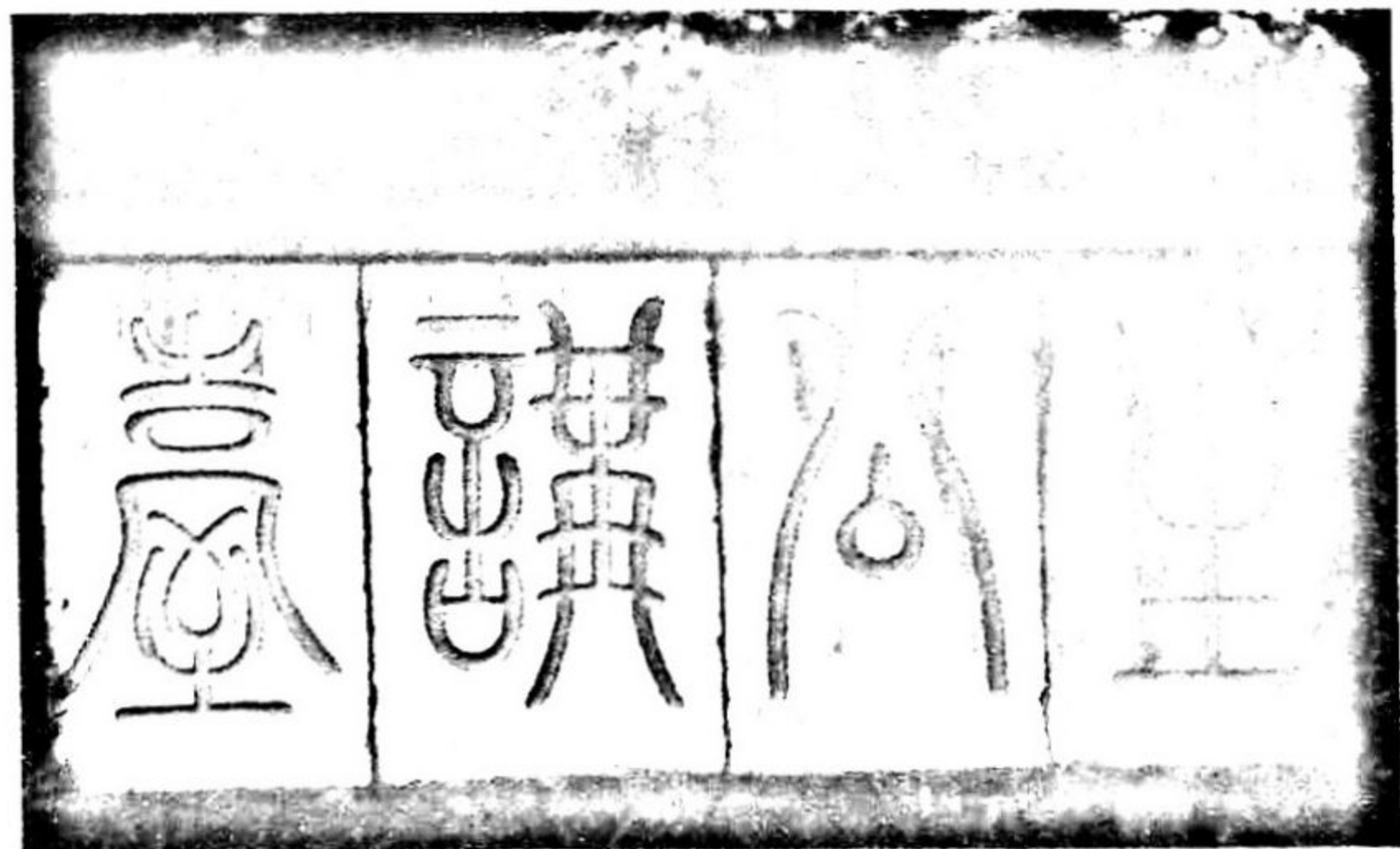


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详尽介绍当时“会昌法难”的情况。

“宣宗稍复之”是说紧接唐武宗的唐宣宗又恢复了佛教，但造像已经残损，无可挽回，只能在以后建造的佛塔过程中加以保存，这就是虎丘塔中这四尊石质造像的历史缘由。今存虎丘的云岩寺塔为砖构，体量恢弘，结构精巧，正是在其建构过程中，佛寺组织者在行将竣工时才收拾残存的佛教文物而将此四件残损文物纳入塔上的。

如果再结合虎丘塔的体量、形制、结构、装饰内容和形式，发现文物题记以及总体的工程量，则虎丘塔的建造时间就绝不是两次出版物所说的始建于周显德六年（959），完成于宋建隆二年（961），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探讨和研究的题目了，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了。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7年8月15日



虎丘生公讲台刻石





【碧玉贡瓿——秘色瓷莲花碗】

1957年虎丘塔的第一次维修加固工程中，共发现陶瓷器四件。即灰陶碗形香炉一只，青瓷碗两只和秘色瓷莲花碗一件，其中秘色瓷莲花碗最为珍贵，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本文重点介绍此件文物。

一、秘色瓷莲花碗概况

1957年5月5日，因有3月在塔的二层发现文物的经验，故施工比较谨慎小心。在塔的第三层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经过整理，在主要位置发现石函、铁函和置于其中的铁铸金涂塔、金瓶及迦叶如来真身舍利。除了这些佛教业内认为最主要的文物外，尚有铜佛像、铁佛龕、檀香木雕三连佛龕、铜镜、铜钱、铜盃、木佛珠等。但赫然放在第一位的便是这莲花碗了。当时介绍是：

除石函以外，其他文物还有：越窑青瓷莲花碗一只（高12.5厘米，口径13.5厘米），下承以托，亦作大瓣莲花图案，釉色明润，光泽如玉，当是越窑稀有的精品。

在1958年7月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刊出了关于此碗的二幅黑白照片，它们分别是：“图四三越窑青瓷莲花盃座”和“图四四越窑青瓷莲花盃”。当时照片的尺寸分别为9厘米×9厘米和9厘米×10厘米



米。

2006年10月苏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之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中更深入地报道了此件文物：

五代秘色瓷莲花碗，碗高8.9厘米，口径13.9厘米，盏托6.6厘米，口径14.9厘米，底径9.3厘米，通高13.5厘米。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均饰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凸起，构思巧妙，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从露胎处又见瓷胎呈灰白色，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特别是它的釉色滋润内敛，掇翠融青，呈现出玉一般的温润感，被认为是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的标准器。

以上外语部分省略。

盏托中部有一圆洞贯通上下，似为茶碗溢出的茶汁泄漏而保持茶具洁净而特制；盏托上部近圆洞处有烧制的刻画文字“项记”，当为烧制此碗具的匠师姓氏。

此书中刊发照片三幅，分别是合置、分置和盏托的彩色照片。尺寸为28厘米×21厘米，16.5厘米×21厘米和28厘米×21厘米。规格尺寸大，又是彩色，为观赏和研究此一极品的莲花碗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秘色瓷

上述介绍中，同一件莲花碗，20世纪50年代说是越窑青瓷。至2006年改为越窑秘色青瓷。那么“秘色”是什么色？秘色瓷与越窑青瓷是不是一回事呢？

“秘色瓷”一词最早出现是晚唐苏州籍诗人陆龟蒙（？~约881）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为晚唐诗人，卒年约为公元881年，即唐僖宗广明二年或中和元年（7月变换年





号)。秘色瓷器的出现应在此前。由陆龟蒙诗中写出已是出现一段时间的事了。据此诗所写，当是江南“千峰”所呈现的翠色。此就是说秘色瓷是属于越窑青瓷系列中的一种，但此诗无器物印证，秘色也不能确指。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其烧成后坯体烧结坚硬，坚固耐用，瓷器胎表上釉，胎釉紧密结合，不会脱落，可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物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同时制瓷原料开掘容易，可以大量生产，成本较低，比金、银、铜、漆器经济实用。所以瓷器一经出现，就获得人们的喜爱，发展迅速，故古代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制瓷技术也越来越精。

青瓷起源很早，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商周时期的原始瓷是最早出现的瓷器，因釉料中含氧化铁，其釉色呈青、青黄和褐色等，故称青瓷。但与成熟瓷器相比，其烧成温度偏低，胎体没有完全烧结，吸水率和显气孔率都比较高。釉层薄且容易剥落，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大致到汉代中晚期，瓷器制作技术成熟，已经能烧制出胎质细腻坚硬，胎釉结合紧密的瓷器，其色泽主要是青釉，也有少量黑釉，区别在于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含量在3%以下的烧成青瓷，在4%~9%的就烧成黑釉。到六朝时期，浙江的越窑已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到了唐代，瓷器的发展形成了以江浙的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

越窑是“越州窑”的简称。据《景德镇陶录》记载：“越窑所烧，始于唐，即今浙江绍兴府，在隋唐曰越州。”作为一种地方特产，唐代通常以窑所在的州名来称呼瓷窑。越州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所辖的余姚、上虞境内，所以统称为“越州窑”。从历史考古发现来看，越窑始建时间始于汉，历经各代，至唐时已经相当发达了。据对自三国至唐的历朝越窑青瓷遗物分析，越瓷的化学成分与当地的瓷石原料十分接近，可见越窑的坯料显然是就地取材的。浙江所产的瓷石原料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花岗类风化后的矿物，它具有制造瓷胎所必需的石英、高岭、绢云母等三种基本成分，可以用其烧成瓷器胎。

越窑瓷胎外普遍施青釉，釉层均匀。西晋以后，胎呈灰或绿灰色，因而釉作青灰色，越窑瓷釉属灰釉，釉中含16%~20%的氧化钙，这是靠加入草木灰而得到的，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能在较低温度下烧化。灰釉



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特点，在釉料中还含有一定的氧化铁，铁是青釉的主要着色剂。青瓷在烧成过程中，分氧化、还原和冷却三个阶段。胎釉中的铁在氧化气氛中处于高价状态（ Fe_2O_3 ），呈黄赤色；在还原气氛中，使铁处于低价状态，而低价的铁则呈青色，放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青色。青釉由此而来。

瓷器作为日常生活器皿与时代及社会风尚密切相关。唐代饮茶之风盛行，促进了茶具的发展。唐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种身浅、敞口外撇、玉璧型圈足的碗，晚唐以后，这种碗式大量出现，碗的胎壁从厚重逐渐趋转轻薄，从玉璧型底向宽圈足方面发展。这种碗式的流行，与唐代饮茶风行有直接关系，唐代称这种碗为茶瓯。唐代中后期诗人孟郊、卢仝、郑谷、徐夤、皮日休、陆龟蒙、韩偓等都有赞美茶瓯的诗句。前面所引陆龟蒙的《秘色越器》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中的后两句为“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说有了这样色泽精美的越窑茶瓯，我陆龟蒙就能在半夜时光盛取露水，煮茶与前代雅士嵇康先生一起品茶谈心了。这是极具雅趣的场景。

诗人的赞美，给瓷制茶具提高了身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与茶碗相配套使用的是碗托，亦称“茶托子”与“茶船”。越窑茶托的托口一般较矮，也有两档连烧的。有的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状，花碗创作花瓣形，非常和谐，加之越窑翠青的釉色而更显雅致，故唐末诗人徐夤将茶和盛茶的茶具比为“嫩花沾露”是绝妙的描述。而虎丘塔内发现的莲花碗就是由莲花瓣造型所构成的青釉碗、托组合而成，更是绝妙的“莲花沾露”了。

唐代茶圣陆羽曾对当时各地瓷窑所产茶碗作了细致的比较和评论。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对比，说：“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茶经·碗》）对于众多的瓷器，只给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予以极高的评价。其理由是，自南北朝以来，饮茶已是上层文人官宦的时尚，在品茶的同时，对盛茶的器具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茶具的形、色和盛茶的视觉感受综合评价来





给予邢窑白瓷，特别是越窑青瓷特高的评价。

越窑青瓷经过唐代早期的发展，至晚唐时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高峰，最杰出的成就是烧出精美绝伦的“秘色瓷”。但长期以来对于文献上记载的秘色瓷具体所指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定论。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中“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茶六枚”的记录与地宫中室出土的漆木盒所装的13件碗、盘、碟正好相符，秘色瓷的神秘面纱从此被揭开。199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云集了国内包括苏州博物馆在内的大量传世与出土的越窑瓷器标本。与会者展开热烈讨论研究，使秘色瓷的研究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即认同于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的精品，上好之品。

宋代庄绰《鸡肋编》说：“又出青瓷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文中“秘色”为“秘色瓷”之省称，说北宋官窑对青瓷要求更高，也表明“秘色”指越窑青瓷呈色是无须争辩的事实。而对于“秘色”的含义也有数种解读。有认为是指越窑上等青瓷上渲染的神奇、神秘色彩；有认为“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是指秦汉时亲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制作于“东园”，称“东园秘器”，唐承汉制，称此上层人士用物为“秘”者；有认为当时此瓷为贡瓷，烧造技术为朝廷垄断，故名之。“秘色”不仅指色泽，还兼有“隐秘”、“秘不示人”的含义。有认为“秘色”从字义看，应是一种香草色，特指越窑精品的青釉呈色；也有认为“秘色”应理解为“神奇之色”，但当初的“秘色”多为“碧色”。因为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秘”与“碧”古音相同，凡是具有碧玉质感的青瓷均可称作“秘色”。以上看法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主要还在于当时烧瓷系手工制作，由多种因素决定其釉上呈色，即其釉色，也是一种不很稳定的呈色，保持着相应的神秘性在内。其中浙江省博物馆李刚先生对“秘色”在具体的釉彩呈色上的解释最为科学。李刚依据《山海经》“又西北五十里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与郭璞“碧亦玉类也”的记载，认为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碧”与“秘”古音相同，碧的色阶由



浅入深，“碧”是“秘”的真实含义。因为唐代文人包括陆羽在内确实是将越窑青瓷釉色与玉相比，而从大量传世的出土实物看，越窑不同色泽的青釉确与青色玉石相似，类玉的青瓷器是唐末宫廷最崇尚的瓷器，因此用碧色来解释秘色更为确切。

秘色瓷的制作非常规整端庄，釉质细腻，釉色匀净，色泽温润有绿玉般的感觉。其青绿色极显优雅含蓄，有滋润感。陆龟蒙用“千峰翠色”来形容是十分贴切的。秘色瓷自唐后期起一直是文人官宦们所专用的珍品茶具。而自晚唐钱氏实际管辖越州起（唐昭宗乾宁三年，即公元896年）至吴越国终（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的这段80余年的时间里，钱氏政权就对越州窑实行官办，将烧制的秘色瓷主要作为贡品供奉给唐五代及北宋的中原朝廷。宋人的《侯鯖录》谓“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表示效忠中原王朝与结为友邦和外销的特殊情况。

“秘色初出上林湖”，唐宋人盛赞之秘色瓷的越窑主要是指浙江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市）的越窑，上林湖是一南北向的天然湖泊，大约在177万平方米，越窑窑址主要集中于其两岸。据相关部门调查证明，文献的所谓“秘色瓷”，就产自上林湖一带，而唐末至北宋这一阶段正是上林湖烧制秘色瓷最辉煌的时期。

三、虎丘塔发现秘色瓷的意义

苏州虎丘塔的建造时间，据笔者考证，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900）至宋太祖赵匡胤在位（960~976）的数十年间，其时又恰在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有效管辖期内，而五代时期瓷业的主流仍然是“南青北白”，制瓷技术则继唐之后有所发展。其中越窑青瓷尤为著名。钱氏吴越国所产越窑青瓷精品秘色瓷多为贡品，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造型和纹饰端整秀丽。而虎丘塔内发现的这件莲花茶碗更是出类拔萃，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光彩夺目。1995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件茶碗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





一致认同和赞誉,认为是越窑秘色瓷中的绝品,反映了越窑秘色瓷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如刻印)等方面所达到的高超水准。

作为茶具的秘色瓷莲花碗供奉在虎丘塔内,成为信仰佛教的信物,说明其时苏州已在钱氏吴越国主的倡导下形成一股方兴未艾的崇佛热潮。佛教中从善弃恶、因果报应、施舍供养等积极的理念也正渗入民间,为吴越国境域即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文明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作为宫廷用器和贡器的极品秘色瓷能够入藏虎丘塔内,说明了佛教在吴越国境内的尊崇达到极高的地位,以及得力于苏州地区实际权力执掌者,即钱镠之孙,时任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的帮助当是没有疑义的。

唐末五代是乱世,大范围的征战不绝,杀伐有加,而地处江浙的吴越国钱氏国主在“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一贯向中原地区的北方中央王朝称臣纳贡,对邻近地区和亲睦邻,以争取相对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中间作为纳贡的礼品之一即是秘色瓷。据史事记录,钱镠宝大元年(924),钱弘佐二年(942),钱弘俶三年(949)、六年(952)、七年(953)、十四年(960)、二十三年(969)、三十年(976)等先后向中原王朝贡献秘色瓷器,以争取政治上的和谐关系。事实上吴越国特别在后期钱弘俶在位时(948~978),做到了事实上的“小康”,成为当时“难得的乐土”(谭其骥语)。而包括莲花碗在内的秘色瓷器成为社会上层政治文化及饮食文化中的稀罕之物,这是因为包括莲花碗在内的秘色瓷器是五代吴越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的见证实物。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 4.《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映照吴越——一组铜镜】

1957年5月5日，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的以加固塔体为主的维修工程中，继3月30日于第二层中发现第一批珍贵佛教文物后，又一次在第三层楼层砌体中发现了一批珍贵佛教文物，其中就有本文拟介绍的这组铜镜。

这组铜镜共四面，一面为“陆七娘题记”铜镜，一面是锥画礼佛图铜镜，一面是四神八卦生肖铜镜，一面是袖珍版小铜镜。

当时发现的情况，据《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报道：

嗣后我会又在5月5日配合工程进行，于塔之第三层中央进行发掘，约在70厘米深处发现一个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方窟，壁上都圻土红色，内中有石函、铜镜等文物一批。

《简报》的第二部分，即“乙第三层中间发现的文物”中的“五 铜镜四面”，其具体内容为：

一面最大型的，背面有毛笔字，上写：“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隆建二年三月日题”（图三十上），一面（直径23.7厘米）背面是八卦和十二生肖花纹，一面（直径16厘米）背面无花纹，另有小铜镜一面（直径2.6厘米）（大镜及十二生肖镜已破，被压在石函之下）。

在《简报》中的第41~44页为虎丘云岩寺塔中发现的文物黑白照片共34幅，其中仅在图三十上部刊发了大铜镜的照片一幅，但尺寸只3厘米×3





一致认同和赞誉,认为是越窑秘色瓷中的绝品,反映了越窑秘色瓷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如刻印)等方面所达到的高超水准。

作为茶具的秘色瓷莲花碗供奉在虎丘塔内,成为信仰佛教的信物,说明其时苏州已在钱氏吴越国主的倡导下形成一股方兴未艾的崇佛热潮。佛教中从善弃恶、因果报应、施舍供养等积极的理念也正渗入民间,为吴越国境域即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文明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作为宫廷用器和贡器的极品秘色瓷能够入藏虎丘塔内,说明了佛教在吴越国境内的尊崇达到极高的地位,以及得力于苏州地区实际权力执掌者,即钱镠之孙,时任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的帮助当是没有疑义的。

唐末五代是乱世,大范围的征战不绝,杀伐有加,而地处江浙的吴越国钱氏国主在“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一贯向中原地区的北方中央王朝称臣纳贡,对邻近地区和亲睦邻,以争取相对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中间作为纳贡的礼品之一即是秘色瓷。据史事记录,钱镠宝大元年(924),钱弘佐二年(942),钱弘俶三年(949)、六年(952)、七年(953)、十四年(960)、二十三年(969)、三十年(976)等先后向中原王朝贡献秘色瓷器,以争取政治上的和谐关系。事实上吴越国特别在后期钱弘俶在位时(948~978),做到了事实上的“小康”,成为当时“难得的乐土”(谭其骥语)。而包括莲花碗在内的秘色瓷器成为社会上层政治文化及饮食文化中的稀罕之物,这是因为包括莲花碗在内的秘色瓷器是五代吴越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的见证实物。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 4.《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映照吴越——一组铜镜】

1957年5月5日，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的以加固塔体为主的维修工程中，继3月30日于第二层中发现第一批珍贵佛教文物后，又一次在第三层楼层砌体中发现了一批珍贵佛教文物，其中就有本文拟介绍的这组铜镜。

这组铜镜共四面，一面为“陆七娘题记”铜镜，一面是锥画礼佛图铜镜，一面是四神八卦生肖铜镜，一面是袖珍版小铜镜。

当时发现的情况，据《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报道：

嗣后我会又在5月5日配合工程进行，于塔之第三层中央进行发掘，约在70厘米深处发现一个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方窟，壁上都圻土红色，内中有石函、铜镜等文物一批。

《简报》的第二部分，即“乙第三层中间发现的文物”中的“五 铜镜四面”，其具体内容为：

一面最大型的，背面有毛笔字，上写：“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隆建二年三月日题”（图三十上），一面（直径23.7厘米）背面是八卦和十二生肖花纹，一面（直径16厘米）背面无花纹，另有小铜镜一面（直径2.6厘米）（大镜及十二生肖镜已破，被压在石函之下）。

在《简报》中的第41~44页为虎丘云岩寺塔中发现的文物黑白照片共34幅，其中仅在图三十上部刊发了大铜镜的照片一幅，但尺寸只3厘米×3





厘米大小，难以清晰辨认。

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以下称《出土文物》）是专门介绍虎丘塔在这次维修工程中发现文物情况的，其关于这组铜镜的发现情况是：

5月5日，我会在塔的第三层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经过整理，记录如下：……铜镜四面：一面直径33.6厘米，背面有毛笔写字“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隆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这面铜镜系压在石函之下，已破裂两半；一面直径23.7厘米，背面是八卦和十二生肖花纹，已破裂成三块；一面直径16厘米，背面无花纹；另小铜镜一面，直径2.6厘米，如此小镜，很少见过。

此书第35页和36页，分别以“图五一”、“图五二”和“图五三”三幅黑白照片介绍了其中的“陆七娘题记”铜镜、八卦生肖铜镜和小铜镜。除小铜镜外，两幅黑白照片的尺寸也提升至9厘米×9厘米了，较前有了较好的阅读、辨认程度。

时至新世纪的2006年10月，由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竣工开放之际，虎丘塔上发现的这组铜镜也以“吴塔国宝”专题登上了陈列专柜向公众开放展示。而包括这组铜镜在内的虎丘塔发现文物以及瑞光塔发现文物，文物出版社又予以出版发行，这就是《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以下称《二塔文物》），书中同样介绍了这组铜镜，在第58~61页以彩色照片和说明文字介绍了其中的三面：

[宋]铜镜(3件) 直径33.6厘米 23.7厘米 16.2厘米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其中一件镜背光素，有墨书“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塔上……隆建二年三月□日题”等49字。另一面直径23.7厘米，镜背有四神、八卦、十二生肖等图案、符号和镜铭。还有一件无背纹



小镜，直径16.2厘米，镜面篆刻有一组佛像，若隐若现。

这三幅彩照尺寸又得到提升，都占一个完整幅面，尺寸是28.4厘米×21.6厘米，对镜内的题记及细节都能清晰分辨。这对铜镜认识的深化和研讨，当然是十分有利的。现在这组铜镜放在处于园林氛围的新馆一个展柜内，灯光柔和、温湿相宜地展陈于公众面前，是社会公众和关注文化的人士观察和理解的极佳境地。这是要感谢贝聿铭先生和一切为构筑苏州博物馆新馆作出支持和贡献的人们的。

从局促在阴暗砖砌体内的幽闭状态，到明净相宜的展柜内亮相，与其说是境地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它们命运的彻底提升，正像齐天大圣从五行山下被释放出来一样，孙悟空会在西行路上作出众多功绩，而这组铜镜也会在亮相中得以解读，使人们了解千年之前的历史真相，给人的启示也应是相当丰富的。

铜镜是中国古代妆奁照容的用具，利用镜面反射原理，可以照映出人的真实容貌。故自从铜镜产生并普及后，中国古代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使用，而且是几乎每日使用的日常用物。而光亮明净的铜镜，鉴物照形时的无私无偏，使人们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明镜高悬”，既喻中国古代士人为官从政的清白之心，亦喻决疑断案的正直无私，其透露的是文化人的精神光芒。以镜喻事中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追悼重臣魏徵：“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之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殁逝，遂亡一镜矣！”由此可见铜镜在古人心目中的分量。

由于铜镜的制作材料，镜面的加工使其光洁程度、映照效果的不同，加之铜镜的造型、纹饰，使用时的情绪、心态的不等，会使映照出来的容貌产生相当的差异。这一情景后来被文人夸大甚至引申，遂产生了晋代《西京杂记》中的“秦王镜”，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照骨镜”和李肇《摭异记》、王度《古镜记》及《原化记》中渔人获得古铜镜的离奇传说；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巨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毕生之作，他从历代有关“宝镜”的记叙中受到启发，将“风月宝鉴”即一种特殊的铜镜写进小说，另创新意，并曾有将书名题为《风月宝鉴》之意。





以上所说的有关铜镜及相关事情，在相当程度上，是超越和异化了铜镜本身的功能的，而本文介绍的这组铜镜，也是铜镜功能异化的一个实例。这组铜镜已由原本的妆奁用物异化成为佛教信徒布施给寺塔的供养物，映照出铜镜主人对佛教的崇信程度。本来，铜镜由于材质的坚固耐用和日常应用功能，古人往往一生甚至几代人使用一面称心的铜镜，使铜镜具有传世的性质。而视死如生的古人习俗，又往往使铜镜成为一种随葬品，伴随主人入葬墓中。这又是铜镜功能的另一种异化。

铜镜和别的文化遗产一样，其制作材料、技艺，镜的整体造型、图案纹饰、艺术风貌以及相关的文字、题记都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铜镜产生于金属铜资源的开发之后，据考古材料知中国铜镜最早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的甘青地区，但殷墟侯家庄也出土了早期的铜镜，称为“圆板具钮器”。至春秋战国时，随着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铜镜逐渐地普及和发展，到汉代和唐代出现了两个制作和流行的高潮期，近代随玻璃镜的盛行使铜镜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历史的见证，铜镜仍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此出发，我们将探索对于这组铜镜的解读。

一、“陆七娘题记”铜镜

此镜是这组铜镜中最早介绍出来的一面铜镜，从每次介绍都有文字和照片来看，可见其是最为重要的一面，也是其中体量最大的一面，即是一面直径达33.6厘米的圆镜，镜表色泽青白，当是一种铜与锡、铅的合金材料制作，其中锡的含量当超过24%，这才使镜面光亮，宜于映照。重约1.5~2.5千克。铜镜有约2厘米宽的高出缘边，中有一用作挂持的半球状钮，钮径约2厘米。现铜镜已被压碎，裂有三缝，但并不缺失，使镜仍完整。此镜1957年5月5日发现时在三层楼层下窖室的石函之下，显然是其下部承受处并不平整，且上受石函、铁函等重物压制时间较久而造成。此镜从艺术方面说是极一般的，但其背面的文字题记却是意义重大。其背面墨笔书写的题记揭示出其持有者，即铜镜主人和供养人为陆七娘，今之镜名亦以此段题记命名。题记在1957年刊发的《简报》和1958年出版的《出



《二塔文物》一书中均如前述。但到2006年10月出版《二塔文物》一书中，反倒缩减字数为：“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塔上……隆建二年三月□日题”等49字，其余文字隐而不见了，这大约是辨识的障碍所致，今经笔者辨认，此段题记文字解读应当分为竖排七行，由右向左阅读：

女弟子陆七娘敬捨大鑿一面，入武丘山寺塔上，保佑自身善果（笔者按：果字旁出）清吉，诸眷属等团圆、身富清健，且再充供养，隆建二年三月□日题。

据此可知，题记中当有51字，即比原读增加两字，多辨读出五个字，即除日期中有一字实在无从辨认外，其余都已读出。以“女弟子陆七娘”开头的这段题记文字明白而直接地显示陆七娘是铜镜主人，也是布施铜镜给寺塔的供养人，还写出了供养铜镜的时间，即“建隆二年三月□日”，镜中实写的“隆建”当是笔误（因中国历史上并无隆建这样的年号），因为此塔上发现文物中另有两处题记均为“建隆”可作旁证。建隆是宋太祖赵匡胤使用的第一个年号，自公元960年正月至963年十一月，只使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建隆二年即公元961年，当时苏州尚属五代吴越国境域，但吴越国钱氏政权一贯臣服中原政权，此时并无自己的年号，由“建隆”年号既可知晓文物供养的时间确为公元961年，同时也可明白作为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钱氏政权与中原政权赵宋王朝的臣属关系。也就是说，吴越国是一个至少在表面上服从中央的二级政权，这种臣属关系在宋初时编写的启蒙读本《百家姓》中得以定格，即首句的“赵钱孙李”，并流传至今。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纳土归宋，融合到赵宋政权中去，再度开创中国统一局面，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正是此镜供养及题记提供了当时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隶属关系。

佛教寺院向来看重布施和供养，向信徒宣扬，只要布施，就能有罪罪灭，无福福生，甚至有一本万利的报应。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这是极易得到信徒们奉行的。唐末五代是乱世，社会动荡，战乱纷起，苏州在唐代末年一段时间里，就受到乱兵张雄、孙儒、秦宗权等战乱，民众遍遭兵难，痛苦不堪。自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以后，苏州即由吴越国钱氏政权管辖，在尊奉中原，保境安





民,发展经济的大政下,逐渐由乱到治,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加之钱氏提倡佛教,因此佛教在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境内普及深入地发展。盛世修塔,民众的布施供养,是经历苦难逐步走向小康生活的具体反映,“陆七娘题记”正是当时民众崇信佛教、向佛寺进行布施,选择“愿生安乐国”的避祸祈福心理具体反映的典型实例。此种佛教供养方式,只要肯舍钱财,既可为自身供养,也可为亲友等别人供养。同在塔上发现的李太缘石造佛龕题记显示,李太缘钱少只能为自身供养,而这大镜的主人陆七娘,除了自身外,还为家人眷属等进行了供养,这段题记文字明确地说明了这种供养内容。

题记中有一“鑿”字,对照实物,可以明白显示这是“镜”字的一种异体字,对于文字学及其演变也当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现在这面“陆七娘题记”铜镜放置在展柜中央部位,是极为适宜的。可惜此段墨书文字是信手所书,比较潦草与随意,年久隐失而难以辨认,展示的说明牌上又未将该题记写出,对观众解读是存在相当困难的。

二、锥画礼佛图铜镜

这是一面在铜镜正面作锥画佛像的圆形铜镜,1957年的《简报》上介绍极其简单:铜镜“一面(直径16厘米),背后无花纹”。1958年《出土文物》上介绍也是这几个字,只是将“直径16厘米”的括弧打开了,加了一个逗号。以上两种文献均未刊登相关照片。到2006年出版的《两塔文物》中,介绍是这样的:“还有一件无背纹小镜,直径16.2厘米,镜面刻有一组佛像,若隐若现。”同时还刊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图像清晰,无须说明,就使铜镜露出其庐山真面目,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如此精细美妙的礼佛图。

这礼佛图的画面是中央锥绘佛祖释迦牟尼,其两侧从上至下分别锥绘三组六位礼佛的善男信女和童子向佛祖供奉致礼的场景。镜面直径16.2厘米,而佛祖居于镜面中央作结跏趺坐,其高达8.8厘米,占整个镜面一半以上,其坐宽也达6.5厘米,占镜面宽度的四成左右,足见其突出的崇高地位。本铜镜的佛祖释迦牟尼虽由金属工具锥刻而成,但同样形神



具备地锥绘出佛祖庄严美妙的形象：头顶上肉髻隆起，头发螺旋，眉如新月，眼睛广长，鼻高不现孔，耳轮垂长，面部丰满而美好，唇如频婆果，两肩宽阔圆满，上身着右裸之佛装，肩褂瓔珞，手指纤长，两手做迎托印相，下身衣裾包裹，不见脚掌，但从衣褶分析，还是属于结跏趺坐，坐于一座大型的莲座和莲瓣之上，身后有头光和背光，头光之上鲜花纷呈，充满和谐美满的氛围，虽在金属表面由坚硬工具锥刻而成，其整体形象并不逊于或塑或绘的法相。

镜中佛祖形象上方两侧分别锥刻两位头戴高冠，身穿左衽缀团花袍服的男性礼佛者，面部虔诚慈祥，下部也作结跏趺坐，衣袍中系有腰带坐于莲瓣环绕之莲座之上，左面者两手上下作指托状相，似向佛祖致礼；右面者一手指心，另一手在袍服之中，似默首认同状态。镜中部佛祖稍下处，两侧为两位上身赤裸的礼佛女性，面部丰满虔诚，头发广髻，梳理有致，上身赤裸身绕飘带，双手合持鲜花，朝向佛祖作奉献状，下部穿缀小花之衣裳，跪坐于莲瓣环绕之莲座之上。铜镜下部是佛祖莲座下面有两位只穿肚兜的童子形象，在一组锥绘的木构建筑中，童子头上扎双角髻，身缠飘带，双手合持一果品，朝向佛祖奉献，双脚斜伸作坐状，体态丰满，面部庄重微笑，也作虔诚礼佛状。在童子下方的门槛横板上，锥刻出简短的六字题记“曹迎昇舍人塔”。这是以往介绍从未披露过的一个信息，这要感谢这次照片的清晰可读而知晓施舍铜镜的供养人为曹迎昇。

此镜面锥刻成的画面是一幅主题鲜明的礼佛图，将人间男、女及幼者虔诚礼佛的场景描绘得惟妙惟肖，形象生动、和谐祥吉，显示了人间对佛祖的供养是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这是供养人曹迎昇供养佛祖，祈求佛法保佑，取信佛祖的心灵直白，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供养方式，将日常应用的妆奁用品转化为一件向佛祖供养的精美文物。但这是一件别具创意的作品，是以镜面作纸，以金属工具锥作笔，创作出来的一件特殊画面的佛教艺术品，至少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珍品。这就是为何要将此铜镜作为仅次于“陆七娘题记”铜镜介绍的道理。在坚硬的青铜器和漆器表面上作画和图纹，是必须有更为坚硬的金属工具的，这金属工具便是锥。《管子·海王篇》曰：“行服运辎輦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





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这是说锥是手工工艺者雕刻用的工具，手工工艺者没有锥，也做不成事。战国以后，以锥在青铜器和漆器上作画时有所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遣册记载称为“锥画”，为统一名称，本铜镜的礼佛图也当称之锥画为宜。

三、四神八卦生肖镜

四神八卦生肖镜与前二面铜镜相比，显然是以铸于镜背的图像为主，而且图像中以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四神八卦和十二生肖为主，故以此三图像命名的，它没有供养人直白的文字以及由供养人（或请人或写或绘）对艺术（文字或绘画）的两次创作，而是一次性的铸造出的图像铜镜。它的成为佛塔供养品是因为与其他三面铜镜一起舍入塔内的整体行为所构成的，这样从妆奁用品的布施而转化为佛教供养品了，而它背面的图像则更多地映照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内涵。

此镜也是一面圆镜，直径23.7厘米，从中心向外的整体布局是：中心是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半球状镜钮，在直径为12厘米的第一个圆圈内沿圆周排列八卦符号，其内环绕镜钮排列的是稍浮现的四神图像；在直径为19厘米的第二个圆圈内排列着正在运动的十二生肖图像；在直径约24厘米的第三个圆圈内横向（底向钮心）排列着24个文字，这些文字除个别字，如“百”、“庀”、“月”等明显可辨认的外，其余文字或因字形怪异，或因铸造不到位，使字迹模糊，难以辨识，均待日后解读。镜的最外面是宽约1.2厘米的环形的高出缘边，此镜颜色偏白，似锡、锌成分的比例略高一些，以后若作研究，则金相的检测成果当会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其实图像、符号与文字一样，是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的记录，只是图像更形象直观，其产生时间与文字的发展并不一致，而形之于图像更有其独特的演变发展过程，昭示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今试从内向外解读这些图像、符号。

四神：本铜镜最内圈环绕钮心的四个动物形象，即青龙（苍龙）、白虎、朱雀（朱鸟）、玄武的形象，其排列的方向与其外的八卦排列是一致



的,即青龙在东,白虎在西,朱雀在南,玄武在北,中国古代称为四象四方神,是古人信奉的星宿神四象之神和方位神四方之神。

四象四方神首先是作为四方星宿的代称而出现,是古人观测天文现象所得到的形象记忆,《尚书传》中说:“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今铜镜上四神之首尾朝向与《尚书》所说完全一致,证之为四神是无误的。到战国末年,随着阴阳五行学论的系统化,四神的名称、指向也固定下来。《礼记·典礼上》说:“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曰:“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三辅黄图》卷三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这样中国古代的四象四方神便正式形成了。

从汉末开始,便以四象四方神昭示地面的方位而命名都城城门和街道。隋唐长安城正南的大街名为朱雀大街,至今西安市仍在使用;而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可以清楚地知晓其发生地点在皇宫的北门。作为一种纹饰,四神在汉代及其后的铜镜中获得丰富的发展,新莽时曾流行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规矩镜,有的还有铭文,到隋唐时依然流行四神作为铜镜的纹饰,其作用取其吉祥辟邪之意。

铜镜第一圈内沿圆周环布的是八卦的八个符号,即《周易》中的八个基本图形,以“—”为阳爻,以“- -”为阴爻组成,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它们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八卦”经自叠和互叠还构成了六十四卦,这些抽象的符号与组合原理在中国古代曾有不少具体的运用。

古代文献中,八卦还分先天(伏羲)八卦和后天(周易)八卦,此铜镜所排列的八卦为后天(周易)八卦。八卦的产生,古人认为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八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它变化莫测、博大精深的内容与演绎,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将八卦符号与四神组合在一起作为铜镜的纹饰,大约始于隋唐之际,





《太平广记·王度》篇中有一段论述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镜的话：“龟龙凤虎，依方阵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备焉……”说明至迟到隋唐时代已有这样的铜镜了。

铜镜的第二圈内环分布了十二生肖的图像。中国古代是以天干、地支配合的方法来纪年的。每年又以十二种动物配属十二个地支，分别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十二种动物就称为“十二生肖”。至今汉民族及一些其他民族仍用十二生肖来作为生年的属相。

最早记载十二生肖说法的史料是汉代学者王充《论衡》中的“物势篇”。实际上产生十二生肖的时间更早，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竹简《日书》二种，其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文中也提到了十二生肖，只是其中的动物稍有出入，如马为鹿、蛇为虫、犬为老羊等，但我国至秦时已有十二生肖说法当是事实。十二生肖以鲜活灵动的形象喻示当时社会中生生不息的人口增值现象，而人口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最大资源。

第三圈，即最外一圈内是环状分布的二十四个似隶书笔画的文字，因可读性差，暂时无法完整解读，但其是作为一种吉祥用语出现当是没有疑义的，这文字期待专家们参与而能得到更明晰的解读。

四、袖珍版小铜镜

这面小铜镜直径为2.6厘米，确是一面袖珍版的小铜镜，其在《简报》和《出土文物》中均作介绍，虽然只有简略的一两句话，但不知何故，《二塔文物》书中竟连提也不提一句了。这样的小镜，虽说极为罕见，但一样背面有钮有缘，正面光亮可鉴，是完全符合铜镜标准的。但正因为其小，是一种袖珍版的小铜镜，其应用范围应更广，它可以置于人们服饰的口袋中或衣带上，随身携带，随处使用，正如现时女士们小包中总有一面小镜子可以随处使用一般的。这一面小镜玲珑小巧，当是主人随身使用的心爱之物，但也因主人崇信佛教的缘故，而异化成为佛教寺塔中的供养品



了。因其小巧，故其铸造制作的难度更大，科技含量也更高，更显示出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准，这正如只要有水有山（石），有建筑及花木，就能组成景观，造成一定的境界，构建为园林一样，但空间越小，其构建及存世就越不容易，故实在是不应小视的。

这四枚铜镜作为一个组合在一起被发现于虎丘塔三层中，是同被供养而放置于第三层楼层的窟室内的，其入塔放置的供养时间即是“陆七娘题记”中所表达的时间：建隆二年三月某日，即公元961年的三月的某一天。因铜镜耐用故其制作和使用时间当要早于此时，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中说：

铜镜，是古代照面的用具，一般呈圆形，正面磨砺光洁，背面有钮可以穿系。铜镜产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东汉中期到魏晋时期，出现浮雕画像镜和神兽镜，隋唐时期铜镜的制作更加精工，是铜镜铸作的再盛时期。镜的种类也繁多，新出现的葵花镜、菱花镜等，纹饰有人物故事、狩猎骑射、海兽葡萄、十二生肖、宝相花等，同时还出现了极其珍贵的金银平脱螺钿镜。

另据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判断，十二生肖铜镜流行于晚唐，结合使用的传世性，即苏州地区在唐五代时期由乱至治的情况分析判断，这组铜镜的铸作时间当在唐五代间，大致在中晚唐至五代的这一时间内。无独有偶，近年在杭州雷峰塔地宫考古清理发掘中，也发现了铜镜，其中一面出现瑞兽形象，另一面背面刻有“官”、“都省铜坊”和“匠人倪成”字样，显示同在吴越国境内虽都以铜镜作为佛塔的供养物，但又有官办和民营的明显区别。但是虎丘塔这组铜镜的发现，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包括苏州一带在内的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宗教、习俗、文化、艺术及科技方面的真实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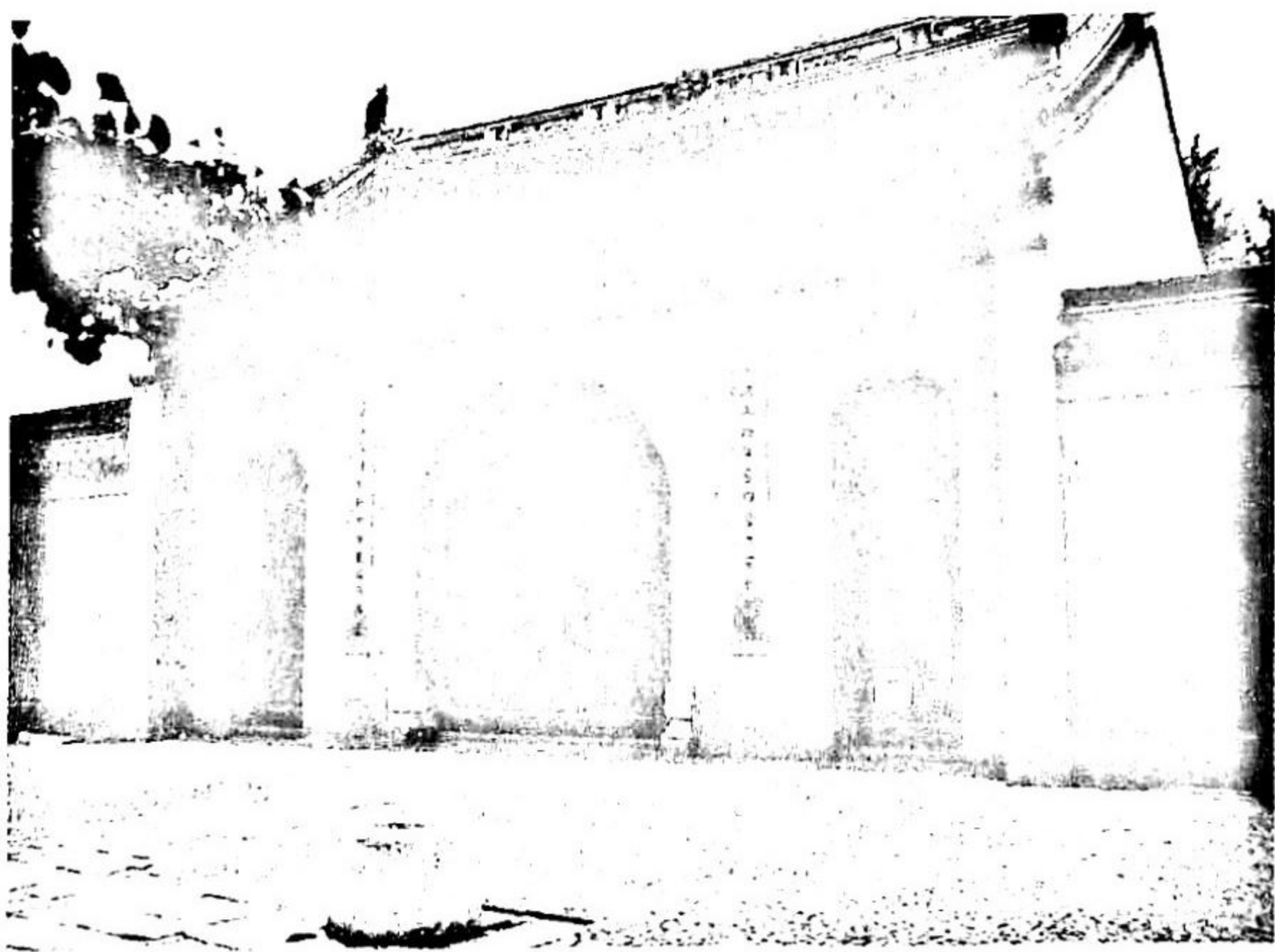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 2.《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3.《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4.《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 5.《清水见底 明镜照心》，陈学斌撰，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5日
- 6.《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武冈子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 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 8.《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第3版
- 9.《再说锥画》，付举有撰，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10日



虎丘云岩寺头山门





虎丘塔文物

【钱能通佛——虎丘塔发现的钱币】

新中国成立后，虎丘塔有过两次维修工程，一次是1957年施工的塔体加固维修工程；另一次是1986年开始施工的塔基加固维修工程。经两次维修，千年古塔转危为安，至今耸立于虎丘山巅，成为古城苏州的标志性景观。修塔施工中发现了众多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珍藏的古代钱币。

古代钱币是古代货币的具体形式，也是当时民众日常流通使用的货币实物。货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可以购买别的商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社会价值交换、流通的媒介物，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核算形式和价值体现。虎丘塔内发现的古代钱币，除了经济上的上述功能体现，更有文化方面的意义。

一、虎丘塔内发现的古代钱币

以加固虎丘塔塔体为中心的第一次维修工程于1957年开始施工，在3月30日的首先发现文物过程中，就发现了古代钱币。当时在二层楼面下的砖砌窟穴中发现了石函、经箱等珍贵文物，然后的情况是：“开启石函，即为经箱。箱盖上有已朽钱囊和散开的钱币，箱底垫有丝织物。”具体情况是：“放在经箱盖上之钱囊已腐朽，计散存铜钱3.5千克，钱币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周元通宝、永安五铢、太货六铢、半





两、五铢等。其中以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为最多。”

时隔上次发现古代钱币一个多月，1957年5月5日在第三层的施工中又一次发现了文物。当时的情况是，“5月5日，我会（笔者按：指苏州市文管会）在塔的第三层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除石函、铁函、金涂塔和越窑秘色瓷莲花碗等主要文物外，还放置了“古钱十千克，其中种类与第二层发现的相同，但多宋元通宝一种”。（以上引文均见《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

在1981~1986年的第二次加固维修工程中，后期的筑基和塔墩换砖施工，都对底层塔墩的砖砌体进行了必要的“手术”，即拆除部分的砖砌体，这样被珍藏在砖缝灰浆中的少量古代钱币也被发现了。这两个被简称为“盖”和“补”的工程施工时间为1984年6月至1985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这次砖缝灰浆中发现的古代钱币只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两种，数量约有数十枚。关于这部分古代钱币的情况，本人曾有报道：“笔者有幸参加了虎丘塔第二次工程，即以地基、基础为中心的排险加固工程。在塔的基础部分施工中，深入底层十二个砖墩底部及北面几个砖墩1.5米以下的砌体外层，在取出砖块及黄泥灰浆中发现夹置其间的相当数量的钱币。这些钱币只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两种，别无其他种类。而这两种钱币均是唐代流通使用随身所带的钱币。”（见《苏州文物》1992年第二期）

以上是目下所知关于虎丘塔内发现古代钱币的总体情况。

二、虎丘塔内发现古代钱币的铸用年代

自古代货币产生直至现今仍在使用的货币，这是一条关于货币发展的历史长河，虎丘塔内发现的古代钱币只是其中的一段。为了了解虎丘塔内发现古代钱币的地位和情况，有必要了解中国货币发展的简要情况。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中国货币发展分为五期：“吾国币制大略分为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渐少，乃代



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肇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吕思勉先生的文稿写于20世纪20年代，他所说的“今”即指这一时期，也即清末民初的时期，与现时的货币制度又不是一样的了。根据吕思勉先生的分期，虎丘塔发现的古代货币是在第三期内。关于铜制古代钱币，吕先生说：“钱币之用，自以金属为便，故自周以后，他物逐渐淘汰，而金铜专行。”“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当时切与民用者，惟钱而已。”虎丘塔发现的古代铜制钱币可证实建塔或包括其前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铜制钱币确为民间流通使用的货币。

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中有几种钱币铸造数量特别多，流通范围特别大，流通时间也特别的长。这几种举足轻重的钱币是半两、五铢和开元通宝。秦并天下，统一货币，铸半两为统一货币，文字重量相符。汉初文帝时，铸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以后汉武帝又令三官铸五铢为统一货币，此后直至唐武德四年（621）止，除王莽时期外，一直沿用。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一直沿用至宋初，其间虽有地方政权各自铸用地方专用钱币，但只有五铢和开元通宝是主流的钱币。下面试分析虎丘塔内发现的钱币：

半两是发现钱币中铸用最早的一种，《前汉书·食货志》曰：“秦兼天下，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按古以廿四铢为一两，半两即十二铢也。”此述的为秦半两钱，是秦统一前后与西汉初期流通的钱币，其始铸于战国后期的秦国，直径约3.0厘米，重约8克（秦汉时衡制每两合约今16.14克），无周郭，穿郭，平背，铸工较差，边缘上常留下来被磨去的钱茬。秦统一后，半两钱成为通行天下的法定货币。

汉文帝五年（前175），“更造四铢钱”，文曰半两，直径2.3厘米，重约2.7克，形似秦半两而稍小，此即汉半两钱。西汉初铸造过的半两钱尚有别的品种，但以此为主，数量亦多，直至景帝时仍铸用这种四铢半两钱。



虎丘塔发现的半两钱按其尺度及重量当是汉半两而非秦半两钱。

五铢钱是发现钱币中稍晚于半两的一种钱币。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圆形方孔，有周郭，背有内郭，法重五铢（约合3.6克），钱文篆书“五铢”二字，属记重货币。初由郡国分铸，规制很不统一，重量文字不甚严格。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规定须由朝廷掌管铸钱的“钟官”统一铸造，自此后钱型统一，色泽殷赤，制作精美。钱径在2.53~2.56厘米之间，重3.3~3.5克。自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至平帝元始五年（5），三官铸钱延续118年，数量特别巨大。王莽时虽一度废用，但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40）又复行五铢钱。此后一直沿用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前后流通使用700余年。虎丘塔发现的五铢钱据尺度和重量分析，有汉制五铢，也有非汉制五铢，即南朝梁武帝和陈文帝时铸用的五铢。

永安五铢是又晚于五铢的一种北朝钱币。北魏后期孝庄帝于永安二年（529）铸五铢钱，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自二年九月至三年（530）正月止，后东西魏皆铸之。这一时期铸造较多，亦流传至江南。因其稀少，故为民间收藏。

太货六铢钱是南朝陈时铸用的一种钱币。《陈书·宣帝纪》曰：“太建十一年（579）秋七月辛卯初用太货六铢钱。”《隋书·食货志》言：“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未几，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及至陈亡。故此钱流通前后不过10年左右时间，数量不多，后为民间收藏。

开元通宝钱为唐五代时的主流货币。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定每十钱重一两，一千重六斤四两。唐制一两合今37.30克，故开元通宝钱每枚重合今3.73克。开元通宝钱由唐重臣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字，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直读曰“开元通宝”，环读曰“开通元宝”，二者皆可。此亦后世钱币成元宝的由来。

乾元重宝为唐代又一主要钱币。《唐书·食货志》载：“肃宗乾元元年（758），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通宝钱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代宗即位后，凡三日，即与开元通宝钱“皆一当一焉”，后两种钱并用，但其数量远逊于开元通宝。唐武宗会昌间又铸新开元通宝，五



代时南唐及闽国都铸过开元通宝，吴越国也铸用过开元通宝钱，这样使乾元重宝更见稀少。所以虎丘塔发现的钱币中开元通宝最多，其次是乾元重宝。

周元通宝、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这三种钱币是五代时铸用的钱币。《五代史·周纪》曰：“世宗即位之明年（即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毁铜佛像，以铸（周元通宝）钱。”苏耆《开谈录》曰：“世宗铸用周元通宝钱，于金殿设巨炉数十，亲观鼓铸。”周世宗柴荣在位时间不长，显德六年（959）病故。次年正月赵匡胤以宋代周，故周元通宝钱铸用时间也不久，数量也不多。

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钱都是十国之一的南唐国铸用的钱币。《十国纪年·南唐史》载：“元宗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元通宝钱一。”（编者按：此钱有篆、隶、真书三种。）南唐元宗即李璟，其在位时用保大和交泰两个年号，即公元943年至960年，其铸用也当在此期间。大唐通宝钱亦李璟时铸用，但稍迟于唐国通宝，马令《南唐书》曰：“元宗铸大唐通宝钱，与唐国通宝钱通用。”陆游《南唐书》曰：“显德六年（南唐交泰二年，公元959年），铸唐国通宝。”可见这两种钱币到南唐国亡（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铸用也不过十几年时间。

宋元通宝钱为赵宋王朝所铸用的第一种钱币。《宋史·食货志》曰：“太祖初铸，钱文曰宋元通宝。”《续资治通鉴》曰：“建隆元年（960）十二月初铸宋元通宝。”这里明确指出此钱为宋太祖赵匡胤于建宋后建隆元年十二月初铸。

以上在虎丘塔内发现的钱币，从时间跨度上说，最早的为汉文帝时铸用的半两钱，最晚的为宋初的宋元通宝钱，历时约一千一百余年，除唐时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和五代的周元通宝、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及宋代的宋元通宝在虎丘塔建造时是流通使用币种外，其余数种已不是流通使用的钱币了，只是民间的收藏品，因为崇佛而作为供养品一起敬奉到虎丘塔内了。



三、虎丘塔内发现钱币的意义

在虎丘塔建造及其前后的这段时间，大致相当于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这时的苏州地区是属于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唐昭宗光化元年（898）攻占苏州后，直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主钱弘俶纳土归宋，苏州地区一直在吴越国钱氏政权的有效管理下，历时八十余年，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一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二级政权。虎丘塔的成功建造及其中的文物珍藏都应当是吴越国管理的成果。从前文的介绍钱币铸用情况可知，在虎丘塔内发现的十种钱币中竟没有一种标示吴越国独立存在的钱币，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吴越国从钱镠开始，就制定了“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钱镠在唐代后期的战乱中，以文治武功征伐唐朝的叛逆者，控制了包括今浙江、上海和苏南的二浙十三州地区。因其尊奉唐王朝，唐王朝先后封其为镇海军节度使、越王和吴王。在朱温的后梁取代唐王朝后，钱镠仍然臣服中原王朝后梁，虽也启用过自己的年号，但其审时度势，觉得吴越国只是东南一小国，力量较小，难以与周围的政治力量抗衡。故在去世前自己取消年号，并告诫子孙：“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钱镠的子孙四位传主都遵从遗训，尊奉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治势力如南唐、闽国保持长时期的和谐相处关系。在争取到的相对安定的小环境里，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使境内民众得以过上相对小康的生活，使吴越国成为唐宋之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政体，也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乐土。这种政治上的大政国策，使吴越国不搞独立，也不铸用标示独立的钱币。整个吴越国期间，境内仍流通使用唐代的钱币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这从虎丘塔发现钱币中的绝大多数就是这两种钱币就可以判定的。近年杭州雷峰塔遗址地宫中清理出来的钱币也只有开元通宝钱这也足以证实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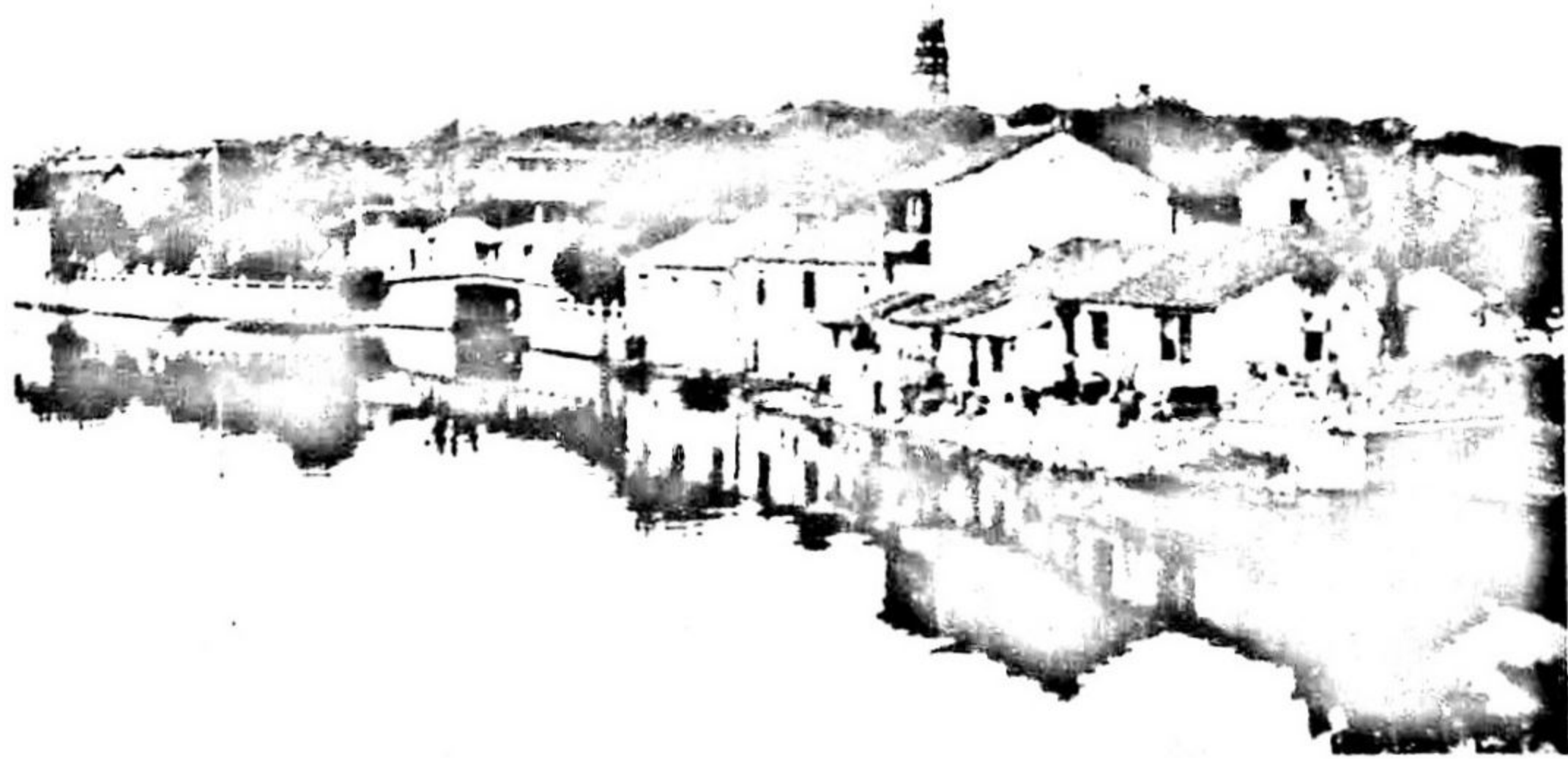
在发现钱币中有周元通宝、大唐通宝和唐国通宝等数种五代后期铸用的钱币，这数种已不流通使用的钱币的出现，说明苏州地处吴越国北部前沿位置，其承担着区域交往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地位。贸易交往必然伴



随货币的流通，相邻地区钱币的出现就是正常的事情了。这也说明虎丘塔的建造时期正是吴越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

开元通宝钱以前的数种已不流通使用的钱币的出现，说明当时民众有一种收藏热流，收藏是民众富裕以后的选择，而将收藏多年的前代钱币供养入塔更见民众的崇佛热潮。佛教进入中国后，早期受到统治者的利用才得以发展，在发展中也受到个别帝王的排斥和打击，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废佛事件。虎丘塔的建造是唐武宗会昌废佛后的佛教再度复兴。当然，当时中原政权的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年间（954~959）正在大肆禁佛，而地处江南的吴越国正在阳奉阴违地推崇佛教。吴越国主钱镠曾写过《造寺保民》的诗。他说：“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将推崇佛教与安民保民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丘塔才得以建造，民众也得以将收藏和使用的钱币供养入塔。近年杭州雷峰塔遗址地宫清理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各式材料制作的“开元通宝”钱，它和砖油瓦石一样是供奉品，是“敬献给‘佛祖’享用的，是吴越国王对佛虔诚供养的一种表示”。

在发现的钱币中时间最迟的是宋元通宝，紧接其后的是宋太宗赵光



虎丘塔及山塘街景色



义又于太平兴国元年(976)铸用的太平通宝,但虎丘塔中一枚也没有出现。这就为虎丘塔的建造时间规定了一个下限,即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因为此时虎丘塔的建造工程已经竣工,以后未能再将后续的钱币藏入塔中,为我们研究虎丘塔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佐证。这也是虎丘塔发现钱币的又一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 2.《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3.《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4.《中国制度史》,吕思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 5.《历代古钱图说》,丁福保编,上海书店1988年10月第1版
- 6.《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第3版
- 7.《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虎丘拥翠山庄





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圪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其中首先见到的即是石函一件。石函质地同上面藏经箱的一样，亦是砚石制作，作正方形，下广上狭，分五节叠成，无雕刻（底层27厘米见方，顶层22.4及22.5厘米〔笔者按：当为17.5厘米〕见方，共高44.1厘米），放在方窟的中央。石函中放置铁函，铁函中放置铁铸金涂塔，金涂塔内置金铸小瓶及细如小米的“舍利子”一粒。同样为叙述方便，称此石函为佛舍利石函。

以上是两件石函发现的情况。现在据《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以下简称《两塔文物》）所刊发的照片看，经箱石函的接榫缝角处和雕云纹的底板均有破碎和裂缝扩大，这是因为施工当时建筑工人对文物的发现和保护都事出意外，并未作事先的文物保护宣传教育，以致造成人为的文物损失。据原文化部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同志报道：

“当时一个工人就下去在发现的二层（窟穴）里面转了一遭，发现中间有东西，又出来拿了电筒下去，在中间看到石函，他将石函向外拖，乃将石函拖散，致成今存形状。”

王冶秋同志是在发现经箱石函的次日，即3月31日抵达虎丘塔工地视察的，他当时在工地工程组办公室首先看到石函，“长约三市尺，宽约尺余。四周凸雕菩萨像，甚精细。盖打开后，四块（笔者按：侧面）石板有榫口，无连，极易拆卸，函底还有木盒（笔者按：即经箱）的底板……”在侧面了解发现文物现状情况后，王冶秋同志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这一发现，也引起各地修缮古塔时，必须切实注意塔的内部多有极重要的文物，稍一疏忽，就会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是一位领导对文物保护方面语重心长的告诫。以后就接受教训，在虎丘塔三层发现的石函比较好地保存下来了。

二、两件石函的制作工艺

上述两件石函的石质材料称砚石，其实就是一般所谓的青石，学名为



石灰石,化学符号为碳酸钙(CaCO₃)。苏州地区这类青石产区较多,林锡旦先生在《苏州民间手工艺艺术》一书中说:“太湖之畔的洞庭东西两山产青灰色的石灰岩湖石(青石),坚实细腻,适宜雕刻,是建筑雕塑的绝佳石材,被大量用于建筑装饰,建造陵墓、寺院、桥梁、牌坊。”而苏州西南木渎灵岩山一带又产宜于制作石砚的砚石。明袁宏道《灵岩》载:“山下有石,可为砚。其色深紫,佳者殆不减歙溪。”这是说,砚石山所产砚石,其质优者不比著名的歙砚石石质差。虎丘塔内的两件石函的石材当是砚石山所产的优质石材。

石材的特性是坚硬、牢靠、厚重、耐蚀。成语“坚如磐石”、“海枯石烂”就是形容石材的这些良品特性的。而苏州地产的这种砚石更有细腻而宜于加工雕塑的特性。加上苏州地区手工艺艺术的精湛传统,吴地匠师“聪慧好古”、心灵手巧,因而随开山采石而兴起的后



虎丘憨憨泉

加工“细活”石雕石刻业,历代能工巧匠辈出,金山、藏书一带的石匠天下闻名,使之成为著名的石雕艺术之乡。

苏州的石雕作品,现存最早的出土实物是东汉末年孙坚、孙策墓的楣石,发现于今南门外青旸地一带,虽历经千余年的沧桑,仍可辨认出正面浮雕的龙、虎和人物等形象。而苏州文庙的宋代四大名碑,即《平江图》、《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足以说明苏州雕刻石材的优良和雕刻艺术的精湛。虎丘塔内发现的这两具石函一样是精湛的石雕艺术品。佛舍利石函虽为素面,没有雕刻图纹和人物形象,但在石函内放置铁制金涂塔等必须将石材凿刻为内部虚空的形制。现将高度44.1厘米分为五截雕刻,特别是最上层的一截,必须雕刻为内凹式的形制,而五截之间又必须上下密合又



保持形状的规整，成为一个完整的石函。这是颇见功力的。而呈偶数方形边数与呈奇数的五层层数又极合中国传统的阴阳相配相合的道理。佛经石函的雕刻更见功力和艺术素养。

佛经石函为六块版材制作，版块厚度仅2至3厘米。在侧面的四块版材外侧都雕刻了一组佛教群像。底部石材四周侧面都雕刻了8或14朵向上升腾的祥云。佛像雕刻虽只在高约10厘米、宽为20至30厘米的狭小面内雕刻，但每面五个佛教形象都栩栩如生、形神兼备，配合下面的祥云塑造出佛教庄严肃穆、神圣祥和的氛围，令人赞叹。

当然，两具石函分为六块版材和五截，是为便于加工和宜于珍藏其中的佛经和佛舍利。

以石函或石刻塔作为保护其中的佛经或佛舍利的最外层包装似乎为一种最典范的保护模式。2007年4月，海外华人王崇仁以巨资从香港购回一座佛舍利五重宝塔。此塔为辽代制作，塔为五塔层层相套，由外及内依次为石塔、铁塔、铜塔、银鍍金塔、黄金舍利塔。石塔全高1.75米，塔身雕有佛像、力士、侍女等。塔身四周环侍青石圆雕天王像。目前此塔已运至古城西安。据报道，王崇仁先生愿将该佛舍利五重塔无偿捐献给国家。（见2008年1月23日《中国文物报》第1版）当然此佛舍利五重塔体量庞大，特别是金银二塔材料昂贵，加上制作精美，当为皇家之物。相比之下，虎丘塔的包括石函在内的文物俱由民间供养实是不容易的。

三、佛经石函的浮雕艺术

佛经石函侧面四块石材表面均雕刻一组佛教群像，均为一佛二胁侍二菩萨之组像。细加分析则是大同小异。中间坐者为佛祖释迦牟尼，其后有背光和头光，身披袈裟，胸上部稍敞，头作螺髻状，两耳长垂。三面雕作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前面的佛祖像作两足着地坐，左手按左腿上，右手上伸曲臂作“施无畏印”，后面一侧的佛祖像作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手姿同前面者作“施无畏印”。两侧面者，其一作手持禅杖者，另一面的作双手合十相。佛祖两侧的为胁侍形象，剃度，皆着僧服，坐莲花座上，



有头光，左侧脸部有皱纹者为年长的迦叶，或称摩诃迦叶婆，为佛祖十大弟子的第一位，称上行第一，或头陀第一（专修头陀行），为第一次佛典结集的召集人。右侧年轻者为阿难，称阿难陀尊者，为佛祖释迦牟尼之表弟，侍从释尊前达25年之久，生性博闻强记，闻一知十，故称多闻第一。在佛祖经典结集中，大部分的经文都是凭他的记忆而口传笔录的。故此两弟子作为胁侍分列佛祖两侧。在雕刻形象中，迦叶作侍立握拳状，阿难作双手合十状，都作忠心侍奉佛祖相。

在这组群像的外侧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他们是辅助佛祖弘扬教法的，称之为菩萨，是据梵文菩提萨埵（Bodhisattva）之简称，意译为“觉有情”、“道众生”，旧译为“高士”、“大士”、“无双”、“大圣”等。僧法藏的解释为：“菩提，此谓之觉；萨埵，此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意思就是能求最高觉悟（佛道），教化众生，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这种“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思想是大乘佛教所特有的。

文殊，全称文殊师利，梵文Manjusri的音译，意译“妙德”、“妙吉祥”等。据说他在诸大菩萨中智慧辩才第一。他的典型法像是顶结五髻，手持宝剑，坐莲花宝座骑狮子。这是智慧、辩才、锐利、威猛的象征，其美名尊号为“大智文殊”，山西五台山为文殊菩萨之道场。

普贤，梵文Samantabhadra，音译为“三曼多跋陀罗”，亦译为“编吉”。他是一切诸佛的理德，与文殊的智德、证德相对，也就是说他代表“德”与“行”。德，据说他有延命之德；行，据说他发过十种广大行愿，要为佛教弘法工作，所以他的美名尊号为“大行普贤”，普贤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

佛经石函上组像的菩萨分列佛祖及迦叶、阿难俩胁侍之两侧，直立于较大莲座上，有头光，其形象与装束至唐代也开始定型，即稍长的女相圆盘脸，长而弯的翠眉，凤目微张，樱桃小口，高髻，多出来的长发垂在肩上，戴金冠，上身半裸，斜披天衣，有帔巾，肤色润泽光洁，戴项饰、璎珞、臂钏，腰束贴体羊肠锦裙，两足丰圆，体态修长，双手合十侍立于两侧（左右两组像中有一菩萨作二手平放之法界定印），协同佛祖在弘化佛道。文殊、普贤身上繁丽的衣饰是当时汉族人想象的古代印度次大陆的



贵族装饰，又夹杂着唐代贵族妇女时装，是两者奇异而协调的混合。健美的面庞和体态，则纯是以唐代贵族妇女特别是家伎等女艺术家为模特儿而塑造的，这是中国化了的菩萨形象。

唐代菩萨形象中，为不违反佛教中菩萨变相“非男非女”，即据佛经说，菩萨一般都是“善男子”出身，故通常在菩萨脸上画出蝌蚪形小髭，至北宋后小髭取消。而佛经石函上四面的菩萨形象都呈现女相，完全没有显示男性的小髭，说明唐末五代正是这种形象发生变化向北宋过渡的转型时期，而这石函的制作时间当在唐末至五代的这一时期内。



虎丘“风壑云泉”刻石

四、两件石函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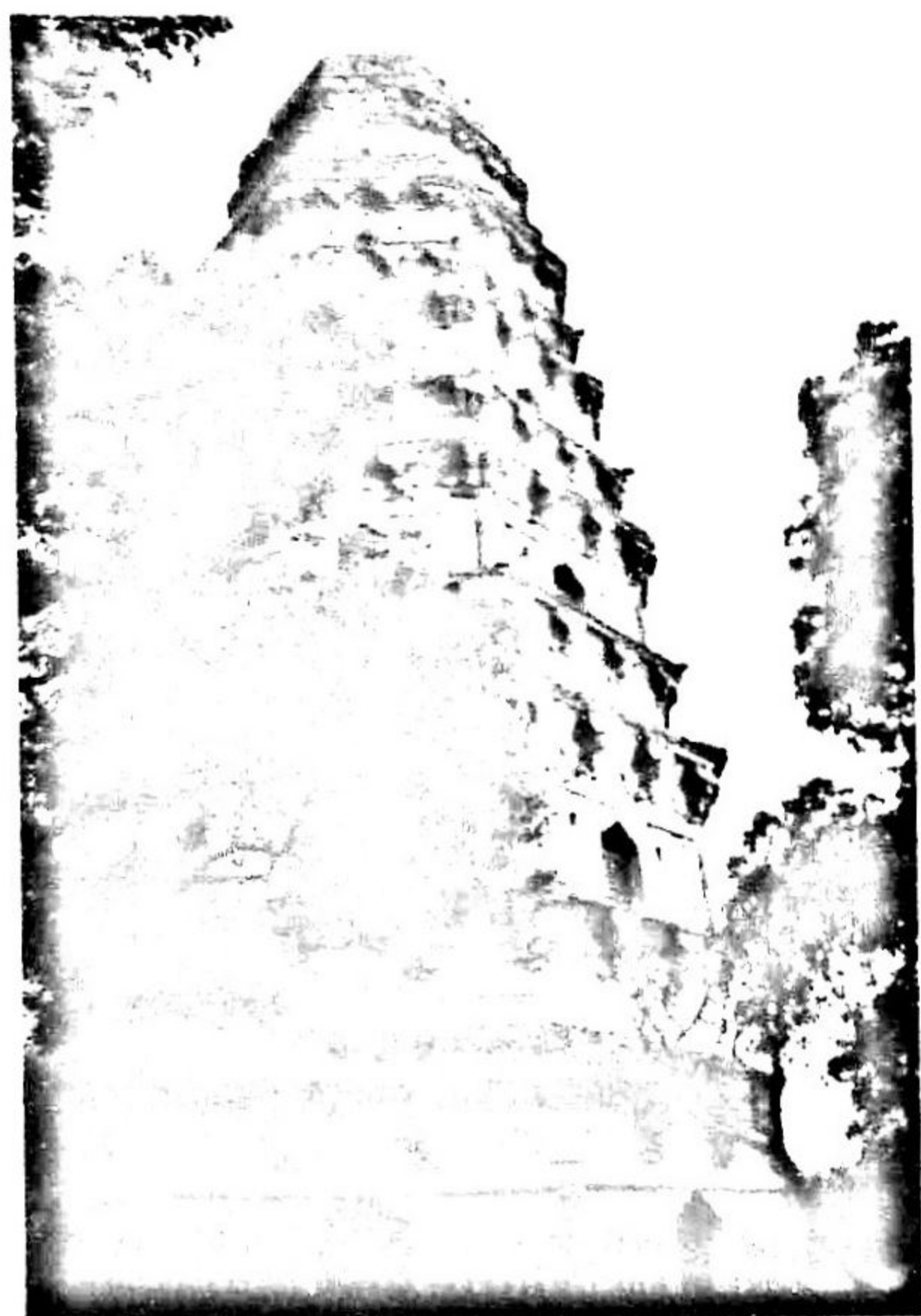
作为外包装的两件石函，特别是佛经石函的佛教艺术形象的呈现，充分说明了五代钱氏吴越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民间工艺制作水平的精湛。因石函内部保护的是佛经和佛舍利，且其中包装的经箱和丝绸上都题写了供养寺塔的题记，也说明了吴地民众已经掀起的一股信佛、崇佛、供佛的热潮。虎丘塔这样宏大而细致的大型建筑工程绝不是一两年的短时间内能建造出来的，虎丘塔及其内发现的文物即其见证。同样，塔内发现众多的佛教文物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制作出来供养至寺塔内的。盛世修塔，正是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国策，使得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境内争取到几十年的相对安定的环境。吴越国主钱镠至钱弘俶都重视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垦荒屯田，繁荣经济，使之成为富庶繁华的一方乐土，加之倡导佛教，掀起崇佛热潮，这样才出现虎丘塔的建造及塔内诸多文物的制作和供养入塔。应该说，虎丘塔及塔内包括石函在内的诸多文物就是五代吴越国境内政治、经济、科技及文化



艺术的集中体现和物化证据。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佛教艺术百问》，丁明夷、邢军著，中国建筑出版社1989年6月
- 4.《中国佛教图像解说》，业露华撰文，张德宝、徐有武绘图，上海书店1992年4月第1版
- 5.《佛教手册》，释宽忍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1月
- 6.《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 7.《苏州民间手工艺艺术》，张澄国、胡韵荪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虎丘塔



發現美起

虎丘塔文物



【珠椋皆贵——虎丘塔发现的经箱】

成语“买椋还珠”是说郑国人买下包装华丽的匣子，而将匣内的主要物品珍珠退还了楚国人，比喻购买者没有眼光，取舍不当。对于虎丘塔内发现的佛经和经箱，虽从佛教业内人士说，这两者也有珠椋的关系，作为包装的经箱怎能和承载佛法的佛经相比较呢？但是作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文化遗产的人员来说，经箱和其包装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珍视和关注，并着力加以研究学习的。

一、经箱的发现

1957年3月30日，也就是苏州虎丘塔经过有关部门和人员精心准备后施工不久，就首先发现了塔内珍藏的佛经及其包装——经箱。发现情况如下：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3月30日下午施工时，工人在塔内的第二层塔心室西门口边沿向砖缝灌浆，屡灌不满，以为其中存有空隙，乃揭开一部分砖砌，发现孔道。探身而下，进到中间，发现一条十字形空街，南北长1004厘米，东西长1140厘米，阔68厘米，高63厘米，中间放着石函一具和其他文物多件，即行取出。因缺乏经验，兼暗中摸索，使函身拆散，伤及经箱底板，以致箱内绢袱等物有所损坏。



虎丘塔文物

经过整理，知石函内的经箱系楠木所制，外涂广漆，长37.8厘米，阔19.2厘米，高21厘米。各部接缝处都镶银质鎏金镂花包边，或作莲花，或作凤尾，极为工细，边上并列钉上成凸形圆钉。箱口搭连上扣有鎏金镂花，俗称爆仗锁一把，长10.6厘米；钥匙扣在锁上，长6.3厘米。箱盖中间分钉鎏金角形莲花四朵（一朵已脱失），中心有交飞状凤凰一双，已脱失，留有痕迹。底座四周木边雕有镂空如意头，附近镂边上横凿小字一行：建隆二年男弟子孙仁朗镂，愿生安乐国为僧。箱底露在外面部分，有毛笔写字：女弟子言细招舍净财造此函盛金字法华经。弟子孙仁迁舍金银并手工装。弟子孙仁朗舍手工镂花。辛酉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宝塔。箱后铰链作茧形，上面有双钩凿摄“孙仁福”三字。这只经箱，大体完整无损，镂金工艺甚为精妙，箱上记有镂艺人和供养人姓名，更属可贵。

以上是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对当年发现的经箱的情况介绍，这比发现次日于1957年3月31日《新苏州报》上的新闻稿《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要详细得多，将经箱的形制、材质、装饰，保护用锁匙，特别是经箱及装饰上的题记都详细介绍，也是虎丘塔发现文物中介绍得最为详尽的，为后人认识虎丘塔及发现文物作了基础性的工作。这是我们感激不尽的。

当时在虎丘塔施工现场视察的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观看了现场和经箱等文物，对于将石函拖散，“致木函（即经箱）底部脱落”而使文物保护不完全到位，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告诫：“各地修缮古塔时，必须切实注意塔的内部多有极重要的文物，稍一疏忽，就会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二、经箱的制作解读

经箱所用木材系楠木，这点至今已得到共识。楠木是一种优质木材，富有香气，耐腐蚀，少变形，是一种建筑和制作器具的优良材料，产于我国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北等地。苏州瑞光塔顶部有一根长达10余米的楠



木刹柱，作为瑞光塔的主干材料，在风雨中顶住塔顶和塔刹已千年之久而不朽，至今发挥着相当重要作用，楠木的卓越功能可见一斑。虎丘塔内存放《法华经》的经箱选用楠木制作是适得其材的，而今这经箱放在苏州博物馆展室内展示，证明了其材质性能的确不是一般的平庸之材。

此楠木经箱分为顶、体和底座三部分。顶为盃顶，由九块楠木拼构而成，在其上、下及四角结合处均镶银质鎏金镂花包边，包边上钉圆形凸起之泡钉以固定包边于楠木上，顶之下及前后分别钉以锁扣和铰链，以连接箱体。箱体作长方体，其与顶合成的长方体空间作置放佛经（《法华经》）和供养人题名卷之用，箱体以五块较大之整块楠木板材拼构成，在上下边沿和转角处也同样镶以鎏金银质包边，并钉圆形铜泡钉，后面加以铰链与顶固结在一起，前面以搭扣加铜锁使经箱能够开启和锁闭，底座以四块镂空云纹图形的侧板和一块底板拼构成，以承托经箱的箱体，其四侧板材的镂空穿透当为流通空气，以减少不透气致湿对佛经的损害，底座的上下及转角处同箱体一样镶鎏金银质包边和列钉铜泡钉。整体经箱制作精致坚固，装饰精美华丽，显示了唐、五代时精湛的工艺水准和科技水平。除了储存佛舍利的小型金瓶外，经箱的鎏金银质包边是虎丘塔内诸文物中最为珍贵的金属制品，其重要性除保护佛经作用外，其自身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与经箱下面配套的一把锁及钥匙。前面提到此锁俗称爆仗锁，长10.6厘米，钥匙扣在锁上，长6.3厘米。之所以称爆仗锁是因为锁之一侧有一圆柱如爆仗（爆竹）形之锁芯，在锁芯内有经机械加工之金属齿牙，可将套入内之锁杆卡住而呈锁闭状态，而此钥匙插入锁芯内则可拨动齿牙以开启锁具将锁杆拔出呈开启状态，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属机械锁具。在唐、五代时出现，是我们古代人民智慧和科技能力的一种显示。而且这种小不点、小玩意的物件一般是不入文物大堂的，在历史文物发现中，锁是极为罕见的，只在日本的正仓院出现过一件类似的锁具。此锁的出现足见当时对佛经包装和保护的重视和精心策划布置。在兵荒马乱的时期，民众为兵乱所扰，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障，如豫兵孙儒入据苏州时，大肆烧杀抢夺，临离开时将抓住的人都杀死用盐加工作为兵士



的食粮，在此状况下，连生命都无法去保障的民众是不会奢谈什么起保护作用锁具的。经箱包边上“愿生安乐国为僧”的题记也只是经历了战乱灾难的民众对战乱的厌恶反对和对自己要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呼声。

经箱背面是在顶部下包边与箱体包边结合处加以两个长圆腰形的铜质扣件，即上文介绍中说的铰链作茧形。此扣件上下各凿有孔径为约4毫米的圆孔，分别以相当精细的铜线加以铆固在银包边及其下楠木中。铜线作半环形，使箱顶部可作适度的转动以作为经箱的开启之用。此两扣件造型圆润优美，尺度大小适宜，且配置在两端箱边约10厘米处，使开启箱顶时受力均匀，而无外加堆砌的感觉，扣件表面距周边处有刻线一周，视觉上的工艺感受较好，一则雕刻有供养人姓名“孙仁福”三字，背面作铰链作用的制作同样给人以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感受，是唐、五代吴地匠师智慧的一种体现。

三、经箱及其题记的意义

经箱作为盛置及保护其内的佛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箱用材之精及制作的巧都显示了当时供养人即吴地民众对佛教崇信的热烈。根据经箱题记上两次出现的年号“建隆二年”和“辛酉岁建隆二年”，可知这经箱的入塔时间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在位的“建隆二年”，即公元961年，入塔是“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制作时间要稍早于此时日。此时的苏州在五代十国的唐宋过渡之际，实际上还是由吴越国的钱氏政权进行管辖，执政者为钱鏐之孙钱弘俶。宋太祖赵匡胤于此年的前一年，即公元960年的建隆元年正月以陈桥兵变的方式夺后周政权，称国号为宋。宋朝建立之初，十国中尚有南唐、荆南（南平）、南汉、后蜀、北汉及吴越六国。当时宋太祖正忙于征战统一大业，而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正作“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决策下的建设小康局面，经济逐趋繁荣富庶，而在钱鏐、钱弘俶等吴越国主倡导下，佛教在吴地热烈迅猛发展。此时恰逢后周世宗禁佛，北方僧侣先后南迁，故苏州地区在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后加速寺塔



的建构。盛世修塔，建塔是当时当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热播的集中体现。虎丘塔是一座大型而精美的佛塔，其形制、结构、用材、入塔文物均是前所未有的，其反映的也恰是这些方面的成就和业绩。

钱氏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历时最久的一个政权，自钱镠任杭州刺史起（887），至钱弘俶归宋（978），共历时90余年。苏州自唐龙纪元年（889）为钱镠攻占，到归宋时（978），也历时90年，在后梁贞明五年（919）后，无战事达数十年。吴越国开创者钱镠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采取“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对于北方的中原政权，即自唐至宋的多个政权自始至终保持尊奉臣服的态度，决不搞独立割据，这样就取得实力最强的中央政权的支持，使其政权维持得最久，也为民众争得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其最明显的标志是除吴越国主钱镠曾使用过一段时间自己的年号外，长期使用中央王朝的年号。如经箱题记所示，此时宋朝刚建立不足二年，实在无力管辖吴越境地，而吴越国境内均主动使用宋太祖开国的第一个年号“建隆”，及至十余年后吴越国主动合并至赵宋王朝中去。百家姓首句的“赵钱孙李”将这种政治隶属关系从此定格下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关系的一种范例，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虎丘塔的成功建构，塔内大量精美工巧文物的入藏，以及至今仍然点缀着吴地的双塔、上方塔、灵岩塔、瑞光塔等一大批宋初佛塔的建成都是五代至宋初吴越国境内佛教热潮的实物证据。吴越国境内政治务实，经济繁荣，民众小康，至今此一地区即长三角地区仍是国内最具活力的经济发达地区，除了钱氏国主以睿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基本国策外，其倡导和崇信佛

教也是其配合基本国策实施政治的又一举措，吴越国创立者钱镠曾写过

羽泉茶可試
草荒支潤鶴
空還不知情
遠詩何處翠
能苦花細雨

雲嶽四月野
崇開無數情
陰覆綠苔意
利不嫌山近郭
春歸聊與客
登臺苦墳誰
識真娘墓水

明文徵明行书《虎丘》诗局部





虎丘塔文物

一首《造寺保民》的诗：

百谷收成届应钟，南方景象喜重重。
三秋甘泽烟尘息，四序和风气色浓。
播种勤耕盈廩庾，兆民兴让洽温恭。
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

这首诗是说吴越国境内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社会安定、五谷丰登，所以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勤劳和谐。而吴越国王儒释道三教并宗，修建寺庙，正是为了替百姓祈祷神灵的保护。这是将佛教与儒道并列为三教，进行思想方面的精神教育的一种方式。吴越国境内的长期安定繁荣，及至北宋时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都说明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倡导并崇信佛教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鍍金银质镶边上镂空的题记“建隆二年男弟子孙仁朗钱，愿生安乐国为僧”，说明供养人孙仁朗供养的果敢虔诚，也说明孙仁朗是一位经历了战争磨难的过来人。“愿生安乐国为僧”也只是为了争取一个没有战争苦难的生存环境，“为僧”只能食素，没有更为奢侈的生活，这样起码的生存条件也要作为誓言镂刻在鍍金银质镶边上，还说明孙仁朗正热爱着当时吴越国境内安定和谐的生活而诅咒弃绝昔日灾难般的战争离乱生活。

经箱虽小，其内盛置的经卷及供养人题名也不多，但却揭示了供养此经箱时代的民众的崇佛情结，更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的政治、经济、民俗、科技和文化艺术方面的状况及水准。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中国通史》（六卷、七卷），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 4.《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5.《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 6.《吴越首府杭州》，周峰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 7.《钱氏吴越国文献与文学考证》，李最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 8.《苏州虎丘塔是五代吴越国树立的千年丰碑》，《钱镠研究（16）》，2007年





【绣团锦簇——虎丘塔发现的丝绸与绣件】

我国是桑蚕养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地域广远，故丝绸和刺绣也历时久远，且因丝绸精细光滑，适于染色、加工，自古以来就是高级面料，用于高档的服装、装饰和书写，也用于贵重物品的包装，自新石器时代起丝绸和绣件一直是珍贵的材料和成品，用于佛经的包装即是实证。1957年虎丘塔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抢救性的第一次加固维修工程，在施工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就有本文拟介绍的丝绸和绣品。

一、丝光夺目——虎丘塔发现的丝绸

1957年农历春节过后不久，虎丘塔的抢修工程就在准备已久的情况下施工了，3月30日下午在第二层楼面中央砖层下面发现一条十字形的空弄，空弄南北长10.04米，东西长11.40米，宽0.68米，中央部分深0.63米，在此弄中间放置了石函一座，石函由六块砚石雕凿后组成，其尺寸为长46.0厘米，宽26.5厘米，高25.0厘米。

石函中间放置楠木经箱一个，经箱外涂广漆，为盃顶长方体，各面结合处均镶包银质鎏金花边，上钉金属泡钉，尺寸为长37.8厘米，宽19.2厘米，高21.0厘米。箱口搭连上扣有鎏金镂空花俗称爆仗锁一把。

在经箱内放置手书金字《妙法莲华经》一部共七卷，及纸质墨书“供养人题名”一卷等文物，这七卷经卷和供养人题名卷外均以丝质经袱和经



發現卷之二

虎丘塔文物

帙包裹，另有丝质飘带、小块绫绢和绣品5件存置在经箱内，现将这些丝质文物介绍如下：

第一卷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外面包裹经袱约46厘米见方，已泛作灰绿色，袱上印淡黄色圆形花纹16朵，中间墨书“女弟子於八娘捨裹金字法华经永供养”，一角有宽飘带2条。

第二卷外包裹经袱3块，第一块约44厘米见方，已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上墨书三行：“武丘弟子曹二娘捨裹妙法莲华经卷塔上。”第二块约50厘米见方，亦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上墨书：“李氏六娘捨裹经。”角上飘带有墨书“李氏六娘”四字；第三块约48厘米见方，亦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袱上有毛笔绘画简单花枝16朵，中间墨书“颜氏八娘太君捨”等字。

第三卷外包裹经袱2块，均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第一块约44厘米见方，中间行墨书“永充亡杨氏二娘供养”，袱边未经缝制。此卷展开时，内中放置1~2厘米见方且花纹不同的绫绢数十块；第二块约50厘米见方，袱上亦有手绘简笔花纹，中间墨书“朱氏九娘太君捨裹经”，一角有灰色飘带2条。

第四卷卷面写“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外包裹经袱约45厘米见方，已泛作檀香色，但微见有方形回纹，绢纹稀疏，袱中墨书分二行为“徐口捨裹金字经”、“充供养”等字，袱角亦有飘带。

第五卷外包裹经袱3块，第一块约50厘米见方，已泛作檀香色，袱上有手绘简单花枝，中间墨书“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捨”，袱边有同样墨书小字一行；第二块约45厘米见方，亦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袱中墨书二行写“永充弟子杨公儿捨”；第三块约46厘米见方，已泛作灰绿色，袱上

虎丘云岩寺二山門匾額題字
大吳勝壤
虎丘云岩寺二山門匾額題字
大吳勝壤

大吳勝壤

虎丘云岩寺二山門匾額題字



有淡黄色印花纹，中间墨书“女弟子高十娘太君捨裹经”。

第六卷外包装裹经袱约45厘米见方，已泛作檀香色，拉花织纹，并有手绘简单花枝图纹，中间墨书“女弟子冯氏十一娘捨裹金字法华经入武丘山寺塔内充供养”。

第七卷外包装裹经袱4块，第一块约46厘米见方，已泛作灰绿色，上有淡黄色印花，墨书二行为“女弟子钱四十二娘捨裹金字经”；第二块破残较甚，尺寸不明，已泛作灰绿色，其质薄如蝉翼之纱，中间唯存墨书“金字经”三字；第三块尺寸不明，已泛作灰绿色，拉花织纹，上有淡黄印花痕迹，中间墨书“弟子郇承諲捨裹经”，旁有飘带，有墨书“郇承諲捨”四个小字；第四块尺寸不明，已泛作灰绿色，绢纹稀疏，中间墨书仅写“捨裹金字经”五字。

“供养人题名”卷似白锦纸书写而成，卷长28.5厘米，质地酥烂，无法展开，从剥落碎片见卷内都是人名，可知是供养佛塔及文物者姓名，

“供养人题名”卷外包装裹绣花经帙，尺寸不明，颜色已泛作灰暗，中间墨书“弟子徐仁海供养”等字，内中残存一“捨”字是绣成的。

同在经箱内的还有破残经帙四块，皆为花卉绣品，另有锦包竹帘一块约长47厘米，宽23厘米，这是以丝织物编织入细小竹丝，以制成包护经卷、书籍的专用器物。

1957年5月5日，施工至塔上第三层时，在楼层中间砖下70厘米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穴，空间为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在窟穴中发现套合放置的石函和铁函，铁函内放置一个存放迦叶如来真身舍利的铁铸金涂塔，金涂塔上覆盖绢袱五块，大多朽烂，其中较完整的一块已泛成淡黄色，上有墨书二行：“□□惠朗捨此袱子一枚裹迦叶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一块约54厘米见方，已泛作豆灰色，其余纹如葡萄绉者，字已模糊不清，一角缀有飘带；一块尺寸不明，织有花纹，上有墨书“辛酉岁题”四字；另一块尺寸不明，似绢，泛作栗壳色，上墨书“充供养”三字；又一块尺寸不明，织有花纹，色已泛作深赭。另有1~2厘米见方的各种花纹的小块绫绢数十块散置金涂塔上。

以上是虎丘塔内发现丝织物的全部内容，计有经袱15块，经帙6块，



绢袱6块,竹帘锦绸一件,飘带约8件,1~2厘米见方的各色小绫绢两处各数十块,总计近200件,林林总总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据建塔年代推测当为晚唐至五代之物,这是苏州现存最早的丝织文物,也是苏州先民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丝绸及绣品均是桑蚕吐丝而编织制成,色泽明艳华美,质地轻盈、坚韧,其上有编织及绘印的华美图纹,光彩夺目,是最宜于制作服饰和包袱的软包装精品材料,是区别于一般民众使用的高档装饰材料。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女尸就身穿丝棉袍,足蹬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陪葬品中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还有一幅彩绘帛画;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窖中装置舍利的金属塔形宝函外也均包裹丝绸织物,均说明丝绸织物确是最为精美的包装、装饰材料,但丝织品又是一种动物蛋白所构成,在温湿度及保存小环境发生突变时极易发生风化,以至于变形、变质及消失,故丝织品的保存极为不易。这样,虎丘塔内保存至今的这批丝织文物更属珍罕而可贵。

二、锦上添花——虎丘塔发现的绣品

从上述部分可知,在虎丘塔发现的林林总总的百余件丝织文物中,有5件上面绣有图案和文字,即是锦上添花的绣品。绣品就是在丝绸的底质上,凭藉针的穿刺运动,以丝线增添于底质之上,构成花样、图案、文字或物像,得到的即是刺绣的绣品。刺绣是中国传统的服饰装饰工艺,以其富丽、多彩、典雅的特色和精湛的技艺闻名于世。虎丘塔发现的一件“供养人题名”卷外包裹的经帙虽是绣品,但只残存一个“捨”字,另有破残经帙四件,皆刺绣花卉,针法不甚细致,却古朴大方,部分色彩尚可辨明。关于这四件绣品,在发现18年后的1985年12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中,由原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陈玉寅先生加以介绍,其在图册中编号为一六三至一六六,兹分别或专摘如下:

一六三:栗色绢地绣宝相花纹经帙[五代],残长60厘米,宽56厘米

纹样骨格为菱形,以宝相花为中心,四向放出侧面形莲花四





朵，间有两只莲蓬，其外用牡丹和海棠组合的带状花纹装饰，在经帙四角，以缠枝牡丹组成三角形纹样装饰，针法有散套针、戗针、齐针、辫子股绣等，线用擘绒，色彩为深蓝、天蓝、浅蓝相配，以白色相间，即三蓝加白，质地明丽。

一六四：栗色绢地绣宝相莲花纹经帙〔五代〕，残长56厘米，宽52厘米

纹样以四朵莲花组成菱形图案，左右花头相对，上下侧向的花头相对，枝叶陪衬，分布于上下左右，构图大方。针法花瓣用散套针，莲叶用齐针刻叶筋，枝用辫子股绣，色彩为三蓝加白，颇具唐代遗风。

一六五：黄绢地绣凤穿牡丹纹经帙〔五代〕，残长41厘米，宽51厘米

纹样以卷草环成菱形，内有二只凤凰相对而飞，民间称之为凤求凰，四角绣四面对称的缠枝牡丹，针法有散套针、戗针、齐针、辫子股等，凤凰用红、蓝、绿、白等色，富有民间气息，绣帙左边残存墨书“丘山寺宝塔上”六字。

一六六：紫绛绢地绣宝相睡莲经帙〔五代〕，残长15厘米，宽34.7厘米

图为经帙的中心部分，绣一大朵正面莲花，四周枝叶对称缠绕，针法花瓣用散套针，针脚匀齐，莲叶用集套针，丝理向叶心汇集，叶边扣线作双勾，花枝用接针，圆转自如，两针衔接处藏针不露，莲瓣色彩金黄，配淡绿色宝相花，浅蓝莲叶，绿色缠枝。

以上摄影为郭祥同志，本卷主编为黄能馥先生。

近日向苏州刺绣史家孙佩兰先生请教，其在《中国刺绣史》中介绍，虎丘塔二层窖穴内发现的绣品为五件，即除上述四件外，“还有一块是在深紫色底上用金黄色绣菱花”，并对以上五件绣品的底质和针法作了补充。孙佩兰认为这几件绣品“均以罗为地”，针法有齐针（即铺针）、平戗、接针、辫绣等，唐五代时还没有陈玉寅先生所说的套针针法，而这几件绣品是属于民间的日用绣品，属单面绣。它的特点还比较粗犷大方，色泽鲜艳明丽，而绣品中的牡丹花样及其演化的宝相花样都显示唐五代时



期艺术的特色内容。牡丹原为野生，隋及唐初才开发为栽培品种，因其花大色艳，富丽堂皇，特别是唐代中期受到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推崇，成为中国名贵的特色花卉，号称“花中之王”，享有“国色天香”之誉。经唐代大画家边鸾等人精心绘画后推广至唐代的各式绘画品中并演绎出图案式宝相花样，虎丘塔内外塔壁处的灰塑画百余幅牡丹正是唐五代时牡丹画盛行的实证，五幅绣品中出现牡丹花图纹及其演化的宝相花图纹正说明绣品无论内容和技法都继承了唐代的风貌特色，与敦煌及法门寺发现的绣品相比，确是五代时的珍贵文化遗存，在中国刺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北京故宫，丝绸及绣品仍是皇室人员的主要衣料和室内的主要饰品。时至今日，佛教寺庙中的帐幔之类的饰物仍以丝绸及绣品制作，现在丝绸及绣品仍是高档的精美的软材料。

三、超越佛国——虎丘塔发现丝绸和绣品的意义

人们为了生活，“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活内容，除了吃饭的食，衣，即穿衣该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了，这点不言而喻。面料是制作服装的基本材料，是形成服装风格、体现着装效果的主要因素。面料有丝、麻、毛、棉之分，有精、糙、粗、细之别。由桑蚕吐丝而织编出来的丝绸是最基本的衣料，它和葛、麻一起成为人类早期的衣料，由于这些织物衣料的出现，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成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人类的发展与已经产生的纺织品生产几乎同步，直至现今的社会。

丝绸属于精细衣料，丝绸源于中国，中国是最早发明和生产丝绸的地域。文献上说丝绸产生于伏羲或黄帝时代，这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先后发现了丝织品的遗址和早期的丝织品，说明我国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五六千年前的先民已经发明和生产桑蚕丝绸。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至有绢、纱、纺、绢、縠及带花纹的绮锦等丝织物出现，证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汉唐时期，丝绸的提花、色彩及产量都得到大幅的提高和扩大；丝织品及生丝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中亚、西亚、地中海沿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岸及欧洲，受到各国普遍欢迎，促进了东西方贸易、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古希腊、罗马人因此称中国为“丝国”。

丝绸织物的发展，主要在工艺技术和审美技艺两个方面：工艺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织物品质的提高，由平纹组织发展到斜纹组织，由平素织物发展到小花织物，由单组经纬织物发展到由多组经纬构成的重经重纬织物和起绒织物；而审美技艺发展呈现为纹样的演变，主要通过织花、印花、绘花、绣花等方式在织物上表现出来，这已经突破其实用功能，而反映出精神方面的是审美需求。出土的丝绸文物显示先秦时期丝绸纹样造型质朴大方而富于变化，与当时陶器、青铜器、漆器等纹饰艺术是相协调适应的；秦至魏晋时，丝绸纹样呈现题材和风格的丰富多样性，在几何图形基础上出现了鸟兽、云气、山水、文字等种类及其组合穿插，更显活泼豪放；隋唐时期更有发展变化，缠枝、团花、小朵花、簇花等新纹样流行，更具丰满、肥硕、浓厚、艳丽的特色，是隋唐一统，繁荣富强的盛世时代的映现。

虎丘塔内发现的丝绸及绣品正是隋唐丝绸及绣品的发展、延续的实证，今存虎丘塔的建造是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的事。此时苏州地区是由吴越国钱氏政权管辖，据史证实，吴越国钱氏政权实际管辖的时间是唐昭宗光化元年（898）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的80年间，虎丘塔建造大约也在此时段内，而塔上发现的丝绸及绣品也是此一时段之物（入塔时间是其下限）。由丝绸上遗存的供养人题记及一卷纸质供养人题名可知，这些丝绸及绣品都是由民众身份的施主所供养，也就是这些丝绸及绣品基本是由当地的民间所生产的。前面已叙述过丝绸数量之多，而据文献表述，这些丝绸品中当有纱、绢、绮、罗、锦等较多品种，而绣品中包含有多种针法及纹样，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精品，虽非宫廷用品，但与当时民众日用的葛、麻织物相比，实在是精粹极品，是当时的高档材料经精心加工制作的顶级衣料和饰料，并用于虔诚崇拜的佛塔珍藏品上，这是中国丝绸及绣品发展至五代时期的实物见证，体现了当时丝绸及绣件的水准。

前面介绍，这些丝绸及绣品是以经帙和经袱的形式体现的，也就是用



虎丘塔文物

虎丘塔文物

来包裹、保护其中的佛经和金涂塔（内中含佛舍利）的。舍利和佛经都是佛的象征和标志，是信奉佛教的信徒们的膜拜对象，将自认最珍贵的材料供奉于佛教寺塔中，最说明佛教弟子的虔诚，无私真切，而众多信徒的供养就形成了一个佛教发展的热潮。而此前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的禁佛运动，特别是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对佛教打击极大；五代后期北方的皇帝周世宗柴荣又发动了一次禁佛活动，也即中国佛教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禁佛运动，使佛教受创极重。但吴越国主却信奉佛教，认为佛教是利国利民的事，首创的吴越国王钱镠写过《造寺保民》诗，将建造佛教寺塔与保护民众联系起来，并在诗中说：“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认为佛教与儒家、道家一样，都是“至道”，也就是至上的道理，用这样的至道来教化民众，于国于民都是极好的。据佛教史及相关文献记载，当时北方遭难的佛僧纷纷来吴越国境内发展佛教，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境内佛教宗派林立，信徒广众，建寺造塔，诵经塑像，供养礼佛形成一个劫后重生的礼佛热潮，大力倡导和崇信佛教的吴越国王钱弘俶成为名归实至的佛教领袖，至今苏州佛教界还在赞誉钱镠王是恢复、发展苏州佛教的一大功臣，而丝绸上的众多供养题记“女弟子”“永充弟子”“捨裹金字经”“永供养”“充供养”等说明当时佛教发展已经深入民间，深入人心。

虎丘塔上丝绸及绣品题记中还出现了“武丘山寺”“辛酉岁题”的文字，结合同时发现文物上的“建隆二年”题记（在经箱及镶边、大镜上三处出现），可以了解作为吴越国的政治态度。虎丘是春秋时吴国埋葬吴王阖闾后出现的地名，唐《吴地记》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都说到虎丘地名的来历。这地名也一直沿用，但至唐武德元年（618）高祖李渊登基开创唐帝国时，为尊其祖李虎为太祖景皇帝，从此有唐一代都避讳这“虎”字，改为“武”字，虎丘山在唐时也成了“武丘山”，这虎丘山上的寺庙也因此命名成了“武丘山寺”。建隆是北宋太祖赵匡胤使用的年号，时至五代至北宋初年的“建隆二年”、“辛酉岁”（961）题记上还使用“武丘山”和“建隆”的年号，说明吴越国主钱镠及其后继者都是尊奉中原王朝而没有搞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这与五代时的其他诸政权是不同的。





虎丘摩崖石刻“剑池”

钱鏐在唐时曾先后被封为杭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越王和吴王，五代时朱温后梁代唐时，钱鏐受封为吴越王，始终以一个中央王朝的臣下自居，直到其孙钱弘俶纳土归宋前，前后70余年，先后接受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直至北宋的封号，从不以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自居，“尊奉中原，保境安民”是吴越国钱氏政权的一个基本国策，至太平兴国三年时，钱弘俶纳土归宋，完成北宋王朝的统一大业。了解这样一个政治背景，我们就能准确理解出现在丝绸相关文物上的“武丘山寺”、“建隆二年”、“辛酉岁”等文字了，而北宋时定格的百家姓，更出现了首句的“赵钱孙李”次序，说明吴越国钱氏作为一个二级政权的世家大族已经为中央的赵宋王朝所认可，并深入到民间了。

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政治态度或取向决定了其作为实力较弱的小国的最佳政治选择，它上面尊奉中央王朝，与邻近政体尽力保持和睦相处关系，以保障政局的稳定安宁，这样在努力争取到的安定环境中整治水利、发展农桑、繁荣文化教育，使吴越国境内出现一派欣欣向荣、建设文明富裕生活的小康景象，在苏州以虎丘塔领军的一批古代建筑和以南园为首的一批古典园林也都建造起来了。民众的整体素质也得以提高，北宋时出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荣景象，正是这种持续发展的结果。至今长三角地区仍是国内最具活力的繁荣地区之一也正是这种状况的延续。包括苏州在内的吴越国地区，恰如虎丘塔上发现的丝绸及绣品一样，是一片大好的锦绣。



发现美越

虎丘塔文物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刺绣》，林锡旦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 3.《中国刺绣史》，孙佩兰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 4.《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 5.《中国文化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
- 6.《五代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 7.《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
- 8.《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 9.《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李最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虎丘环山河



【器陋功伟——虎丘塔发现的营造器具】

虎丘塔建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吴越国，五代是乱世，其主流是战乱，即战争频繁，社会动乱，造塔与这主流是不合拍的，所幸吴越国境内在钱氏政权“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基本国策下，经过数十年安定环境中的建设，形成了相对安宁、富裕、文明的社会，于是在吴越国主的倡导下，佛教崇信形成热潮，寺塔建造也方兴未艾。虎丘塔在此种背景建成，而其建成竟是由极其简陋的器具所砌筑起来的，这真令人惊奇叹止，而本文则主要介绍这些器具。

一、虎丘塔发现的营造工具及器材

虎丘塔虽然高大精巧，装饰精美，并存世至今已千余年，但其构建的元素却极其简单，基本上就是砖和泥两种，而砌筑即组合这基本元素成为高大建筑并存留至今的工具及器材也极其简单，只是泥刀和竹钉之类。

1957年6月16日，虎丘塔以加固塔体为中心的维修工程施工至第四层时，在发掘塔心室中央深达104厘米处，发现下面有一个十字形的空道，东西和南北向的道长约265厘米，中心部位边长即道宽为53厘米，高约58厘米，空道内堆满乱砖。经过清理，发现刮泥木刀三柄，木楔一只，泥刀上面都有泥痕，当是当年造塔遗留下的劳动工具，其中一柄是方头的，和现在使用的泥刀形式一样，长37.5厘米；一柄似箭头形，长34.3厘米；一柄狭



长形,头部尖锐,长49.5厘米。

另外在塔壁泥灰中发现大致长4.5厘米的竹钉,上粗下锐,在上端顶部缠有麻丝,“它的作用想是拉紧灰泥与砖墙面的粉刷面”。

另外在各层砖间泥浆中也发现置于其间的一端尖锐状的竹钉多枚,但并未缠有麻丝。

以上建塔的砌筑器具和钉入灰浆中的缠麻竹钉在1957年11期《文物参考资料》刊发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一文和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都作了介绍,并刊载了相关的黑白照片,可是时至2006年10月由苏州博物馆编著的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竟未见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介绍,真令人不解。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佛塔

中国佛塔是中国传统建筑与印度佛塔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仿生物,是一种新生的建筑形式,是珍藏佛教文物和进行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以木构架为主结构的土木工程。大致在西周初年出现瓦和战国时出现砖后,土木工程得以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砖瓦有比土优越的力学性能,可以就地取材,又易于加工制作。砖和瓦的出现使人们广泛地、大量地修建房屋和相关建筑工程等,其中也包括了佛塔。

佛塔是佛教的重要建筑。佛教约在两汉间传入中国,随之在东汉时已有佛塔出现,东汉末年在徐州,已出现笮融主持修建的佛塔。不过早期的佛塔都是方形的木塔,体量也不是太大,因为木材易燃易朽等弱点,大致到南北朝至隋唐时,以砖代木,兴起了修建砖塔的热潮。此时木塔和砖塔并存,但能保存至今的除个别外几乎全是砖塔。山西的佛宫寺释迦塔即俗称的应县木塔是一座木构佛塔,能保存至今是唯一一个例。砖塔主要是以条砖为建构材料,配合黄泥及其他材料而建造出来的。塔是高层建筑,一般有四五十米,个别高者达七八十米,对于这种高建筑,与其他土木工



程一样是需要经过勘察、设计和施工这样一些过程的。对于佛塔的建筑主持者,即使在古代,至少也要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不及今人这样精确计算,但粗略的相当于今日的勘察与设计也是有的。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佛塔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如1961年3月4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其中列入传统建筑,即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的共77处,加上仍属于传统建筑的革命纪念建筑物,如忠王府等则数量更多。总之,传统建筑数量约占总数一半以上,而佛塔有16处,约占传统建筑总数的20%左右。而在唐宋之际的古代,生产力还是比较低下的,对于虎丘塔这样巨大而精巧的工程,其用砖和用泥数量巨大,施工的匠师数量也不少,所使用的营造器具也有相当数量。但是我们今日能见到的只是虎丘塔及其中发现的泥刀和竹钉这样简陋的工程遗物,这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包含了古代建筑匠师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早期佛塔都保存和珍藏了佛祖和高僧的舍利、佛教经典及相关文物,苏州和杭州等地的一些佛塔内就发现了这些珍贵的佛教文物,虎丘塔亦如此。这是因砖构佛塔体量颇大,建筑空间较大,在砖构砌体中更能辟出窖室以珍藏舍利、佛经、佛像等佛教文物,这样传统的砖构或砖木混构的佛塔与佛教就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佛教文物。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定州开元寺塔,杭州的六和塔及苏州的虎丘塔也就成为大型的不可移动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三、营造工具和器材凸现了最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创造能力

虎丘塔是砖构佛塔,体量巨大,其平面由8个外墩与4个内墩构成,墩间有回廊、壶门和塔心室等,其底层面积约160平方米,从其塔墩底部情况分析,12个塔墩是分别砌筑的,因面积大、间距宽,故作业面大、作业点多,可以允许多个匠师同时作业;因为是砖构,主要是由泥工砌筑而成,因此施工匠师众多,且泥刀木质制造,简单而易制,故施工的工具也一定具有相当数量。但泥刀为泥工匠师施工必用,在以虎丘塔为先导的宋初造塔热潮中,建塔事务较多,如自虎丘塔建造竣工后,接着有楞伽寺塔(978)、罗汉院双塔(982)、灵岩山寺多宝塔(977年,后在南宋重建)、



瑞光寺塔(1004)、甲辰巷砖塔的先后建造。故这三柄泥刀是当时建塔匠师有意无意留在塔内的,只是当年无数营造器具中的代表,是幸运留存至今的修塔工程的见证实物。金、银、铜、铁及其他经加工的佛教文物,因其经济价值或文化艺术成就,向为历代收藏之物,而作为匠师劳动的见证实物即施工器具历来就少见有人收藏,故这批泥刀、竹钉的社会价值就很不一样。

虎丘塔至今残高达47.70米,体量达4657.6立方米,重量约6000吨,又是中国古塔由方形转八边形(或六边形)、由单筒体向双筒体、由塔内封闭向塔外开放式转变的典型实例,其创新意义重大。这样巨大而精巧的古代大型砖构工程,竟是由匠师手中这样简陋的泥刀操作而建构起来,至今历千余年而不倒,着实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奇迹,这期间蕴涵了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经验,大量的辛勤劳动以及无穷的智慧。伟大出于平凡,奇迹显示智慧。几柄泥刀等器具正显示出这样平凡的真理,也是这真理的现身和证据。

因为是由黄泥砌筑,而砌筑时是和水调成浆状操作,在未尽干硬时更易变形压缩,特别是墙体北面部位受倾斜压力较大处更易压缩形变。现在虎丘塔体底层仍可发现南面部分砖缝间的灰浆厚度在2厘米左右,而北面相应部分灰浆厚度只有1厘米左右,灰浆厚度不等的累积更易引起整个塔体和每层南北厚度的不等以及倾斜(向北)程度的加剧,更易增加塔的危险程度。在砖墩、砖缝、灰浆中发现的钱币、楔子和竹钉,除在外与粉饰层相连的部分竹钉是作加固联结装饰层外,其主要作用是增加北面砖墩灰浆中的受压能力,增加一定的抵御压缩能力,从整体上加固塔体,这同样凸现当时建塔匠师的智慧和实践能力。楔子、竹钉取材及加工极易,在泥浆灰缝中极易打入,器件虽小,意义重大,同样体现了平凡出真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明代有一本叫《五杂俎》的书,书中提到僧人巧治佛塔倾斜的故事,就是僧人利用竹木楔子打入砖缝泥层中,加固和增大砖缝间距,以达纠正倾斜的功效。那是神化了佛僧的作用,而实际上是许多无名的匠师们所创造而实践的作为,从而使平凡、简单的砖和泥,构成这座建筑史上的杰作,正如本文标题所示的那样——器陋功伟。



【乌金丰绩——虎丘塔发现的三件铁制文物】

铁是一种金属元素，化学符号为Fe，质硬而有延展性，在湿空气中容易生锈呈现黑色，工业上叫做黑色金属。铁在地壳中分布较集中，储量丰富，适于大量开采和冶炼，在工业金属中价格最廉，产量最多，制成钢和铸铁经过处理后，可适用多种用途。我国是冶铁和用铁较早的国家。1957年在以加固塔体为中心的维修工程中，虎丘塔内发现了众多的佛教文物，其中有三件文物是以金属铁为原材料制作的。

一、三件铁制的佛教文物的发现状况

1957年5月5日，施工至第三层塔心室之中间，发掘至70厘米深处，发现木板盖下有一个四方窟（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壁上都圻土红色，窟中放置文物一批，经过整理，发现在石函里面竖一铁函（函底板20.1厘米见方，下面函口19.1厘米见方，顶部10厘米见方，通高34.2厘米），罩和底板相连处，每面用两根铜丝扣住，罩上并放有绢袱一块，已残破，并泛作铁锈色，中间有一块外方内圆的制钱形组成件，是另外粘上去的。当石函开启时，在石函铁罩空隙间填着不少黄色粉末，作用不明。这是塔内发现的第一件铁制文物即铁函的状况。

把铁罩开启，即见有残绢袱五块，覆盖着金涂塔一座。（这是一座以金属铁为基本材料铸作且涂金的特殊形式的小型塔，称铁铸金涂塔。）



金涂塔塔座高4厘米，11厘米见方，塔身高7.8厘米，阔11.2厘米。塔顶相轮等已朽酥成小块，不可收拾。四周翘角除三只倾折外，一只尚完整，翘角高6.8厘米，自塔身塔座至翘角，均铸满佛像，极工细。塔身中空，在塔座中心凹一洞，内放一金铸小瓶（高2.9厘米，腹部周径7厘米），瓶口有盖，口中塞着纸圈，中盛一粒细如小米的“舍利子”，这是塔内发现的第二件铁制文物。虽上面表述文字没有提到是由铁制，但标题上写着“铁铸金涂塔”，可知是以铁作为主要制作材料的，只是在塔的表面，即铁的表面涂金，故称金涂塔了。



虎丘试剑石

金，故称金涂塔了。

在三层窟内还放置铁制莲瓣形佛龕一具，高17厘米，阔15厘米，龕内铸或坐、或立、或作舞状的佛像数十尊，但已锈蚀，光纹亦模糊。这是塔内发现的第三件铁制文物。

以上三件铁制文物于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刊发简报和1958年出版《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都刊登小型黑白照片，但清晰度不高，效果并不理想。

2006年10月，正值苏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之际，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书中对于这三件铁制文物都予以介绍，其表述文字是：

〔宋〕铁函 底板边长20.1厘米，下函口边长19.1厘米，函顶边长10厘米，通高34.2厘米。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平面方形，由底板、梯形函罩组成，下广上狭，顶部函罩和底板相连处，每面用两根铜丝拴住。罩上放有绢袱一块，已残破，并泛作铁锈色。函间有一块外方内圆的构件，是另外嵌进去的。铁函原置于五节石函内。

〔宋〕铁莲瓣形佛龕 宽11.5厘米，高17厘米。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铁质，模铸而成，龕呈内凹莲瓣形，顶部及底部铸须弥宝山纹样，龕内铸佛像一铺，姿态优美，人物众多。但因锈蚀，图案、形象均比较模糊。

铁铸金涂塔因另文介绍，一般不再论及。以上介绍文字中外文部分已略去，铁函和铁莲瓣形佛龕均配刊大型彩照一幅，图像较清晰，使人可捉摸到更相关的内容。

二、金属铁及其制作技艺

考古界将石器、铜器和铁器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三块里程碑，铁是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第三个大阶段的主要标志。“铁，农之本”是汉代人以“民以食为天”观念为基础对铁的认识，钢铁产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成为一个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志则是近现代人对铁的认识。

在金属铁的使用过程中，以中国的发展速度最快，这个与西方的显著差别是由古代创造的冶金技术的先进与否造成的。中国的铁器制造基本是以铸造为主，中国的商周时期已能铸造大型而复杂的青铜器如司母戊方鼎、四羊方尊、莲鹤方壶及铜尊盘、铜禁、曾侯乙大型铜编钟群等。青铜器“液态冶炼、液态铸造成型”快速制器技术的娴熟性和科学性很快被用于制造铁器，这使铁器制造得到了长足而快速的发展。通过对战国燕下都、赵邯郸、魏新都等及汉代河南郡、南阳郡等作坊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可知当时冶铸技术的先进，铁器数量的众多和铁质的优良。

中国铁器最早出现的除陨铁外，是由块炼铁法而获得的。但当时是在较低温度（约 $800^{\circ}\text{C}\sim 1000^{\circ}\text{C}$ ）下固态还原铁矿石而取得。此铁质地多孔疏松，还需锻造方可使用，此时当在公元前7世纪甚至更早。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发明了古代冶金独创性的生铁冶炼技术，即在较高冶炼温度（ $1100^{\circ}\text{C}\sim 1200^{\circ}\text{C}$ ）下，使铁矿石液态还原而炼得的铁，这种铁含碳量高（ $2\%\sim 4\%$ ），熔点低，质地硬，适于铸造成型，因此又称铸铁。战国中晚期，因铸铁柔化技术的应用，生铁得以大量而广泛应用于军事和农业生



产,至汉代已能生产性能更为优异的灰口铁,使铁质量具有一定的韧性和较好的耐磨性、吸震性。至东汉,炼铁竖炉的容积和炉缸面积大幅增加,炉体结构和鼓风技术相应提高,使产量大增以满足社会需求。唐宋时期采用木扇鼓风,使冶炼技术更加发展,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和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都有这种木扇鼓风的形象显示。江苏六合和徐州都是早期冶铁的重要地区。

随着铁及钢的产量增加,其铸造技术和工艺也不断改进,使用包括石范、泥范、钢范、铁范及其组合和失蜡法的铸造方法不断改进和提高,使铁制品的形制和种类都更加广泛和增多。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有铁范和铁芯共36件,品种有铲、锄、镰、斧、凿、犁、铧、雨、钁、锤、铤、板材等多种。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在河北沧州古城处铸造了一座巨型的铁狮子,这座铁狮高5.4米,长6.5米,高约3.0米,重约5吨。铁狮头南尾北,昂首怒目,巨吻大张,四肢叉开,作奔走之状,背负巨大仰莲圆盆,腹腔内铸有《金刚经》,形态生动。据县志记载,此铁狮极可能为文殊菩萨的底座,此是我国早期的最大铸铁件,其分别由600余块铁范铸造而成,至今昂立原处,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第134号),由此可知唐五代时铁的铸造技术和产量。

金银铜铁的序位排列是说这些金属的性能和社会拥有量的多少,铁的产量和社会拥有量虽然占着优势,但它易于锈蚀、变质使其对前三位金属的取代就相当局限。如铁也铸造钱币,但只在短期和局部地域流通,最终未能取代铜铸钱的作用。同样,虎丘塔内虽然发现铁铸品有三件,也是代替铜或其他贵金属的,但作用有限,且锈蚀较甚,留给后人的形象较之铜或金银等贵金属,就逊色多了。故在比虎丘塔晚数十年建造的瑞光塔中就没有发现以铁制作的佛教文物了。这是经济发展后的正常现象。

三、三件铁铸文物及其意义

关于铁铸金涂塔,因其表面已作金涂的技术加工,使其表面金属的佛教本生故事至今尚能保存,以供后人作佛教意义的解读。这金涂技术应





虎丘塔文物

虎丘塔文物

用于铁的表面，当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加工工艺，显示了唐五代时的金属加工技艺水平，其塑造佛教形象的人文意义已在金涂塔一文中介绍，这里不复多述。

盛置铁铸金涂塔的铁函的制作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技艺，从现存状况及尺度可知大致高为33厘米的铁罩是中空的，这样才能内部置放金涂塔和其他物件。铁罩的原初厚度大致在1至2厘米间，这种高而空的罩在古代是极难一次铸造的，故从铁罩表面可以发现大致距底部约20厘米处有一条水平的铸接缝，说明是二次铸造，拼接而完成的，是否属于金属的焊接技术，尚待考证。即使现代制造技术有着许多的改进和设施，要制作这样一种深内凹金属构件也不是一件易事。现代德国和瑞士生产的精密测量仪器经纬仪就放置在类似这样的铁合金制函内，只是下部与底板连接处使用扣合装置而不用铜线。近年国产精密测量仪器也使用这类合金铁函。笔者多年在野外测量，使用过此类国产和进口的仪器。虎丘塔变形测量从1979年开始至今仍在延续，使用的也是瑞士产的精密仪器经纬仪，其装置仪器的铁函已改为顶部为半球形的圆筒体，其原理也仍然是同样的。这至少说明了唐五代时铁制器物制作技术的精湛和匠师们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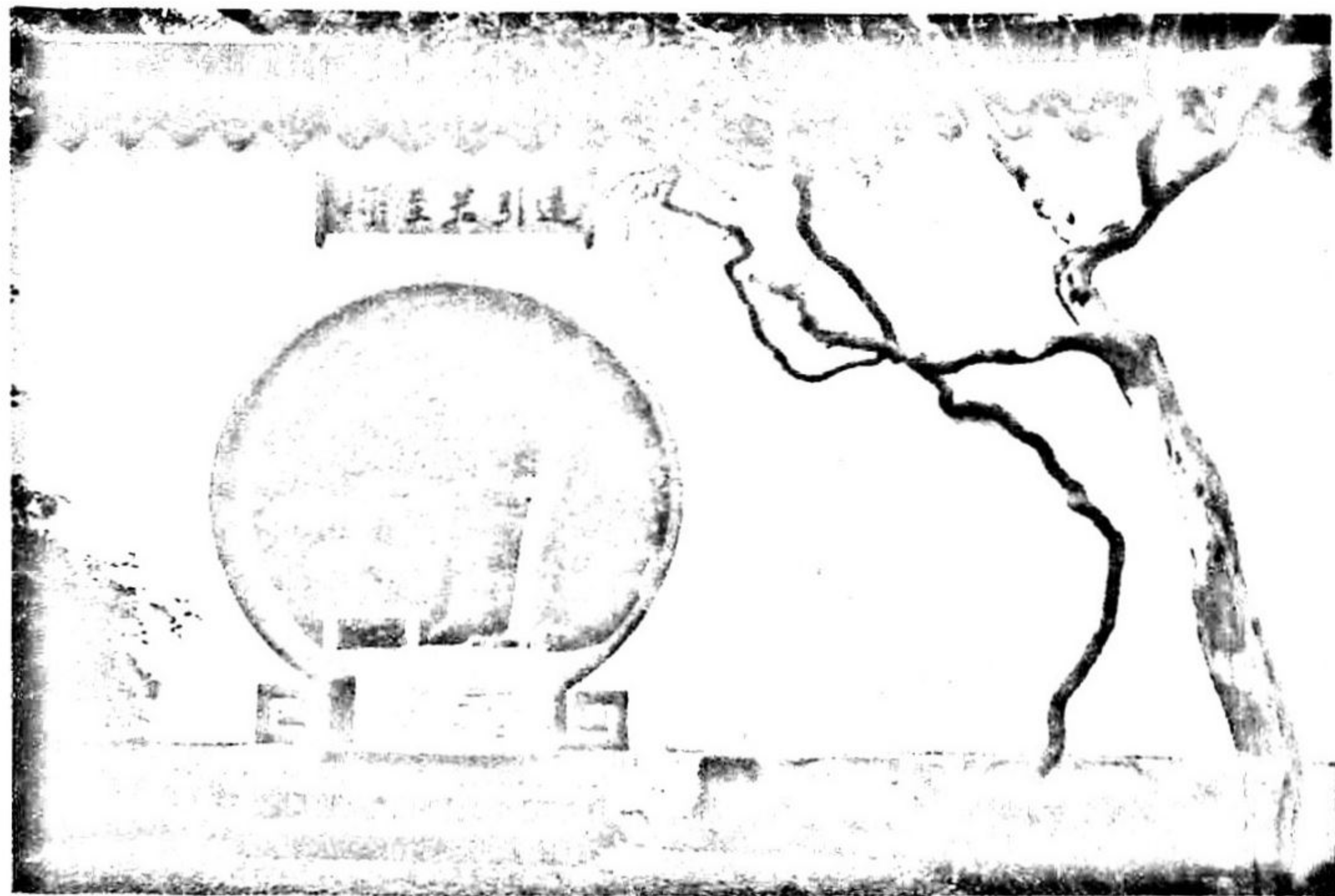
铁制莲瓣形佛龕虽只宽11.5厘米，高17厘米，但在这极有限的幅面内，上下两部分却塑造了形态生动、峰峦明显的佛教须弥山场景，为中部的佛教群像铺设了一个海中仙山的环境，制造了一种庄严神秘的氛围。中部大致只有9厘米×9厘米的狭小空间中，却塑造了一铺以佛祖为中心的群佛组像，像面中央是佛祖作“右臂偏袒式”，右肩及右胸袒露，头部螺髻上凸，双耳长垂，宽衣自左肩下披，双脚作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身后有双围背光及头光，头光上方有金色尖状光焰直至天空上祥云处，双手作上下说法印，佛祖两侧侍立胁侍菩萨多尊，似在听从佛祖说法。幅面虽小，但形象众多，组成一幅主从得体、和谐庄严的说法群像场景。虽由铁质铸造，但同样显示佛国庄严肃穆、专注说法传法的佛教具象，也是一件精致工巧的佛教精品。连同其余两件铁制佛教文物一起，显示了五代至宋初吴地民众的崇佛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五代吴越国政治、经济、科技



和文化艺术方面的状况和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 4.《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 5.《冶金考古》，李京华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 6.《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路甬祥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 7.《中国名胜词典》，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虎丘冷香阁后园



【神工木巧——虎丘塔发现的檀龕宝相】

木料取于树木，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种宝贵资源。木料定形且易加工，是人类最早广泛使用的材料。原始社会中人类广泛使用木材为生产、生活和居住的材料，有的木材因质地和性能上的特殊而用作特别的用途，如木雕器件等。1957年，虎丘云岩寺塔在以加固塔体为中心的维修工程中发现了一批珍藏的佛教文物，其中一件由檀香木雕制的檀龕宝相极为工巧，其构思和制作的巧妙，令人惊叹。

一、檀龕宝相的发现

1957年5月5日，在虎丘塔维修工程施工至第三层时，在塔心室中央地下70厘米深处发现一个四方窖室（65厘米见方，深73厘米），其中除主要放置石函、铁函、金涂塔、佛舍利、铜佛像、铜镜、铁佛龕等佛教文物外，还放置了一件颇为别致而精巧的檀龕宝相。当时是这样介绍的：

檀香雕三连佛龕一具（檀木宝相）。龕下是一莲花座，莲座上有三块合成的圆龕，中间一块雕观音立在一支莲花上，在右边窜出的一瓣莲花上有善财童子作合十膜拜。此龕部分已裂缩，莲座高19.3厘米，阔6.3厘米。其余左右两块，高16厘米，阔4厘米，每龕上下各雕佛像一个。此件作品，全属立体雕刻并部分描金，眉目衣褶，极为工细。（《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



当时配刊黑白照片两幅，分别是“闭合的檀木宝相”和“开启的檀木宝相”，形象地说明了闭启时木龕宝相形貌。

200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又一次出版了介绍虎丘塔发现文物的《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此书对此件文物的介绍是：

(晚唐~五代)檀香木雕三连式佛龕(檀龕宝相)

宽6.3厘米 通高19.3厘米

1956年(笔者按：当为1957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檀香木质，枯朽较甚，原涂色彩已褪，残留描金痕迹。下为束腰须弥式莲花座，上承三连式佛龕，分为主龕和扉龕，半圆形的主龕与莲座通体相连，三角形的扉龕与主龕边缘上下各钻有小孔，穿绳系结，玲珑剔透，可启可合。

佛龕幅面不大，均作深镂圆雕，主龕“本尊”是立相观音，神态端正，足踏藕生莲花，藕之左右为荷叶、莲蓬，蓬上蹲善财童子，双手合十膜拜。两侧扉龕，各雕胁侍、“飞天”。所雕人物表情各异，姿态面容无一类同，栩然生趣。

唐代佛教兴盛，檀龕宝相玲珑纤巧，便于佛徒携带宣教，便于信士案头供奉，风靡一时，云岩寺塔发现的这尊檀龕宝相，既无纪年又无作者题名，按其建塔时为五代后周显德六年至北宋建隆二年(959~961)，而从这尊檀龕宝相雕作的宝冠造型和风格等方面揣测其年代应不晚于五代，上溯可至唐代。檀龕宝相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

这次书中配置彩色照片一幅，尺寸较大，约15厘米×15厘米，图像清晰可辨，为读者和业内人员探索提供了较好资料。

二、木材的利用和木雕器的发展

人类产生于为其铺垫的生物环境中，没有植物和其他动物的与之共生，人类不可能产生，产生了也不可能生存，这是人类史上最基本的事实。树木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食粮，并为



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器材。人类早期的巢居生存方式就离不开树木，由于树木易于加工成为木材，从而成为人类早期生活的基本器材。考古界曾有人提出在石器时代之前曾有过一个木器时代，但木器不能长久保存，至今没有这一所谓时期的实物。没有实物证据，这木器时代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推测而难以成立。

在江南地区至今发现最早有制作木器及木构建筑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河姆渡发现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遗迹。在其第二层出土一件瓜楞状敛口圈足木碗，碗表涂有薄层的朱红色生漆，这是中国至今最早的木制漆器，木材的易于变形和腐朽，使之产生初期即与防湿保护的漆发生联系，造就了木器中漆器的长足发展。此后的商周时期直至现代出现了大量的漆器，而未作油漆保护的木器制品就极少，保存至今者更是凤毛麟角。关于木雕，特别是木雕的人物形象的出现已是相当于战国时期的事了，以木雕的俑替代陶制的俑最早出现于战国楚墓中，至两汉时墓葬中流行木俑和木模型等，主要有俑、动物及车船模型的立体雕和木棺板上的浮雕两类。西汉早期的木俑雕刻已经相当细致传神，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的木俑，其北边厢出土的5件坐姿乐俑，或吹竽或鼓瑟，高30厘米左右，不仅雕刻细微生动，还施墨涂彩，使面容秀美，颇具风姿。西汉晚期江南地区随葬木俑也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有所变化，如扬州胡场出土的西汉晚期坐姿说唱俑技法已属于立体圆雕，姿态极为传神。南北朝以后，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而深入发展，传统的木雕艺术也用到佛教造像方面来，各地佛教寺院均有木制佛像等。隋唐盛世，佛教发展更是这样，寺塔和佛像增加迅猛，但大型木雕造像等因干裂、变形较甚，多在木质表面夹纆，即加织物固定然后涂保护膜层而制成，已并非木材的裸雕作品了。但木材易朽易焚，特别经过佛教法难，至今唐代以前者在境内几乎没有发现，留存的基本是非木的金属制品和泥、石造像，虎丘塔内发现的这件檀龕宝相历经千余年而能保存至今，实属大浪淘沙后的仅存硕果，十分罕见和难得。故上述介绍中说“檀龕宝相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发现之美

虎丘塔文物

三、檀龕宝相的探索及意义

木材以雕刻技艺制作佛像，其特点是木材易得，雕刻加工相对于金石材料更容易一些，其弱处是木材极易受温度、湿度变化而产生变形，更致命的是易于虫蛀朽败及毁于一炬。虎丘塔内的檀龕宝相以檀香木制作。檀香木又名“旃檀”、“白檀”，檀香科，属常绿小乔木，原产地印度、澳大利亚、非洲等地，我国台湾亦有栽培，木材具有浓郁香味，可刨片入药，为芳香、健胃剂，亦可制作器具、扇骨等，因其香气，不为虫蛀是其特性。五代吴地崇佛者便以此木材雕此檀龕宝相，其能历千年而留存至今也正是这一特性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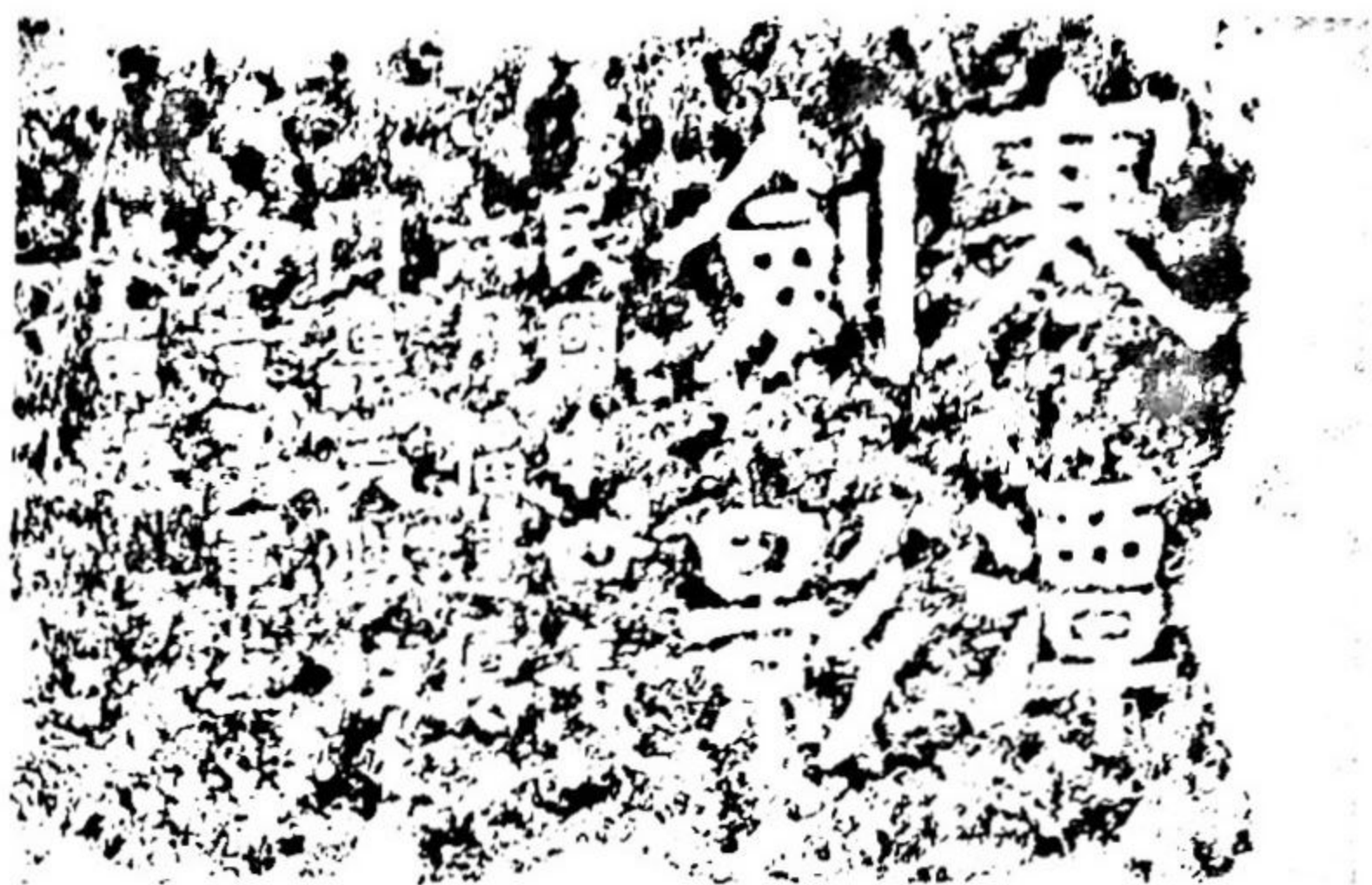
此檀龕宝相制作和构思十分巧妙，宝相下半部束腰须弥式莲座与上部半圆体主龕是由一块整木通雕而成，至今已千余年仍连在一起，没有分开，足见其坚固程度。而主龕两侧的扉龕均为四分之一的圆周面体，与主龕恰好合成一个呈圆柱体的整体，其主龕与扉龕结合处两侧各以上下两个小孔穿绳系结加以连结，使宝相展开时是一个三片式以两侧扉龕的胁侍、飞天烘托主龕观音的一组佛教供养图像，造成极逼真的礼佛场景。而闭合时整个宝相恰是一个圆柱形的极简便易携带的小物件，恰如上面所述介绍词所说：“玲珑纤巧，便于佛徒携带宣教，便于信士案头供奉，风靡一时。”这是唐至五代，佛教深入民间的一个例证。宝相上部，无论主龕和扉龕俱作深度浮雕，个别部分类似于透雕，如飞天、童子等，立体感极强。因为雕镂过透使留作后壁的木质过于纤薄，现今童子下部的后壁已经朽败消失而变为通透了。这是因过于精工细作而造成的，在主龕和扉龕上部均雕作绸幔帐围，似有佛寺殿堂的景象，宝相虽小仍有礼佛气氛，这是极精巧的构思和技艺所造就的现实场景，至今在开启宝相展示场景时还能体悟到这种高超艺术所达到的佛国境界。

宝相所雕扉龕上下的胁侍、飞天俱为追侍本尊观音的侍神，与本尊的观音组成一堂主从分明、位序明确的组像，而无论观音、飞天和胁侍都头顶戴冠，身着宽衣大带，无佛教初期传入时的衣饰特征，而是汉化较久的特征；加之观音造像又无明显女身特征，介绍词中定位于晚唐至五代是





比较合适的。细观檀龕造像表面，其绘彩的红、白等色及个别描金痕迹都历历在目，是留存木雕中极罕见的。这是由民间制作的极珍贵的一件木雕工艺品。



虎丘摩崖石刻“寒潭劍影”拓片(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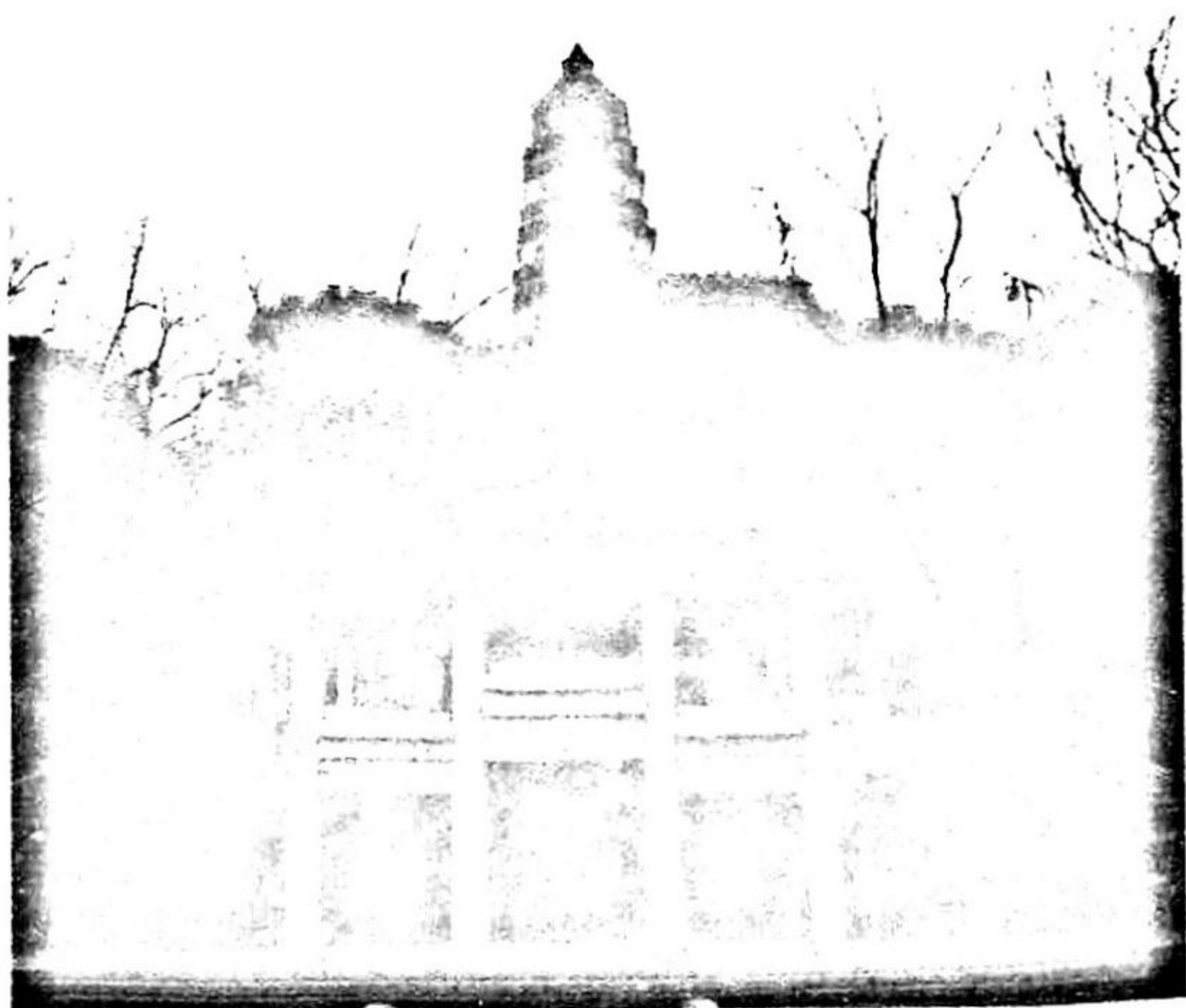
木雕佛像因取材和加工较易，故在隋唐之初已经风行一时，雕铸造像成为专门行业，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还为此专门发了一次敕文《断卖佛像敕文》，文曰：“敕旨：佛道形像，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铸造。供奉之人，竞来买赎。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惟在价高。罪累殊深，福根俱尽。违犯经教，并宜禁约。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象卖鬻……”（见《广弘明集》卷35）可见当时制造较多，致遭禁约。初唐文豪卢照邻写过一篇《乐相夫人韦氏造檀龕宝相赞》文，可见初唐时已有此类檀龕宝相了，唐代日僧空海和圆仁在他们带回的佛教文物目录中都有关于檀龕宝相的记载，可见小型供佛的檀龕宝相当时确有相当数量，但随着会昌法难和显德法难的发生和木材的朽败，这类檀龕宝相至今也凤毛麟角了。虎丘塔内发现的檀龕宝相即使不是硕果仅存，也是极其珍贵的了。

从虎丘塔发现的众多文物中，除本檀龕宝相外，观音造像还有十一面铜立像二尊，总起来说观音菩萨是属于天台宗（法华寺）所崇尚的偶像，檀龕宝相的发现显现了唐五代吴地民众的崇佛热潮，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道出了吴地民间匠师善于创造的智慧 and 辛劳，当然也折射了唐五代时，吴地即吴越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水平和成就。



主要参考文献:

- 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苏州市文管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 2.《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
- 3.《国宝大观》，梁白泉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
- 4.《苏州民间手工艺艺术》，张澄国、胡韵荪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1月
-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 6.《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
- 7.《佛学大辞典》，丁福宝编纂，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1版
- 8.《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
- 9.《“檀龕宝相”——苏州虎丘塔中发现的文物》，顾公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



虎丘塔和小武当





【锦包竹帘——一件早期文书保护的包装物品】

中国的书籍是在文字产生并普及以后，作为人们交流和沟通的一种书面工具。最初的书籍是简牍，是用竹木书写刻契然后装订到一起。以后有帛书，都做卷状保存，外面有的以缣帛包装。纸张发明并普及后，以墨笔书写，以卷轴形式保存，外面包裹丝绸。印刷术发明后，卷轴形式的书函逐渐演变成册页形式的书，本文介绍的锦包竹帘即卷轴形式书的一种包装物品。

1957年3月30日在虎丘塔二层窖室内发现了一个由石函保护的经箱，经箱内主要保存了包有丝质经袱的一套七卷金字纸本《妙法莲华经》和一卷纸本供养人题名。经箱由楠木制作，外有鍍金银片镶边，体积不大，长37.8厘米，阔19.2厘米，高21厘米，扣除底座和楠木板厚度，其中的空间容积更是狭小，故在放置上述8卷纸本卷子外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但其中还是放置了一些小件的器物。据《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以下称《简报》）和《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以下称《出土文物》）两文介绍，有绣花经帙4块，刻字牙牌1块，串有珍珠、木珠、菩提珠、玛瑙珠的银丝珠串一圈以及本文主要介绍的锦包竹帘。

锦包竹帘是将细长的竹丝编织于丝绸之中，形成的一种装有竹筋作骨架的软性包裹器物。作为上述卷子的包裹物，它比经袱和经帙这样的单纯丝织物又有一定的硬性和间隔性，由于作用的不够明确，它的出现和



介绍的经历极易为人所忽视：第一次介绍是1957年11月的《简报》，只有极其简单的12个字：“经箱内有残花锦包竹帘一块。”并配发编号为“图十”的一幅黑白照片。第二次介绍是1958年7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文字稍详一些：经箱内用锦包竹帘一块，约长47厘米，阔23厘米。有照片，即图二四，说明是经帙，并没有说是锦包竹帘。到2006年10月第三次介绍虎丘塔文物时，即《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一书中，这件锦包竹帘没有了，似乎消失了，可见的确是一件易为人们忽视和忘却的器物。1957年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写的《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一文中还是提及此件文物的：“……请来博物馆筹备处考古人员及苏州名裱工，他们轻轻地将盒中上部等取出，下面有经卷共八卷，每卷有的用几层绢布包裹，有的用锦绸中夹有极细竹帘，想为包裹经卷用的，可惜已被工人拿出时扰乱。经中有一卷系白棉纸墨书……此卷可能即用竹帘包裹的。”

其实这件锦包竹帘在中国文字载体，及文书包装历史上还是有其一席地位的，当然这又得从中国文书的历史说起了。

中国最初的文字是刻画在岩壁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象形文字，以后是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和铭铸在铜器上的金文。虽然这些文字传播的范围较小，未能形成真正的文书，但已经使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我们称没有文字的社会为史前社会和史前文化，尽管其长达数百万年。

产生及使用文字，即文明社会大约只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最初的文字载体且能成为文书的是帛书和简书，是将文字写或刻在绢帛和竹简、木牍上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这里说到文字产生后，记事日繁，“著于竹帛谓之书”。但绢帛得之不易，价格昂贵，竹木简牍又太沉重，携带不便，文化要普及和深入就极其困难。待汉时发明了纸张，原料易得，轻便价廉，使用纸张书写，使文字成为文书，其沟通交流、传递文明就不再是难事了，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印刷术发明和普及前，以纸张书写的文书是社会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但这是在纸张普及之时的魏晋期间及以后。《抱朴子》曰：“家贫之纸，所写皆反复有字。”这是竹帛衰废而纸张大行的反映。直至唐代，虽然雕版印刷已问世一段时间，但仍是个别现象，或仅在上层施行，对于民众似乎关系不大。所以始于唐代末期，完成于北宋的虎丘塔内发现文物上的文字题记或经文都是以墨书或金字形式书写而存留下来的。当时作为纸张书写的文书，是以卷轴形式保存的，如金字《妙法莲华经》就分为七卷，每卷以木轴为中心卷装保存，其每卷外面包以经袱或经帙，而其中的供养人题名一卷的包装很可能就是这锦包竹帘，这种包装的真实情况由于当时施工中由建设部门执行，未能谨慎执行文物保护要求而遭受破坏，王冶秋同志根据其经验和实际情况也只判断说：“经中有一卷系白棉纸墨书（按：即供养人题名卷）……此卷可能即用竹帘包裹的。”



虎丘摩崖石刻“高山流水”拓片（清光绪）

这竹帘两次介绍的文字有“帘”和“簾”之别，但这只是同字的异体，其意义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用布、竹子或苇子等做的遮蔽门窗的器物”，当然锦包竹帘所遮蔽的是佛教经卷和供养人题名卷而不是门窗。由于纸张和绢帛的不易保存，我国书写文书存留至今的文物极其稀少，因而虎丘塔内发现的映示民众崇佛热潮的书写文书，即金字《妙法莲华经》卷和墨书供养人题名卷显得特别珍贵和意义深远，而包装这些卷子的锦包竹帘在文书的包装历史中也是至今发现的仅见器物。

五代至北宋是中国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稍后一段时期，雕版印刷普及，以及活字印刷也在11世纪中期由平民毕昇发明后问世，使书籍产量大增，使官府印刷物、佛教宣传品和读书人所需的书籍大量出现。雕版印刷出现后，图书的形式已完成了从卷轴向册页的过渡，宋版书的形式以



一叶为一版，集订成册为“蝴蝶装”，以后又改进为“包背装”和“线装”，线装书成套者外面另加函套。这也就是集散页装订成册的册叶制度。这与虎丘塔内发现的唐五代卷轴文书制度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也就是卷轴文书制度只存在于隋唐五代及稍前的一段时期，其存留的实物更是稀罕少见，这包装保护卷轴文书的锦包竹帘，相当于后来的函套，只昙花一现地出现在虎丘塔的窖室经箱内，因其罕见及在文书包装上的意义，其文物与历史价值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白莲池和点头石





【精彩纷呈——虎丘塔的彩绘和壁画】

壁画艺术始于岩画，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1万年至2万年之间。相传黄帝时，壁画艺术已渐成风貌，在当时建筑内用壁画装饰已成风气，成为“成教化，助人伦”的重要表现形式。据文献可知孔子、屈原都见到装饰在建筑内的壁画。汉唐是中国最为兴盛的时代，彩绘和壁画达到高峰。当然，现在只在汉唐墓葬中见到部分存留的彩绘和壁画，虎丘塔内保存的彩绘和壁画正是汉唐壁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除了虎丘塔内发现的人藏文物外，虎丘塔本身也是一件不可移动的大文物，它是一座七级八面双筒结构的楼阁式砖构佛塔，至今塔高47.70米，塔的底层对边南北达13.81米，东西达13.64米。因其历史悠久、造型独特、装饰精美、形状恢弘、结构巧妙、内涵丰富，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公布的名称是“苏州云岩寺塔”。总编号为68号，分类编号为21号，即属于“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一类的建构。

一件文物的价值在于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虎丘云岩寺塔的历史价值是它本身及塔内文物综合反映了建塔时期即唐末至宋初这段时间内五代吴越国管辖苏州的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化等内容。科学价值是塔的建构和塔内文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准，诸如建筑材料、冶金、金属加工、丝绸纺织、工艺美术等制作方面所达到的水准，是中国科技史上重要的遗产，而艺术价值更多是体现在塔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的整体造型艺术和塔内外的装饰方面。

塔的造型艺术。由于自宋初以来，历代的战事和人为造成的火灾，已使其塔外的腰檐、平座和刹部多遭毁损，外观已非当年初建时的状态，对于目前存在的类似拔地而起的春笋似的容貌当另作审美方面的评价，本文着重介绍塔身内外的装饰。

虎丘塔的装饰分布于塔的内外表层上，除了梯洞和方砖铺地以外，各层内外均作彩色装饰，具体就是仿木结构的梁、枋、柱、斗拱上的彩绘和各层内外壶门上方的壁画。这些装饰由于人为和自然风化的原因，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重建的第七层塔上已无装饰内容，其余六层在最外表的壁面处也只残存少量的彩绘和壁画，多数表面已暴露出裸露的砖砌体及砌筑在其间的个别木构件。绝大多数彩绘和壁画保存在塔身内部的壁面上，而壁画则特别集中保存在壁面上部的位置，即各壶门甬道上方的藻井、廊道的上部、各层塔心室的穹顶部位处。具体是在显示仿木构件的柱、梁、枋、斗拱、门、窗（外层的直棂窗）均施以彩绘，彩色以红色为主，间以白色，个别处也饰为黑色，以显示雄浑、热烈、大气的风格，这是继承唐代的用色即装饰风格。所示的斗拱、柱、梁、枋，二层装饰性的门户用色均以偏暗的红色为主色调，如以一层内的彩绘用色，特别是梁、枋的七朱八白用色和形制则与陕西唐代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墓的柱梁用色几乎一致，虎丘塔上的彩绘面积约有三千余平方米，现在除外表损毁外，内壁有保存彩绘约近千平方米。

壁画指保存在各层壶门上方的藻井和内回廊两侧壁面上部及残存在塔体外壁平座下部的较大幅面的浮雕塑画，其题材主要是牡丹和太湖石两种，共有牡丹画165幅和湖石画5幅，其中最突出者有五层大幅浮塑六角形围栏太湖石五幅和牡丹花丛一幅，二层、三层上的大幅全株牡丹和立轴形式的浮塑牡丹图像以及残存于二层的二扇格扇门，这些都是保留至今较早的同类装饰图像样式。这些浮塑壁画是以石灰拌以传统国画颜料塑制制成，并以竹钉、麻丝加固于砖砌体上，这样历经千余年至今还大部分保存在壁画面且保持较好的色泽，如花瓣上有朱砂、朱磬、橙黄等色，枝条上有黄、赭等色，叶子上有绿或浅绿色，加之立体浮塑，真有栩栩如



生之感觉。

据张明川、宁方勇两位先生考察（见《苏州云岩寺塔彩绘浮塑图像的考察》，《文物》期刊2009年7期）虎丘塔上的这些浮塑壁画，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言：“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故观者往往不甚采鉴。”即是图像置于画面正中，画风并不写实而是有装饰的殿堂装饰画，特别是浮塑立轴牡丹图像更具有从装饰画风向写实画风转型的时代特色。这些浮塑壁画的粉本当取自唐代中后期的长安、洛阳京城之中，在虎丘山寺塔竣工前的装饰时制作于塔壁之上，时间大约在北宋初期宋太祖在位（960~976）十几年中，而其时的苏州仍在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的有效管理期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弘俶顺应历史潮流，纳土归宋，苏州方与吴越国一起并入北宋版图，而此时虎丘塔内装饰的彩绘和浮塑壁画已竣工多年。

主要参考文献：

- 1.《中国壁画史》，楚启恩著，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虎丘摩崖石刻“铁华岩”拓片



【众志成城——虎丘塔砖及其文化意义】

砖瓦都是以土制造并入窑烧成，但砖的出现晚于瓦，约在战国时代，古时称为甃。条砖最初发现于秦始皇陵，但整齐划一的条砖较普遍使用已是汉宣帝（前73～前49）以后的事，江南地区广泛使用条砖已是东吴和东晋时期，至隋唐五代时条砖制作已经相当成熟，虎丘塔及其后的一些古塔都以条砖为主要建造材料。虎丘云岩寺塔因是砖构，其主要构筑材料为砖是没有疑义的，因为优良的结构及砌筑方式，使体积较小的砖组成体量极巨大的塔，极具生机地矗立在虎丘山巅达千年之久。对于砖材来说，众志成城形成一股合力才是古塔的生命所在。

一、虎丘塔砖概况

尽管虎丘塔的建造年代至今还有争议，但其历史在千年以上却是没有疑义的。一座超越千年历史的古塔至今挺立在虎丘山上（其实只是一座30多米高的小丘），是靠什么支撑的呢？或者说塔的结构元素，即建筑材料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虎丘塔是由砖和黄泥砌筑而成的。它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砖和黄泥。当然，虎丘塔也不是有的人所说的寸木不用，除了曾有的木栏杆、木构腰檐以外，还在各层内外斗拱的华拱出挑处和壶门的上方，都用了支持上部砖层的木材，这是建筑结构上的需要。由于古塔的残损，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这类木材浅露在外，如果走近塔身，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来。另外在塔的各层平座转角处，还有相当数量的石制栏杆插板。当然，这些木、石材料与砖材相比，在数量比例和塔的总体构成上是相当次要的，其主流的构筑元素仍然是砖，因此，从总体上说，虎丘塔是一座砖塔，或说是砖结构的一座古塔。

虎丘塔所用的砖材，大致有三种，即唐代条砖、唐代方砖和明代条砖。其中唐代条砖最为主要，数量最多，其文化内容也最丰富。由于中国古代制砖系手工制作，而虎丘塔用砖数量极大，其砖材也并非一地一窑一时所能供给的。故唐代条砖其尺寸也只大致相近，并不完全一致。其平均尺寸为长32.0厘米，宽16.0厘米，厚4.5厘米。单砖体积约为2304.0立方厘米。唐代方砖只分布在各层层面之上，作铺地之用。经1957年加固维修工程改筑楼面后，其除底层保持方砖地坪和少量遭施工破坏外，多数已隐入新筑混凝土层面之下了。唐代方砖尺寸为边长34.0厘米，厚4.0厘米，单砖体积约为4624.0立方厘米。明代条砖是由明代崇祯年间补修残损的七层及塔顶部分所添加上去的，其分布主要当然是在这个位置。明代条砖体量稍大，其平均规格为长39.0厘米，宽19.5厘米，厚9.0厘米，单砖体积为6844.5立方厘米，大致是唐代条砖体积的三倍，其反映了明代制砖技术的成熟和高超。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维修加固工程中，在底层数个补砖的塔墩中也换以现代条砖，但相对地说，数量极其微小。1957年的第一次维修工程中也补入少量现代红砖。

虎丘塔上至今尚有多少砖块呢？现存虎丘塔高47.70米，其底层对边南北为13.81米，东西为13.64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计算，体积为4657.6立方米（见傅高杰先生所绘虎丘塔图纸及相关数据），两者计算可得现有砖块数量当为 1.3715×10^6 块，若扣除砖砌体中的木材、方砖，则知今存虎丘塔上大致有条砖130万块左右（ 1.3×10^6 ）。（以上计标是以黄泥为黏结剂，条砖的上下、左右和前后都附有黄泥黏结剂，今以干结的黄泥平均厚度为1.5厘米来计算的。）

对于数量众多的条砖称其为唐代条砖，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以加固地基、基础为中心的第二次加固维修工程中，苏州市修塔办公室曾委



托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对虎丘塔砖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当时由王维达、夏君定两位专业研究人员亲临虎丘塔现场选取底层塔墩砖样标本和测定参数，然后经科学仪器测定出来条砖的烧制年代。当时在不同部位选取的三块条砖标本测定的烧制年代为：

SB82号为 1062 ± 70 年

SB83号为 1115 ± 50 年

SB84号为 1334 ± 66 年

报告所示测定时间为1985年3月。折算后当为：

SB82号为公元 923 ± 70 年

SB83号为公元 870 ± 50 年

SB84号为公元 651 ± 66 年

则这些测定的条砖烧制年代分别为唐高宗的永徽年间（650~655）、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和五代后梁龙德年（921~923）至后唐庄宗同光年（923~926）之间，而五代时苏州早已归入吴越国的版图。即在开创吴越国的钱镠在位（902~931）年间。从总体说，这些条砖的烧制时间是从初唐、经晚唐延续到五代前期，大致是在唐代和临近唐代的这段时间里，故从总体上称其为唐代条砖是适宜的。而下面的砖文分析也将证明这一点。

砖是由泥经特殊方式烧制而成的，砖比较泥是其性能的重大变革和提升。在砖发明之前，人类的居住建筑除天然洞穴外，主要是由木和土两种材料构成，在中国早期文明以来，除特殊地区或特殊情况外，人居建筑主要是由木材这种材料构成的，并与土一起构成木结构的体系。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也是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称为土木工程。但从砖瓦这种用于建筑方面的陶制材料发明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砖瓦作为一种重要建筑材料取代土而加入到建筑物中来了。从考古材料看，瓦发明在前，大致中国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就制造出瓦，故与砖瓦一类相关的文字原先都是用瓦字作偏旁的。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墓室中出现了砖，砖和瓦有比土优越的力学性能，可以就地取材，而又易于加工制作。砖和瓦的出现，使民众能广泛而大量地用于房屋修建等方面。在佛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教传入中国后,大致从南北朝开始,砖瓦就运用在佛塔的建造方面。至今保存的最早的佛塔就是砖构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其建造年代为北魏正光元年(520),至今已有近1500年的时间了,塔高有37米。而虎丘塔虽迟于嵩岳寺塔数百年,但仍属化腐朽为神奇的砖构佛塔,主要是砖材有着足够的耐压性。虎丘塔的条砖的压力测定数为 $170\text{kg}/\text{cm}^2$,即 17mPa 。以当今建筑规范标准衡量,这也是相当优良的建筑材料。按今砖材使用要求,大于 15mPa 的砖材必须特制才能达到耐压指标。虎丘塔历经千年之久还能挺立于山巅,这正是砖材的这种优越抗压性能所支持着的。

更何况,聪明智慧的中国古代匠师,在由砖材构筑的建筑物中,采用叠涩、拱券以及平、顺、丁、斜不同错列等优良的砌筑方式和双筒体的优良结构,使得虽主要由砖、泥构建的高层佛塔也一样能历久不倒,千年挺立。包括虎丘塔在内的中国众多的砖构佛塔(如大雁塔、小雁塔、料敌塔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砖砌体结构的伟大成就。在大型砖构佛塔中,虎丘塔首创八边形的平面图形和内外两层筒体的结构。内外层间的楼板,由内外壁间逐层挑出的砖块(即叠涩),渐渐收拢承托,并将内外筒体层层连接成一个整体,加强结构的整体性和刚度,使其至今挺立不倒。从这点说,虎丘塔是中国古代土木工程的杰作之一,它是充分体现唐五代时的科学技术水准的。这是它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理由之一。

二、至今发现的条砖题字

在虎丘塔所使用的众多砖材中,经新中国成立后二次维修加固工程后,据文物考古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仔细辨认,在条砖的侧面和正面,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题记文字。现简述如下:唐代条砖侧面发现有凸起的阳文题字:“塔”、“塔记”、“大”、“上”、“天王”、“武丘山”、“弥陀塔”、“己未建造”等。

明代条砖侧面发现有带边框的阳文“福禄寿”字数种,其中有阳文“福”字中绘一寿星图像。以上两项,数量还不少,错落砌在砖层之中。



虎丘塔文物

虎丘塔文物

另外在施工中发现两块特别的题字砖，一块是唐代条砖侧面有阳文凸字：“从择愿生安乐国。”另一块是唐代条砖正面用硬物刻画后烧制的阴文题记：“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这两块条砖都是孤例，唯此一块，而后者从字义可知这是一块表示正式开始建塔的奠基砖。

以上条砖中发现的题记文字多已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和《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介绍并刊发部分照片，后面介绍的两块条砖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而没有见诸报道的。砖虽平凡，如民众一般，但若没有它们，则这虎丘塔是难以支持并挺立至今的；有题文的砖更是凤毛麟角，更有其文化上的深远意义。

三、虎丘塔砖的文化意义

虎丘塔砖上的题字虽只片言只语，甚至有的砖上只写上一个字，如“塔”、“大”、“上”等，但这些题文都是表达了佛教供养人和制砖匠师等人对虎丘山上寺塔的布施意愿和行为，即对佛教的崇信程度。相关内容下面分别对此加以解读，以与关注者加以沟通和探讨。

“塔”、“塔记”等这类唐代条砖侧面的题字，虽只一字或两字，但其明白直接地道出这批条砖的用途是用于建造虎丘山上佛塔的；“大”和“上”这两个单字好像不直指佛塔，但其字义可释为“大事”、“上等的事”，在佛教信徒的观念中，建造佛塔无疑是一件头等“大事”，即“上等的事”，它还点出了佛教信徒经过制砖匠师的着意加工，以供养条砖建造虎丘山寺佛塔的布施行为和心愿。

“天王”也是唐代条砖侧面题文的一种阳文，“天王”是指四天王，古印度神话称须弥山腹有四大天王（为欲界六天之第一天），佛教也采用其说，宣称四天王各护一天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绢索；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执宝幢，因称“护世四天王”，俗称“四大金刚”。一般佛寺中均有天王殿，殿两侧置四天王塑像，形象高大威武，魔力震慑，令人震惊。





苏州瑞光塔内发现的内木函面上即绘有四天王像，形象生动，镇邪护法，为佛塔的守护神。题字“天王”即是佛教信徒对护法四天王的专题供养，也是对佛祖的间接供养。

“武丘山”是唐代条砖侧面的又一种题字，阳文，字面突出，字之位置与笔画并不规整，有一定数量。“武丘山”实指虎丘山，古人讲究避讳，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为李虎，李虎为北朝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的唐实源于李虎，李渊登基后尊李虎为太祖景皇帝，为避李虎讳，有唐一代将“虎”字易为“武”字。唐陆广微《吴地记》中说：“虎丘山，避唐讳改为武丘。”明确指出这一事实。这样，自唐代开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武丘山”就代指“虎丘山”，当然五代至北宋初甚至至清代还时而沿用，这就明确显示带有“武丘山”题字的条砖是唐代条砖，这一题文也显示唐代这一时期的这一特定习俗。

“弥陀塔”也是唐代条砖侧面的一种题字，阳文，也有一定数量，其中“陀”字写作“随”字，是一种唐宋时存在过的异体字。“弥陀”实是“阿弥陀佛”的简称，是梵文Amitayus音译的略称，意译为“无量光”、“无量寿”，故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是大乘佛教的佛名。佛经说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教主），与其左右胁侍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无量寿佛是佛教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弥陀塔”题字砖的出现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虎丘塔供奉的佛是无量寿佛，而且宗派则是净土宗，其也称莲宗，这一宗专以念阿弥陀佛名号、往生极乐世界为宗旨，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造庙塔，中国佛教的发展因净土宗的发达而真正深入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至今还存在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都与净土宗有关，其因简单易行、诱惑力强，为唐时佛教发展最快、最大的一派。至今苏州的灵岩山寺仍是净土宗的道场。

“己未建造”也是唐代条砖题字的一种，阳文竖写，字体也不严格规范，有一定数量。“己未”是一个干支纪年，在干支六十个纪年排列顺序中列第56位。其前是戊午，其后是庚申。塔砖上“己未”年序与建造两字连在一起，令人原先都以为这就是今存虎丘塔建造的干支年号，所以著名建筑





虎丘塔文物

学家刘敦桢教授在发现“己未建造”题字条砖后说：

去年（指1956年）秋天苏南文管会拟修理此塔。发现塔上的砖有“武丘山”、“弥陀塔”、“己未建造”数种文字。于是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有了一线曙光。不过五代时苏州是钱镠的版图，钱氏仍避唐讳，故武丘山三字到五代末年还在使用。因此启示我们，此塔因毁佛与迁寺种种原因，不可能建于会昌五年以前，也不可能建于钱弘俶降服北宋以后，在此期间，只有唐李晔（昭宗）光化二年（899）和钱弘俶十三年即周显德六年（959）两个己未，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塔的式样、结构来研究哪个己未比较适当。

接着刘敦桢教授分析了吴越国和苏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唐会昌五年后至北宋初年这一时期出现的佛塔样式、结构，最后非常谨慎地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以上各种推测假使没有错误，则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刘敦桢教授当然是大家，他的推断也是相当权威的，这五代最末一年，即吴越国钱弘俶十三年己未（959）也就成为至今最权威的虎丘塔建塔年代。但20余年后发现的“庚申岁”题记奠基砖证明“己未”年只是虎丘山佛寺与供养人原定的建塔之年，事实上的施行与原定的计划会有一定误差，因设计、技艺或材料准备等原因，造成一年的时间差别也是极正常的，这无损刘敦桢教授的权威之尊，正是其从“己未”纪年出发，开创了虎丘塔建造的研究之路，推测出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年代，这正是刘敦桢教授的重大贡献。

后来苏州市文管会在发现虎丘塔文物时，根据铜镜和经箱上“陆七娘题记”、“孙仁朗题记”、“言细招题记”中的“建隆二年”供养时间，匆忙间得出“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未（959），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961）”（《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有违于当时土木工程的常识水准的，也是对当时由寺僧筹办、民众供养钱物建造佛塔的习俗缺乏认识的，因为在虎丘塔之后陆续建造的佛塔都有较明晰的建造年代，如双塔体量虽小，就建造了5年；晚虎丘塔数十年的瑞



光塔，用了近30年的时间才告竣工，而无论在体量、地基、结构、社会环境、经济来源等方面都更艰难的虎丘塔，反倒只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这能令人信服吗？

“庚申岁”题记条砖一块，1984年12月13日，在塔的地基基础加固工程施工中，于塔之东南角基础底层发现，全文为：

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

以上共十五字，分二行竖写，似以硬物，如竹、木片或金属片一类物件在土坯上刻画书写，然后入窑烧制而成。在塔砖题字中，唯此砖写于砖之大面，即正面且阴文凹下，字体大小不一，似随手写成，唯首行最末一“督”字在砖之下方，似入窑前后为物压制，致下半字“目”字不见，其余诸字皆完整，清晰可辨。此砖特制，烧制质量特佳，至今坚硬如石，不似附近有的底砖已酥软如泥。此题记字义明确说出真实的今存虎丘塔始建时间，且由法号为皓谦的僧人总管建塔事务。此皓谦当是寺院中一个执事的监院或住持，其具体职责为专门负责建塔事务。“庚申”为干支纪年中的第57位，在“己未”年的后面一年，这可明确说明“己未”年只是一个由供养人出钱，由皓谦等寺僧向烧砖窑户预订制砖的年份。当然，寺僧或许承诺是于“己未”年建造今存虎丘塔的，但因种种原因，如材料、人力、设计、场地清理、天气、风水等，致使始建日期不得不推迟至“庚申岁七月羊日”这样一个日期了。其中“羊”字可作吉祥的祥字解，也就是在“庚申”岁的七月中选一个较合风水的吉祥日子，作为奠基开工的日子。据推测，当时很可能会有一个仪式，邀请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和供养人代表等参加，并将这块奠基砖庄严隆重地放置于今之塔东南面之基土之中。今存虎丘塔从此开始建造，故这块奠基砖意义重大。

这块“庚申岁”题记砖的发现，使得原先由苏州市文管会宣告的始建日期不攻自破。因为中国古代干支纪年排列中，“己未”、“庚申”、“辛酉”三者紧接相连，分别排列在第56位、第57位和第58位上。“庚申岁”题记砖的出现，使得“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未（959），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961）”的结论将更正为“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七年庚申或宋建隆元年（960），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961）”。这



样,今存虎丘塔的全部施工时间只有不足一年半的时间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代古建筑专家并对古塔修建特有研究的罗哲文先生在向关于虎丘塔建造年代的求教者回答说:“关于你所发现的虎丘塔的始建年代问题,我很感兴趣,的确两三年的时间是很难完成如此巨大而精细的工程,全国也有不少修建五六十年的古塔,如料敌塔修了55年,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也修了几十年。”(见罗哲文复钱玉成信,日期为1988年4月28日于泰山)罗哲文先生自1940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至今涉及古建筑和古塔领域已60余年,并写出多种版本的《中国古塔》一书,在古塔领域是有极高造诣的,他的话是深有意义的。

第二次塔基加固维修工程中,发现虎丘塔底层塔砖间的泥浆中,由工匠随意放置的钱币只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并无五代至宋初的钱币。这两种钱币是由唐代铸作并流通至五代的,其中乾元重宝铸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故今存之虎丘塔其建造上限是不会早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而在虎丘塔第三层发现的文物中,有“古钱十公斤,其中种类与第二层发现的相同,但多宋元通宝一种”。“宋元通宝”钱是宋太祖赵匡胤执政后铸作的钱币,铸作时间为公元961年,至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时又铸作新币“太平通宝”,但虎丘塔上并未发现有“太平通宝”的钱币,此段事实可以推测,今存虎丘塔的竣工时间即下限当在宋太宗赵光义执政的太平兴国元年(976)之前的一段时间,即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一段时间里。这上下二限中,又杂有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事件,这会昌年间(841~846),是佛教遭受沉重打击的时期,是不可能于此期间建塔的。由此推测,只有唐昭宗李晔光化三年庚申岁(900)是最合适的始建年代。此年号虽属晚唐的战乱岁月,但此时苏州已为当时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占有近3年,战乱后的民众百姓亟待安定康乐的社会环境,而会昌以后的佛寺也在唐代后期帝王的倡导下有所复苏,此时筹集民资建造是最有可能的。而今存虎丘塔包括大量彩绘在内的全部工程完成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即其下限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宝九年(976),而此时苏州尚在吴越国钱氏政权的管辖之下,还没有合并至北宋的赵宋王朝中去。这样可大致推测今存虎丘塔的构建年代为唐昭宗光化三年庚





申至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00至976年的一段时间中。

“从择愿生安乐国”题字砖，阳文横列，字较规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加固维修工程临近尾声时发现的。发现的位置是在底层面北内塔墩的距地1.6米处，以塔高47.70米计算，其发现位置的高度仅是整体塔高的1/30，或说是3.3%的高度，这说明是距始建时间不太久的事。“从择愿生安乐国”这是一句心灵的直白，是一个（或一群）人在历经生死磨难后的心理表态。唐末五代是乱世，具体对苏州地区来说，自晚唐至宋初一段时间中，最为战乱不断，使民众百姓遭受生死苦难的莫过于自唐僖宗乾符年（874~879）至唐昭宗乾宁年（894~898）的这段时期。其中先是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作乱，攻占苏州，使民众惨遭荼毒；再是光启二年（886）武宁军偏将张雄率军叛乱，入居苏州，自号刺史，苏州百姓又遭劫难，以后杨行密与钱镠双方对峙，在苏州进退得失，多有反复，百姓难以安宁。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杨行密部将李友夺取苏州，当年11月淮南节度使孙儒攻破苏州，杀死李友。最特别的是孙儒率领的是一支到处流窜的乱兵，每打下一地，总是大抢大掠，杀人充食，吃不掉的腌起来，充作储备粮，临走时还要放一把火，焚烧一通。孙儒攻占苏州一个多月，纵兵杀掠，把苏州变成了人间活地狱。离苏开拔时又纵火焚城，使苏州城成为一片焦土，这是苏州城最为悲惨的一次浩劫，城北报恩寺全部焚毁，城中规模最大的真庆道观（今玄妙观前身）也烧得只剩下侧殿和山门了。直到光化元年（898）苏州城再次为钱镠军攻占后，此后一直在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版图之中，再也没有变易。其后在吴越国主钱镠及其传人“尊奉中原，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大政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逐步改善，以至在宋代建国（960）前后，苏州地区经过60年左右的恢复发展已经相当的小康了，这从虎丘塔的成功建造和发现文物及供养题记可以证实这一点。相对而言，只有刚从劫难中余生的人们才会发出“从择愿生安乐国”的呼唤来皈依佛门，寻求安定康乐的生活，而对于过了约60年安定小康生活的人们来说，已无这种迫切与强烈的欲望了。因此，从这一“从择愿生安乐国”的抉择愿望来说，今存虎丘塔的奠基和始建倒是定在唐昭宗光化三年的庚申岁（900）更为合适，因为从整个建塔



工程的规模、财力、人力、材料等技术因素及建塔的人文性质(佛教的魅力和民间筹资供养等)来说也更为合理。

明代题字“福禄寿”条砖,据刘敦桢教授考证为明崇禎十一年(1638)的事,此时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后一个高潮时期。当时苏州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市民意识觉醒,更多的追求个性的张扬和生活的提升,出现了文学、昆曲、绘画、园林的创作发展高潮。“福、禄、寿”正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追求,这一图文恰是具体地反映了这种追求。虎丘塔这样一座总体由砖、泥构成的佛塔,在经过700余年风雨磨难后,其七层顶部已经部分损毁,它也要求有“福禄寿”的补救和充实以延续其生命。明代条砖的图文形象地显示今存虎丘塔的有福和有寿,使其不无艰难地度到了新世纪的今天。

近年在杭州雷峰塔遗址考古清理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题字砖。题字有一字、两字、三字和四字的不等,通过解读,提供了关于雷峰塔以及吴越国丰富的信息,“区区塔砖,竟负载着雷峰塔如此众多的未见任何其他文献记载的秘密”。异曲同工,与雷峰塔砖一样,虎丘塔砖及其题字,虽只片言只语,但却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及至明代后期这一历史时期苏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习俗、艺术及科技等方面的真实状态及达到的水准。

主要参考文献:

- 1.《吴地记》,〔唐〕陆广微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 2.《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第3版
- 3.《话本苏州简史》,朱红著,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庚申岁题记奠基石拓片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 4.《苏州云岩寺塔》，刘敦桢撰，《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7期
- 5.《唐会要》，[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
- 6.《今存虎丘塔的建造时间》，钱玉成撰，《苏州日报》2004年10月28日
- 7.《中国古塔》，罗哲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 8.《中国塔》，张驭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 9.《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 10.《吴越史事编年》，诸葛计、银玉珍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 11.《千年胜迹雷峰塔》，张建庭、王冰主编，杭州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明金刚经经幢



【1957年虎丘塔发现文物的早期报道】

虎丘塔(云岩寺塔)历经千年沧桑,自然界和人为的侵袭使它年迈体弱,至新中国成立时,已经严重倾斜,裂缝纵横,奄奄一息了。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这千年瑰宝,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示抓紧时间抢修此塔,故在经济还是极为窘迫的情况下拨巨款,调集专家会诊,努力抢救。1957年,在经过相当准备的情况下,对虎丘塔施行“手术”,即围箍加固,弥补裂缝,修筑塔顶,终于使古塔转危为安。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为第68号(共180处)。此后又经20世纪80年代加固地基基础,虎丘塔至今雄峙于苏州城外的虎丘山上。

新中国成立后的虎丘塔第一次维修加固工程是对塔体的维修加固,施工时间是1957年的3月至9月,历时约7个月。塔内文物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集中在3月30日、5月5日和6月16日三次,位置分别是第二、第三、第四层窖室和塔内其他地方。而这三次发现的文物内容分别是:

1.第一次(3月30日)发现文物:石函、经箱、存放箱内纸质《妙法莲华经》7卷和供养人题名1卷,包裹经卷的经袱、绣品以及存放二层窖内的珠饰、牙牌、钱币、锦包竹帘、香炉、木香、油碗、油盏等;

2.第二次(5月5日)发现文物:石函、铁函、绢袱、金涂塔、金舍利瓶、舍利、小木塔、小玉幢、越窑青瓷莲花碗、铜佛像、铜镜、铁铸佛龕、檀木宝相、铜杯、铜座、佛珠、钱币等;

3.第三次(6月6日)发现文物:泥刀、木楔、竹钉、残石佛龕、残石造





像、塔砖及塔内彩绘装饰画等。

以上塔内文物发现后，即有记者、官员和文物单位及时向媒体介绍，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组珍贵的佛教文物，引起了有关部门、社会公众的重视和关注。这些早期报道有《新苏州报》的通讯稿，王冶秋同志发表于《文汇报》的《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和苏州市文管会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等。

《新苏州报》是苏州市的地方性报纸，当时是由中共苏州市委直接领导管理的，因为得地利之先，因而是最早报道虎丘塔发现文物的媒体，其最早的一篇通讯稿是载于1957年3月31日《新苏州报》头版的《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此文稿刊于当日《新苏州报》头版右下角，共三段约240字，署名为“许平”，当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文稿文字虽少，但将当时发现文物的时间、情况、位置、内容、题记和时代都提到了，只是将经卷数误报为十本了，经箱底部题记内容也有差错，这是当时未能及时清理清楚的缘故。30日下午发现文物，翌日晨见报是特别迅速和及时的，使正在苏州出差的王冶秋同志及时看到了这一报道。

王冶秋同志的报道稿《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是刊发于1957年4月12日的《文汇报》上的。当时王冶秋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是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主要官员，此时因公出差恰在苏州。他在文稿中说：“3月31日早起正要去虎丘，看到苏州报纸报道，正在施工修建的虎丘塔中发现北宋经卷，于是到了虎丘……”文中详细介绍到虎丘和城内市文管会看到的文物现状及发现文物的位置，后面提到发现文物的价值及修缮古塔的经验教训。他说：“这一发现，也引起各地修缮古塔时，必须切实注意塔的内部多有极为重要的文物，稍一疏忽，就会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最后注明此文稿是“4月2日写于旅途上的”，说明王冶秋同志是写得很及时的，事隔三天就将发现文物情况写出来了。一位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领导同志对主管工作是何等的敬业、认真、负责。

上文中王冶秋同志提到的“苏州报纸”就是当时的《新苏州报》，此后在5月和6月发现文物的第一时间，《新苏州报》都及时报道了虎丘塔内发现文物的情况，这些报道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重视和关注。



后来出现7月27日的迦叶舍利送归塔内的佛教界隆重装藏典礼，即7月26日市文管会将5月5日发现的迦叶如来真身舍利递交苏州市佛教协会，7月27日两百余名佛教徒护送迦叶舍利自西园寺至虎丘，并将相关佛教物品一起入藏虎丘塔内三层窖室内，这次在西园和虎丘的接送仪式和迦叶如来舍利入塔瞻礼纪念会是极其隆重和热烈的。《苏州市大事记》也记载了这件事。

《新苏州报》的报道虽很及时，但并不系统全面，且记者并不熟谙文物专业知识，故只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上，而早期报道最为详尽专业的是刊发于1957年11期（月刊）《文物参考资料》（今《文物》期刊前身）上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内容简报》（以下称《简报》），其署名为“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后题“执笔：钱镛、范放、黄正祥”三人。《简报》全面、详尽地对1957年先后三次在虎丘云岩寺塔内发现文物内容、时间、位置、过程、场景等作了报道，并绘制了《虎丘塔第三层方窖平面示意图》，实际上是第三层发现文物的位置示意图，但限于时间匆忙和专业水平，有些内容未能报道或未能完全报道到位。如，第三层发现的一面曹迎昇供养的《锥画礼佛图》铜镜，对镜面的礼佛内容和供养人曹迎昇题名均未作报道，只是说“一面直径16厘米，背面无花纹”铜镜，而《陆七娘题记》铜镜的题记也未能完全判识，全文51字的题记只判识出47字；个别内容也出现了错误，如，塔砖题字“己未建造”报道为“乙未建造”等。总之《简报》报道是详尽而具体的，使读者及时得到了关于虎丘塔内发现文物的诸多信息，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到1958年7月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关于虎丘塔内发现文物始转入正规的出版时期，关于虎丘塔内发现的这一组珍贵文物的整理研究和探索也在这前后逐次展开，直到现今，关于这组文物的内涵和奥秘仍在探索和研究之中。

钱玉成

2009.11.18





【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

3月31日早起正要去虎丘，看到苏州报纸报道，正在施工修建的虎丘塔中发现北宋经卷，于是到了虎丘，先到工程组的办公室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据这里的负责人说：“30日，工人在塔的第二层边沿向里灌浆的时候，屡灌不满，认为其中可能有空隙，一个工人就下去在里面转了一遭，发现中间有东西，又出来拿了电筒下去，在中间看到石函，他即将石函向外拖，乃将石函拖散，里面有木盒一，上有锁，工人将木盒拿出时，底部脱落，发现其中有锦绢包裹的经卷及象牙牌、珠子等；又有铜钱一包，在石函内；石函外部是长明灯碗二、香炉一，还插着香。”工人即将此事告诉工程队长，队长乃将全部石函收入办公室，并即将木盒送文管会。

石函还放在办公室里，木盒已送城内文管会，同去的有苏州文管会主任委员谢孝思，他说，已收到木盒，但未敢动。我们就先看石函，长约三市尺，宽约尺余，四周凸雕菩萨像，甚精细，盖打开后，四块石版有准口，无黏着物，极易拆卸，函底还有木盒的底版，盖上有金字书“……信心，造……金字法华经……”等字样，惜已残缺。

看了石函以后，即到塔上去看，这里正在修缮，情况是与上面所说相符合，开口处已封闭。

4月1日早晨我们到了文管会，已有些委员在看此木盒。

木盒长约二尺，宽约一尺，作宝盒形状，似为楠木，淡黄色，未加油饰，沿边均包镶有银片，镂刻花纹，并有铜饰件，色彩灿烂如新，前面有一



小锁，极为精致。拿来时即为底部向上，底部有一木板，涂漆有墨书以下字迹：

弟子(字已脱，还有印迹)言(?)细招(?)捨净财造此函盛金字法华经孙仁遇捨金银并手工装孙仁郎捨手工镂花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

有一小象牙牌上刻：

弟子顾超捨愿三世亲生父母疾证菩提佛道

请来省博物馆筹备处考古人员及苏州名裱工，他们轻轻的将盒中上部残锦等取出，下面有经卷共八卷，每卷有的用几层绢布包裹，有的用锦绸中夹有极细竹帘，想为包裹经卷用的，可惜已被工人拿出时扰乱。经中有一卷系白棉纸墨书：

……仁遇写经……金花银装经函……

纸已酥，只看掉下来的前一行字，墨迹如新，有好工将来还可装裱，此卷可能即用竹帘包裹的。

此外都为绢或锦包裹，例如一卷外一层包绢上写着：

武丘曹二娘捨裹妙法莲华经第六卷塔上

第二层包绢上写着：

顾氏八娘捨

又一包绢上写着：

李氏六娘捨裹经

此一卷有三层包绢，绢上除墨书字迹外，还有墨画简单小花。经已成为黑色，但表皮为金画花纹，光彩夺目，此经已完全缩在一起，不能打开，问裱工，他说也很难有办法了。

另一卷亦为三层绢包，分别写有：

永充亡杨氏二娘供养朱氏九娘太君捨女弟子高十娘太君捨裹经
此卷同上卷经已不能打开。

再一卷包绢一层，上写：

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捨

此外在碎了的绣花锦上，尚有墨书“虎丘山寺宝塔”等字样；还有一





虎丘塔文物

包铜钱，其中有“开元通宝”、“五铢”、“唐国通宝”、“乾元重宝”等，以“开元”钱最为多；还有一串珠子，计八枚，红色宝石一小块，其余碎锦残片，苏州市文管会正请苏州著名绣花专家来将质地不同者区别出，可能拼对成形。苏州市文管会也正向省文化局、文管会报告，将请专家来妥善处理，保管这批文物。

按建隆二年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约为公元961年，距今已近千年，对虎丘塔确定历史年代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从佛教经典上，织绣工艺上，当时风俗以及雕刻工艺方面也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同时，这一发现，也引起各地修缮古塔时，必须切实注意塔的内部多有极重要的文物，稍一疏忽，就会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虎丘万历元年题名石刻拓片

王冶秋4月2日写于旅途

(《文汇报》1957年4月12日)



【虎丘塔发现文物的确切时间】

50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州市人民政府对虎丘塔进行了以加固塔体为中心的第一次维修工程。在施工中发现了塔内珍藏的一批佛教文物，这批文物在2006年10月苏州博物馆新馆竣工后，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以“吴塔国宝”专题向公众展示。

在公开展示这批佛教文物的同时，苏州博物馆还编辑出版了这批文物和其后发现于瑞光寺塔的文物的专辑，这就是2006年10月由苏州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以下称《两塔文物》）。

在《两塔文物》中，对虎丘塔这批文物的发现时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年代，即在《前言》中说的：

虎丘塔中的佛教文物便是在这次维修中发现的。1957年3月30日，维修工人在第二层塔正西门口向砖隙中浇浆，因屡灌而不满，于是揭开部分砖块发现有一孔道，钻得进去，在第二层塔心有一个砖砌的十字交叉处是一暗穴（天宫），其中有经箱等文物。后来在第三、第四层塔心暗穴（天宫）中又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

在同一书中，在“前言”后面所有具体文物的说明文字中，都说文物是在“1956年”发现。据统计有21处之多。这与“前言”中所说，明显的存在时间上的一年之差，当然，相同的一批文物，不可能在相差一年的同一天发现，那么到底哪一个年份是准确的呢？





笔者虽生亦迟，未能参加20世纪50年代的虎丘塔第一次维修工程，但有幸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以加固地基基础为中心的第二次维修工程。在工程施工之余，还查阅了有关第一次维修工程的文献档案，对虎丘塔内发现文物的年代有了初步的理解和明确；最近于2005年初，又一次整理了这部分档案，特别是整理了维修工程中的大事记，更加明白了两个发现文物年代的正误，现列举当时的主要事实如下：

1953年春，虎丘塔底层塔墩部分崩塌，寺僧楚光报告险情，苏南地区文管会派员视察险情。

1954年，南京工学院刘敦桢教授受聘为苏州市政府顾问，来虎丘塔实地调查勘察，写出维修建议书，并刊出《苏州云岩寺塔》（《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7期）一文，详尽、科学地介绍虎丘塔情况。此后苏州市政府着手准备维修虎丘塔事宜。

1956年1月13日，由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担承的《虎丘塔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交于苏州市政府。

1956年3月8日，刘敦桢关于虎丘塔塔基、塔身加固等问题的意见的信件送至苏州市政府。

1956年5月2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拨款人民币5万元以加固虎丘塔。（见省文化局朱偁、何人俊给市文管会谢孝思信）

1956年9月29日，苏州市建工局设计室提交虎丘塔加固工程预算。

1956年10月8日，苏州市建筑公司、苏州市文管会签订关于虎丘塔施工准备的协议。

1956年11月19日，苏州市政府向江苏省和文化部上报抢修虎丘塔施工方案（内附施工说明及图纸）。

1956年12月5日，苏州市文管会与苏州市建筑公司签订修塔年度合同及修塔概算书。

1957年1月15日，苏州市建筑公司提出虎丘塔加固中的几项复杂问题及施工组织设计。

1957年3月19日，由苏州市建筑公司一工区承担的虎丘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加固维修工程开工。



發現
美談

虎丘塔文物

1957年3月30日，在虎丘塔施工中于第二层楼面下发现暗穴（天宫）中珍藏的一批佛教文物。

1957年4月3日，苏州市文管会向市、省及中央报告虎丘塔内发现宋人写经。

以后的事实已经不必再列举了，这就足以说明虎丘塔内发现佛教文物的准确年代了。更为有力的说明是在发现文物的不久即有苏州和上海的报纸及时报道了这一事实。苏州的报道是发现文物的次日，即1957年3月31日在《新苏州报》头版上的一篇报道：《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上海的报道是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先生所写的《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一文，发表在1957年4月12日的《文汇报》上。写作时间是文中最后所写的“4月2日写于旅途”，即其从苏州去上海的旅途中。

笔者近日查阅了当年的《新苏州报》，即1957年3月31日的报道，好在文字不多，全文抄录如下：

虎丘塔内发现一部宋人藏经。

三十日下午，修建虎丘塔的工人王菊生在塔上二层塔门下检查一条即将灌浆的裂缝，发现缝底有一石匣，将匣起出，内装一木匣，木匣内藏有手抄经卷十本。

石匣四周每面刻有佛像五尊，木匣有金属包边，还有一具小锁，制作精美。藏经用丝绢包裹，木香作轴，经卷纸上写楷书，字迹工整。

木匣中有“言细绍舍净财造函盛金字法华经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等字样，知道这部法华经是在宋朝初年藏在塔内的，建隆是赵匡胤的年号，距今已近一千年。

报道的署名是许平，报纸的上方以行草体写的“新苏州报”报名，报名下二条横纸中印着“1957年3月31日星期日，第2688号，地址：苏州市铁瓶巷33号”。

该报道中的石匣（石函）和木匣（楠木经箱）现已展示，只是箱底题记小有出入（如供养人‘言田绍’当为‘言细招’）和并不完全。这报道已明白





无误地表明了虎丘塔发现文物的年份是施工开始后的1957年，而不是说明文字中的“1956年”，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次的加固维修工程是一个跨年度的工程，其准备工作多做于1956年，而实际施工是在1957年，正如《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中《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所报道：

1956年冬，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局和苏州市人民委员会支持领导下，更得到国内建筑专家和上海、苏州二市建筑工程部门协助设计，开始进行抢修，本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工人王菊生在塔之第二层正西门口边沿灌浆时……

这里将1956年冬开始的施工，于1957年三月三十日发现文物，按时间顺序应写为“次年”，但当时撰者写为刊发《简报》的“本年”，两者混淆，从此发生了年代的一年之差。以后此事有的文字表述为“1956至1957年的虎丘塔维修工程”，而在后来的报道中对这一情况的撰稿人在使用上选取了“本年”的1956年，以致1958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中，错误地将发现文物的年份定为1956年，再以后，在《苏州市志》和别的外延文字资料中，都是引用了这两种文献资料，造成了以讹传讹的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将此情况披露出来，以求学术上的真实性，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

（刊于2007年8月15日《中国文物报》）



【五代吴越国及其创建者钱镠简介】

公元907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李祝为朱温所废，朱温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历史上称后梁，此后在中国北方为主的地区，至赵匡胤建立北宋止的53年间，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共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同时在中国南部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即南平）、北汉等国，史称十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即宋太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王朝，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后，中国又归于统一，在唐至宋的由统一至分裂，又由分裂至统一的过程中，吴越国是唯一的由唐至宋直接过渡的二级政权，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和平统一的个例，至今仍有政治上的积极意义。

吴越国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刺史董昌的部将，唐昭宗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镠遂拥有两浙，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及上海市（除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唐昭宗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于当年（907）受封为吴越王。

后梁龙德三年二月丁卯（923年3月12日），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用皇帝仪卫，王府成为朝廷，设丞相等官职，以杭州为首府。

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病逝，其子钱元瓘及孙钱弘佐、钱弘俦、钱弘俶相继为吴越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乙酉（初一



日)钱弘俶在汴梁(今开封)向宋太宗上表纳土,“以所部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之”。吴越国从此结束,自唐朝末年至此前后约70余年。

吴越国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攻占开封时期的辽朝一律称臣,初期对内虽亦使用过吴越国的年号,但并不与中原王朝对抗,对邻国的战争也都是适可而止,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全的地区之一。著名的历史大家谭其骧教授更说:“要之,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护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而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辖区内有富饶的太湖平原的大部和宁绍平原,吴越国主发动境内人民治江浚湖,兴修水利,拓展杭州、苏州两大城市;大力倡导垦荒圩田,重农种桑;开拓交通,发展外贸,尊教重学,崇佛建塔,重视文化教育,使境内较少战争,社会富庶文明繁荣,综合实力提高,创造了较好的风气,使至今长三角地区都受惠不浅,成为国内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钱镠,字具美,一做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县(今浙江临安市)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二月十六日,卒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三月二十八日,享年81岁。少时家贫,贩私盐为业,以骁勇闻名乡里,唐末从石镜镇将董昌抵御黄巢军捍卫地方,累官至权杭州军州事,景福二年(893)筑杭州城,同年任镇海节度使。从任节度使开始,后创建吴越国,在位40年,逝世后,后唐赐谥曰武肃,后人称为钱武肃王,是五代时雄踞一方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出身贫贱,行伍起家,在唐末至五代的动乱时期,平息两浙战乱,维护地方安宁,修筑海塘,拓建苏杭,疏浚江湖,垦荒圩田,发展农桑,开发海运,扩大贸易,使吴越之富“甲于天下”。

钱镠说:“民为社稷之本,土乃百物所生”,“有土斯有财”,“无水即无民”。他致力于治理水土,发展农桑,繁荣了两浙经济。《宋史·河渠志》记载:“钱氏有国,始置撩浅兵七千人,专一开浚。”后又设置都水营使,专门负责治水工作,招募兵卒成立“都”的建置,称撩浅军,水利大备,岁多丰稔,比起中原多难之民,“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的场景,吴越国不啻是人间天堂了。



钱镠一生始终臣服中原王朝，不搞独立，临终时嘱咐后人：“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大之礼。”在其这一决策下，传位子孙四人都严格遵循，并最后和平统一到北宋赵氏政权中去，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重大贡献，百家姓首句“赵钱孙李”已将此一政治隶属序位定格并深入民众，成为旧时童蒙之最初读本。

北宋时杭州知州苏轼在《表忠观记》中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戏，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向以赵宋王朝为重而贬低吴越国的欧阳修亦不得不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不被干戈，今其民幸福足安乐。”对钱镠治理吴越地区给以肯定。

时至现今，以上海、苏州和杭州一带为主区的长三角地区仍是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与五代吴越国近百年的和平建设、文化发展奠定的基础和创立的元气分不开的。



虎丘摩崖石刻“慈度常庆”拓片



虎丘塔文物





【虎丘塔及五代吴越国大事记】

前6至前5世纪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悟道及涅槃，佛教产生，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在世时。

前4至前3世纪 佛教第二次、第三次结集，佛教产生并向外传播，阿育王皈依佛教，造八万四千塔，为中国战国时。

64年 东汉明帝遣使西行求佛法。

67年 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携《四十二章经》到洛阳，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

68年 汉明帝在洛阳首建佛寺，后名白马寺。

188~193年 汉灵帝中平五年至汉献帝初平四年，《三国志·刘繇传》载笮融在徐州建浮图阁，有铜佛像及木塔。

247年 三国吴大帝孙权赤乌十年，康居国僧人康僧会到建业（今南京）弘法，“吴赤乌中，已立寺于吴矣”（朱长文语）。

372年 东晋咸安二年，王珣、王珉兄弟捐舍虎丘别墅为佛寺，此前苏州虎丘已有佛寺。

502~589年 南朝梁、陈时，特别是梁武帝时（502~549年在位）江南多造佛寺，江总、张正见曾见虎丘有佛塔。江总（519~594），字总持，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梁、陈至隋时为官，诗、文皆能。江总写《庚寅（570）二月十二日游虎丘山精舍》诗。张正见，字见颐，梁、陈



时为官，能诗文，陈宣帝时卒，张正见写《从永阳王游虎丘山》诗，当时两人诗句“洞塔耀山庄”、“贝塔流光动”均写及位于虎丘山上的佛塔，但此时的塔当为方形木塔，并不高大，在虎丘山巅处，余不详。

598年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崇佛，佛教得以发展，是年始建天台山寺（今国清寺），为天台宗发源地。

601年 隋文帝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为其母庆寿大建佛寺及舍利塔，是年首次于三十州及长安建塔31座，苏州虎丘建塔为其中之一，刘敦桢教授考证之，张驭寰教授考证为方形三层木塔，高约16米。

618~741年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佛教受帝王支持，且有俗讲、变文等形式，使佛教发展深入民间，与中国人精神生活休戚与共，佛教发展为十个宗派，寺、塔、经、像都大量发展，唐时苏州建有佛教寺庙十余座。（《吴地记》）

769年 唐代宗大历四年，苏州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稍后被提升为江南唯一雄州，是年在虎丘山寺新建砖木混构佛塔以取代隋建之木塔，此塔较隋塔更高大雄伟，成为虎丘主要景观。

821~824年 唐穆宗长庆年间，虎丘山寺之唐建佛塔已历50余年，有修葺之举。

825年 唐敬宗宝历元年，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唐《朱明寺大德塔》碑可能由白氏撰写，惜碑残字缺，不能读出原意。

769~840年 唐代宗至唐文宗间约70年，江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部分诗人来苏州写到了虎丘塔，如白居易《题东武丘寺》“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句，李绅《遥望武丘、报恩两寺》“塔分朱雁余霞外，刹对金螭落照中”句，刘长卿《题虎丘寺》“青林虎丘寺”句，张籍《虎丘寺》“日暮先教锁寺门”句等涉及虎丘寺、塔，白居易还将自编诗文集《白氏文集》六十七卷藏于苏州南禅院，有《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专文。

841~846年 唐武宗会昌年间，在名臣李德裕主政下，唐武宗断然禁佛，下禁佛诏，除京城长安、洛阳和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外，各地僧尼还俗，拆毁寺庙、毁佛教经像等。据唐武宗旨意，苏州不在留寺之列，因浙西观察使治地在润州，即今之镇江市，故苏州所有寺庙均在拆毁之列，



独开元寺因有玄宗圣像未被拆除，虎丘山寺之佛塔也当被拆毁，佛经和佛像也被焚毁，唯石像、石碑等被打击致残，存劫后余身，留在现场被收拾。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唐武宗一旦毁云”，言简意赅说明这一场景。

847~860年 唐宣宗大中年间，唐宣宗恢复佛教，但限于能力，对京城以外事只能听之任之，虎丘山寺只能缓慢中逐步恢复，对塔的恢复只能做些筑基一类的事，《朱明寺大德塔》残碑填入基中。五代吴越国创建人钱镠大中六年二月(852)生于杭州临安县。

875年 唐僖宗乾符二年，唐末藩镇割据早已形成，是年狼山镇遏使王郢兵乱，侵占苏州，从此揭开苏州战乱。临安石镜镇人董昌以捍卫乡里为名，募集土团军。钱镠投董昌麾下，为石镜土团军偏将。

886年 唐僖宗光启二年，偏将张雄率军叛乱，入据苏州，聚兵五万，自号刺史，钱镠平刘汉宏，权杭州事。次年镇海军节度使周宝使部将徐约攻苏州，驱张雄，受诏为刺史，唐授钱镠充杭州刺史。

889~891年 唐昭宗龙纪元年三月，钱镠遣堂弟钱铌击败徐约攻占苏州，次年七月杨行密部将李宥攻陷苏州，十一月豫将孙儒又攻陷苏州，大顺二年(891)钱镠十二月再下苏州。孙儒撤离时，焚毁苏州城。

896年 唐昭宗乾宁三年，五月淮军台濛攻陷苏州，刺史成及被俘。钱镠克越州，平董昌，唐授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镇海、威胜军节度使。

897年 唐昭宗乾宁四年，七月，钱镠部将顾全武败台濛复占苏州，十月台濛复占苏州，唐封钱镠为吴王。

898年 唐昭宗乾宁五年，二月钱镠败淮军于无锡，九月顾全武再克苏州，十月钱镠以部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刺史。

899年 唐昭宗光化二年己未，苏州虎丘山寺寺僧募民资烧造塔砖，上有“己未建造”题字等。

900年 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苏州虎丘今存砖塔开始建造，有奠基砖题记“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为证，皓谦当为虎丘山寺住持或监院。另外，底层塔身砖间黄泥灰缝中存置多枚铜钱，但只唐时通用钱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二种，无其他后来之钱币。



900~961年 今存虎丘塔系由原塔基上重建为砖塔结构,体量、结构、工程量都有极大改变,并发生构建中的塔体倾斜,施工中相间调整塔体南北之厚度、梯口、用砖层数(每层)等,并且施工与等待相交错,又是民办性质,由信佛民众逐年供养钱物建筑,故这一过程甚长,达六七十年之久。

902年 唐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淮军与钱镠越军交战,互有胜负,钱镠以顾全武偕四子传璩求婚于杨行密,行密许之,以女妻璩。

904年 唐昭宗天复四年,杨行密遣钱传璩及己女并顾全武返杭州,返杭即成婚,唐封钱镠吴王。

907年 朱温废唐称帝,为后梁。钱镠首先承认朱温为中央王朝,梁进而封钱镠为吴越王。

908~919年 梁开平二年至贞明五年,杨氏淮军与钱氏吴越兵相战多年,互有胜负,至贞明五年(919)互遣使请和,达成和平,自此息兵20余年,梁乾化二年(912),梁授钱元(传)璩为苏州刺史。钱元璩此前已入驻苏州。

922年 梁龙德二年,吴越钱氏以砖甃苏州城,自此苏州城为砖城。

923年 梁龙德三年,梁遣使赐钱镠吴越国册、暨建国之仪,钱镠建吴越国。

924年 后唐同光二年,后唐敕升苏州为中吴军,领常、润二州,钱元璩为中吴军节度使。

926年 后唐同光四年,吴越国境内大水,中吴军(苏州)尤甚。

923~932年 钱镠连续建佛寺、佛殿、佛塔,还往明州迎佛舍利建塔藏之,苏州建开元寺。

932年 后唐长兴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钱镠病逝,后唐赐谥“武肃”,以王礼葬临安功臣山,子元瓘嗣位为吴越国王。钱镠临终又嘱子孙“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规范了继承者明确的国策大政。钱镠还写过一首《造寺保民》诗,其中有“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句,说明其尊崇儒、佛、道三教是为了保民的目的,而广造寺塔





正是其尊崇佛教的实际做法。

941年 后晋天福六年，杭城丽春院火，延于内城，钱元瓘迁居，惊惧发疾，8月卒。子弘佐嗣位。

942年 后晋天福七年，三月，中吴军节度使钱元璪卒，子文奉嗣位。元璪治苏30年，颇有治绩，五月葬横山，即今七子山九龙坞，后在盘门内立祠，沧浪亭五百名贤中亦有钱元璪，赞语“建武持节，作镇吴门；处贵不骄，令名永存”，“郡政循理”，言其治苏遵循其父之国策大政。

947年 后汉天福十二年，钱弘佐卒，弟钱弘侬六月即位，十二月为胡进思废，复立钱弘俶即位。

955年 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佛，为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禁佛运动。钱弘俶承周诏，命检吴越国境内寺院，得杭州有敕额者480所，几乎同时造金涂塔84000座。

957年 后周显德四年，钱弘俶铸钱币，一如唐制，即“开元通宝”钱。

960年 北宋建隆元年正月，赵匡胤代周立国，定国号宋，改元建隆，即遣使宣谕吴越。二月宋敕以钱弘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三月钱弘俶更名俶，以避赵匡胤父弘殷名。并遣使进御服、锦绣、金帛于宋，贺宋太祖登极。

961年 宋建隆二年，虎丘塔建造进入后期，供养物品多于此年入藏于塔内，二层楠木经箱镶边上凿字：“建隆二年男弟子孙仁朗镂，愿生安乐国为僧。”经箱底部墨书：“弟子言细招……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宝塔。”三层窰穴内陆七娘供养铜镜有“隆建（系建隆之误）二年三月口日题”等年号题记，表明是年由信佛弟子供养给寺院，由寺僧安排入塔。

976年 十月，宋太祖赵匡胤崩，弟赵匡义即位，为宋太宗，宋开宝九年十二月改为太平兴国元年。虎丘塔竣工之下限为此年，因塔内藏钱币最迟者为宋元通宝，而无其后宋太宗铸用的太平通宝。

978年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入汴京，纳土归宋，吴越国亡。

995~997年 宋太宗至道年间，虎丘山寺名改为云岩禅寺，塔随之成云岩寺塔。



虎丘塔

虎丘塔文物

1338年 元顺帝至元四年，虎丘山寺修建一新，塔亦修葺，所建二山门(断梁殿)为至今苏州唯一存留的元代建筑物。

1395年 明太祖洪武乙亥，虎丘寺院僧舍失火延及塔。

1403~1410年 明成祖永乐初，僧宝林修塔。

1438年 明英宗正统三年，僧南印修塔。

1618~1622年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至明熹宗天启二年，僧正元主持修塔及天王殿，言浮图(塔)30年一修，李流芳作记。

1628~1644年 明思宗崇祯年间，虎丘山寺、塔大修，塔的第七层及塔顶此时(1638)重建。

1707年 康熙四十六年，清圣祖玄烨题虎丘佛寺为虎阜禅寺，题匾至今仍在头山门，自1684~1707年，康熙六次南巡，驾幸苏州虎丘，建行宫于虎丘山上。

1751~1784年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清高宗弘历六次南巡江南，八次驾幸虎丘，虎丘塔得以装修。

1860年 清文宗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战事延及寺塔，腰檐等焚毁。罗哲文自美国取回一张此前有腰檐的照片可证之。五年后(1865)，潘钟瑞《香禅杂识》言“乙丑暮春，泛舟虎阜。兵燹以来，庙寺祠园荡无寸椽，海涌峰头惟颓然一塔而已”。以后寺僧回虎丘，仍住山上，恢复寺院，并将虎丘塔封闭。

1936年 刘敦桢先生受中国营造学社派遣于8月、9月两次考察虎丘塔，惟塔门封闭，未能入塔。但将对虎丘塔的考察编入《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刊于《中国营造学刊》。

1953年 塔底层北面砖墩崩塌，寺僧楚光上报市相关部门，苏州市政府邀刘敦桢考察虎丘塔。

1954年 苏州市文管会吴雨苍，南京工学院教授刘敦桢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和《苏州云岩寺塔》两文，刘文介绍说：“总之，此塔百孔千疮，已接近崩溃阶段，如不设法修理，恐不出数年即有倒塌危险。”并推断出“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1956年 3月2日,苏州市文管会提呈市人委、省文化局关于虎丘云岩寺塔加固抢救计划草案。

4月,省文化局钱、朱两位局长在接见苏州市文化局范烟桥处长时传达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意见:“中央对此(按:指抢修虎丘塔)异常重视,认为该塔有关国际观瞻,影响重大,必须在今年内紧急抢修,以防意外。如果突然发生变故,恐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5月,经省长及冷副省长同意,省财政局专拨虎丘塔加固经费五万元。

9月,苏州市建工局设计室提交虎丘塔加固工程预算书,王国昌工程师提出围箍法加固塔身。

11月,举行专家会议,商讨虎丘塔抢修工程事宜,然后报批抢修方案至文化部。苏州市政府任命俞子明为建工局长,负责虎丘塔维修工程事。

12月,苏州市文管会与苏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修理虎丘塔年度合同”。

1957年 3月19日,虎丘塔抢修工程正式开工,施工单位为苏州市建筑公司一工区。施工开始前,苏州市政府指定修塔事宜由建工局局长俞子明、市文管会主任委员谢孝思和市园林处长王言三人负责施行。

3月30日,施工至塔的第二层时,发现石函、经箱、经卷、供养人题名、钱币等文物,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恰来苏州视察,见《新苏州报》刊发《虎丘塔发现宋代佛经》后赴虎丘塔施工现场视察,并撰文发表于《文汇报》,介绍目击虎丘塔文物的情况。

4月,南京工学院刘敦桢和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分别致信苏州市文管会,提出“修建时注意事项”。

5月5日,施工至第三层时,发现石函、铁函、金涂塔、佛舍利、铜佛像、钱币等文物。

6月16日,施工至第四层和第五层时,发现泥刀、楔子、竹子、残石造像、塔砖等文物。

8月,安装避雷设施。

9月,历时半年的塔体加固的抢修工程结束,完成围箍、补缝和重建塔顶的任务,耗资约8万元。



11月，由苏州市文管会编写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刊发于《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期刊前身）第11期，介绍施工期间塔内发现的文物，并根据文物题记中的年号，推断出“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959），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961）”。

1958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苏州市文管会编著的《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一书。

本年起虎丘塔向社会公众开放一至七层。塔由苏州园林部门代行管理。

1965年 虎丘塔开始出现险情，底层砖墩表面发生开裂、鼓起、剥落现象。5月，苏州市文管会邀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省文管会等对虎丘塔进行勘察、“会诊”。虎丘塔暂停向公众开放。

1976年 虎丘塔再次出现险情，市革委会成立虎丘塔维修工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

1978年 6月，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罗哲文处长率陶逸钟、付连兴等专家调查塔况，并召开有各地专家参加的阊门饭店会议，探讨研究加固、抢修方案，并成立虎丘塔工程指挥部。

1980年 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召开乐乡饭店会议，专家一致认为“是不均匀沉陷引起塔身倾斜，沉陷矛盾基本上下卧层软弱”。修塔指挥部聘陶逸钟为修塔工程总顾问。10月，省文化厅将“关于苏州虎丘塔加固方案的请示报告”报批于国家文物局。

1981年 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文同意，以加固地基为中心的抢险加固工程开始施工。

1984年 10月10日，施工中于塔内围廊基土中发现“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奠基砖。

1986年 8月，经排桩式连续墙（“围”）、地基钻孔注浆（“灌”）、修筑塔体基础壳体（“盖”）和修补底层部分砖墩墙体（“补”）4个工序，至此竣工，历时10年，施工中发现奠基砖（庚申岁）等文物。

10月，国家文物局庄敏副局长、罗哲文处长等代表国家文物局来苏作竣工验收，钱玉成等测定高47.70米，倾斜2.34米等塔的基本数据。

11月，庄敏、罗哲文、陶逸钟、戚德耀、许洪祥等人签署虎丘塔（云岩





寺塔)验收证书。苏州市市区文保所接管虎丘云岩寺塔。

1988年 4月,云岩寺塔史料史迹陈列室对外开放。

1990年 2月,江苏常熟、太仓交界处发生5.1级地震,虎丘地区有较强震感,经监测虎丘塔安然无恙。

5月,铁道部、国家文物局对虎丘塔进行高速铁路振动影响的模拟试验。

11月,中国古塔维修工程技术经验交流会在苏州召开,与会专家对虎丘塔维修工程予以充分肯定,评价为“工程设计科学、施工稳妥、质量优良、效果显著”。

12月,苏州云岩寺塔排险加固工程获江苏省文化厅1990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1年 3月,苏州云岩寺塔(虎丘塔)排险加固工程获国家文物局1990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002年 4月,由苏州科技学院、苏州市勘察院、苏州市市区文保所合作完成《苏州虎丘塔变形与保护研究》课题。



虎丘塔文物

虎丘塔文物

后 记

2007年新年伊始，开放不久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主展厅“吴塔国宝”的展柜中陈列着从千年古塔虎丘塔中发现的一批珍贵佛教文物。但是这批文物还没有什么详细诠释的资料，甚至个别的说明牌上连年代也标示有误。从发现至今50年来还没有人对这批文物作过认真细致的研究，而现在既已上柜展示，就必须对前来参观的广大观众作出准确的解读。我虽然参加过虎丘塔的维修加固工程，对塔的情况和背景有所了解，但对这批文物了解还极其不足。“修塔编志写文章，我以微力报国忙”，一个文物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令我振奋，使我在较短时间内撰写出这组比较深入研究这批文物的文章，这就是本书的来由。

在撰写过程中，首先得到文物大师罗哲文的题词，也得到苏州博物馆、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市方志馆等单位的支持，徐刚毅先生百忙之中写来了序文，同时又得到苏博志愿社委员耿明先生和马晓茵、陈松涛、黄晓岚、胡红梅、丁颖等同仁的大力帮助，我很感激。作为苏州博物馆的老职工及苏博志愿社的首批志愿者也拟将此组文章献给苏博志愿社，作为同仁们撰写的第一本书。以后计划再出由志愿者同仁自己选题和撰写的同类书籍，以迅速提高志愿者同仁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并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服务。





千余年前，崇信佛教的吴地供养人虔诚地将自己的财物、劳作和时间都贡献给以虎丘塔为标志的信仰中，这就成就了虎丘塔及其内藏的文物。现在也仍有相当的一批人，像古代的供养人一样前赴后继地做着这样的事业，我和耿明先生及其他的热心人一起，也义无反顾地投入这一现代供养人的热潮中。

此外，也特别感谢武肃王后裔、苏州吴中区姑苏村党委书记钱森林宗亲和苏州台商姐妹会的实际帮助。

钱玉成

庚寅清明于竹辉路三泉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映现吴越：虎丘塔文物 / 钱玉成，耿明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 5

ISBN 978-7-80733-467-5

I. ①映… II. ①钱… ②耿… III. ①文物—简介—苏州市 IV. ①K87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0233号

责任编辑：洪 芳

装帧设计：韩桂丽

责任照排：韩雅萍

书 名：映现吴越——虎丘塔文物

著 者：钱玉成 耿明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787 × 1092 1 / 16

印 张：10.5 插页：24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467-5

定 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